

炎黄春秋

第 **6** 期
2010年

朱厚泽：当今文化焦虑问题

田纪云：我从政的几点体会

“扭秧歌”也是在前进

李锐：深深怀念朱厚泽同志

美丽岛事件始末

目 录

一家言

- 1 当今文化焦虑问题
——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朱厚泽
- 7 我从政的几点体会……………田纪云
- 8 “扭秧歌”也是在前进……………杜导正

怀人篇

- 11 深深怀念朱厚泽同志……………李 锐
- 12 呈厚泽病榻 (诗二首)……………邵燕祥
- 13 悼孙起孟老……………吴 象
- 21 我给吕正操当秘书……………张友坤

求实篇

- 23 保育钧：“两会”应该关注什么……………马国川
- 26 从消灭私有制到以人为本……………林蕴晖

往事录

- 33 山东夺权的“三结合”经验……………丁龙嘉
- 42 沈阳毛主席塑像的建造……………叔 弓

人物志

- 46 三大历史关口的张闻天……………张培森
- 55 叶圣陶日记中的1958……………蒋燕燕 叶永和

亲历记

- 62 我在晋江遭遇“假药案”……………张明俊
- 66 邢志恒之死……………王金屏

沉思录

- 70 “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张绪山
- 74 知识分子何以有“戒心”……………吴 江
- 77 为讲座松绑……………丁 东

品书斋

- 78 不堪回首的回首——刘丽英书评……………王海光
- 82 序——《北大，1957》……………张毓茂

春秋笔

- 84 美丽岛事件始末……………赵 诚

编读窗

- 87 敬答读者……………高 放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杨继绳
杜 光 杜导正 (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 (副召集人)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 (主任) 徐 孔 吴 思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社 长：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执行主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网 络 总 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强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yhqc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010—68525374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6.90元

当今文化焦虑问题

——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

• 朱厚泽

编者按：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中共贵州省委前书记、中宣部前部长、本刊编委朱厚泽同志，2010年5月9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0岁。这篇文章经作者生前多次修改，准备在本刊发表。作者希望几位学者和他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但相关文章没有准备好，等待不及，先发此文，以为纪念。

广义的说，凡地球上的非自然存在，以及打上人类印记的自然存在，都可以叫做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文化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

在西方许多国家，文化和文明在词义上是相通的。在中国的汉语中，往往把一定的文化类型，把凝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并存续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称为文明，不仅涵盖一定文化的特征，还涵盖一定文化发展的程度。为区分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属性，或为强调它的政治和制度的层面，又区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等等。

文明差异和文化交流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想稍微离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具体的历史，一般性地考察文明发展进程的全球态势。

无疑，各种文明总是在一定人群、一定的地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为背景，又以一定的人群为载体。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种种文明，势必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和风貌。但是，在一个横断面上对它们进行的观察，又无法比较出它们的高低优劣。比如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你怎么比啊？因为习俗和审美的不同，这个民族喜欢这个，另一个民族喜欢那个。

然而，由于资源（自然的，人文的）聚集不平

衡的绝对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既有相对走在前头的，也有相对发展靠后的；既有处于中心区域的，也有处于边陲的。文明发展程度不一，就会产生“文明的落差”。这与流水的落差一样，必然会从高端向低端流动，从中心向周边扩散。或周边地带也会被中心地区吸引，主动去学习和接受高端文化，以提升自己。

中国历史上曾是东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派“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是吸纳高端文明的例证；而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则深深刻录了这种文明流淌和扩散的轨迹。

当然，文化交流现象还不仅仅由于“文明落差”引起的。相对先进的民族向相对落后的民族吸收文化营养，以丰富自己文化内涵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中国中原地区自汉至唐，从西域各民族那里不仅学习了佛法，而且学习了许多种植技术——如西瓜、核桃、棉花等等，还学习了音乐、舞蹈、杂技、绘画等许多文化艺术。而《西游记》描写唐僧取经，玄奘最后回到长安，关起门来译经，是因为发现了和我们不同的印度文化，觉得它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吸取。这种不同文化相互流动、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的历史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文化的交流、扩散、转移、相互接纳、互补、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遏制的历史主流。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人群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而文明的差异，特别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聚集的不平衡，又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出现的时代，因文明落差而引起的文化交流，就是所谓全球化的过程。什么是全球化？定义很多。我认为全球化就是指当今世界人类的活动已经或正在急速地、大规模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

界限,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日益密切的互相交往、互相联系、互相求索、互相利用、互相满足、互相融合、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运行状态和演化过程。

中国近代和现代面临西方文明的两次大规模进入,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点。第一次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正值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西方文明东来,是以贪婪的经济侵略(倾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原料)为主导,以血腥的军事侵略为手段,它给中国带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给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灾难和屈辱的感受。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叶,革命与战争时代逐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所代替,西方文明东边来,是带着高新科学技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政治的伟力,中国人民从全球化的进程中,感受到严重的挑战并争得新的发展机遇。

在近代和现代两次外来文明大规模进入中,我们民族在应对上,似乎反复地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认识,容易接受,在清末是“坚船利炮”,在1950年代是“两弹一星”。但是对于器物后的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则不容易看清楚,不容易接受。在洋务运动开展若干年后,我们被历史上曾是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打败后,才认识到进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至于从制度改革的层面进入到文化改革的层面,出现像鲁迅、胡适那一代人,则更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抓紧“两弹一星”和重工业的建设,看来也是必然的,事后看来,虽然有值得讨论之处,但难于非议。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吸纳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提升我国文明的层次是有一定困难的。

第二是我国面临外来强势文明进入的时候,正是国难当头或危机四伏的时候。因此,在器物层面接受外来文明时,采取了国家主义的形式:用国家垄断资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员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搞“国家工业化”。对民间力量限制、削弱,甚至企图把它消灭。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民间力量的活跃,没有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要想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做出的改革决策,正是对我们近代现代历史痛苦教训反思的结果。

前两年,在我们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有人讲:“全球化”不就是往北美那个国家那里“化”吗?不是把全世界都“化”成它那个样子吗?国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论调。2008年,在广州我对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说:你说当今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这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从高新科技到“好莱坞”、“可口可乐”、“麦当劳”,都是从美国来的。但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呢?要先回答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还应该先问一问:为什么18世纪、19世纪的全球交往,主要表现为“英国化”呢?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八、九、十世纪的时候的国际文明交流中,东方表现为“中国化”,或者叫“汉化”、“唐化”呢?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正是我前面说的,在不同时期,文明有中心和边缘,有高端和低端。处于低端和边缘的国家、地区,总是希望从高端拿到新的文明成果来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而居于高端和中心的国家及地区总有一种向四周扩散的趋势。

在文明扩散和转移的过程中,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处于高端的先进的文明向低端和边缘扩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会伴随着磨擦和冲突。

为什么会有磨擦和冲突呢?

第一,高端文明是从处于高端的那个民族和国家中孕育出来的,必然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这就有个价值判断问题,即是与非、美与丑的判断。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同,在交流和传播中就会与接受地的文化产生磨擦。

第二,从一定民族国家中孕育出来的文明,它在向外扩散、传播过程中,必然会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就会与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发生利益上的碰撞。此外,高端文化向外扩散过程中,也不是很纯洁的文化,难免泥沙俱下,鸦片随同英国商品进来了。因此,高端文明扩散的过程,不要幻想是牧歌般的,不是演奏着圆舞曲、迈着轻松舞步的过程。磨擦、碰撞有时会爆发为战争,强势的文明对弱势的文明采取征服的办法,甚至是灭绝的办法。一旦高端文化和落后文化发生冲

突,吃亏的往往是后者。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诚心向西方学习,结果却是“先生打学生”。

既然文化传播过程有二重性,那么,对于二重性的事情就应该采取二重性方针。第一,判断清楚,那是先进的文明,我们就要把它拿来,学到手,拿过来为我所用,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第二,对于传播中的文化磨擦,对于传播中的利益冲突,就应该用国际间共同遵守的国际规章通过谈判、对话、协商,用订立契约的办法,订立双边或多边协议、条约的办法,来界定相互之间的利益。以求得在“双赢”的条件下实现文明的吸收和交流。如果不能做到“双赢”,也要做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力争降低震荡,减少磨擦,避免冲突。

由此,我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创立的特区思想以及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的决策。什么是开发区?一般解释是:开发区是一块地,有几平方公里,里面有很好的设施和密集的企业,实行一些优惠的政策。这是从空间上的理解。如果从人类文明的传播、转移、吸纳、扩散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开发区是为远渡重洋来到的一种新的文明提供的一个停泊的港湾,一个登陆的码头,是为一种新的文明的种子提供发芽的苗床,为新的文明的幼苗、植株提供生根、定植、壮大的园圃;为新的文明、新的生命的那个“蛋”,提供孵化的舒适、温暖的“窝”,让它能破壳而出,茁壮成长。如果可以这样理解沿海开放,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在当代全球人类文明扩散、转移、吸纳中,做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一个制度安排。一种减少文明传播中的磨擦、冲突的政治选择和制度安排。

关于现代文化焦虑

当前说的文化焦虑显然是指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焦虑是对心情、对精神状态的形容。文化焦虑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

文化焦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近代的事。

在农耕文明时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那时也有焦虑,杜甫就有焦虑,但杜甫焦虑不是文化,他是焦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他对社会不公感到焦虑,看见贫困而焦虑,看见战争带

来的灾难而焦虑。我们民族号称有 5000 年的历史。在河姆渡发现了 7000 年前的人工培植的稻子,说明这时已经进入了农耕文明。古人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说明农耕社会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因为在建立农耕文明之前,人跟野生动物没有多大区别,生活资源直接取之于自然,有鱼就打鱼吃,有果子就摘果子吃,没有就搬家,哪里有哪里去。只有农耕文明的确立,才使得人类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在一个相对可以预期的时段里,取得自己的食物作为生存保障。这样,人就和其它动物开始明显地区别开了。

要建立农耕文明,要种农作物,就得知道寒热暑湿、风霜雨雪、阴晴圆缺、春夏秋冬,这就迫使人从这里进入对自然的了解,逐渐产生了天文和历法。我们中华大地在农耕文明延续的几千年中,从秦始皇以后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下边是农户,有乡绅,然后有一层一层的政权,一直到最上边的皇帝。在自然观上比较尊重自然,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在社会观上,有家庭、家族的一套行为规范。总体上讲,那个时候的思想、理念、价值观、社会观、自然观跟农耕文明是适应的,不存在现在说的文化焦虑。

现代文化焦虑是怎么来的呢?

说得确切一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

问题就出在现代化上。而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是掉了队的,就是比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差了好大一截。当欧洲文化进入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接触,就产生了磨擦,引起了震荡,进而发生了冲突。磨擦、震荡、冲突反映到心理上就是焦虑。

前几年有一本书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就反映了文化焦虑的心理。

其实,自从现代化敲击中国的大门的开始,中国一直都在说“不”,一直有文化焦虑。乾隆年间,英使马嘎尔尼来访。因为下跪的问题有过一番交涉,最后得到解决,乾隆皇帝接见了。他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比如:马嘎尔尼要求派专使长期驻扎北京,要给他们提供港口,要有固定的税率。乾隆皇帝说“不”,马嘎尔尼失望而去。20 年后,英国又派人来,但是皇帝不见,还是说“不”。又过了二十几年,1840 年,战争就打起

来了。现在的共产党也是说“不”的,把西方那一套弄过来了还行?绝对不搞西方那一套!

有人为当代“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而焦虑。对唐宋时代的“唐化”、“汉化”,为什么没有人焦虑?那时很安逸嘛,为什么近代以来就不安逸了?1840年前后卖鸦片的进来了,打起来了,你跑我家门口来了,我就不高兴了。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外国人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跟我们建立联系。最近几年大概有点感觉了,你发展了这么大个经济体,你怎么可能不到全球去寻求资源和市场呢?我们也跑到非洲挖矿去了,采油去了,那里也出现了杀中国人的事情了嘛,我们的商品也畅销海外了,贸易磨擦也多起来了。面对新的情况,我们外交部也开始认识到了。

文化焦虑跟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播有关系。焦虑之后会产生危机感、紧迫感是积极的反应;焦虑以后也会产生急躁,还会产生一些极端的反应。如果没有东西文明的交流、碰撞、磨擦,就没有现代的文化和文化焦虑问题。进入了近代,西方商业文明发展起来,它的力量向外扩张。西方文明进来,和东方文明相遇。以工商文明作为内容的西方文明跟我们的传统农耕文明发生了磨擦和碰撞,文化焦虑就开始了,而且是越来越焦虑了,一直焦虑到五四运动。进入近代,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一步一步到文化层面,在这一系列的方面艰难地在探索和适应。器物层面上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洋枪洋炮洋船,先买嘛。后来就觉得制度不行,就进行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以后就引起了文化观念上的碰撞。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首先从少数先进人物普及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官员以及广大的群众当中。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中出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焦虑中奋起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探索中走到前边的。

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我们正在从三个大的方面跨越文明峡谷:

第一,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形成了冲击世界的三大潮流。这是当代全球主流趋势,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三大潮流其能够形成全球大趋势,它的动因、形成的条件,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化”:第一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化,它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逐步迈向智能

化为特征的;第二是经济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化、民营化(西方叫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多元化,它是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开放、包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二,三大经济结构转型。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的工业经济,当代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以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相应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发育成长出三种很不相同的文明。即:传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近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有的直接称之为机器文明),现代知识社会和智能文明(有的称之为信息社会和信息文明)。

三,两大文明转型。一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完成。二是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转型的标志。

中国正是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还进行着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这指的是: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规模上推进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近代工业经济社会转换中,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国家垄断资源,政府集中控制,官员直接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以行政指令为方法。“国有化”把一切财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把十亿人都变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锅饭”的无产者。整个国家变成为一部“大机器”,各个地方、企业、单位、个人就是“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一个螺丝钉。城乡被严格分隔,个人属单位所有,社会被国家吞没……。这种方式限制和取消了市场制度,限制和消灭了私营民营经济,压制了民间社会力量。经过3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选择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其不利。因此,我们又正处在从行政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单一国有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从城乡分割、固化农村向全面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转变……等等,这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长期僵化固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社会流动开始了。但这个变化还受到原有文化的束缚,步履维艰。

外部的三大潮流冲击,内部的三种经济并存,历史性的两大社会文明转型同时到来,全局性的深层组织制度变革和结构变迁与创新相互叠加。……这一切,在世纪之交的时刻,在东亚这块土地上,汇合、重叠、聚集到一起来了。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各种地区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扰,都在同一时空里聚焦到一起来了,复杂而多样,深刻而尖锐,持续不断而变化多端,融合渗透,难解难分。

当前的文化焦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因为几种不同的文明压缩叠加在一起,我们负担非常重,心情特别的焦虑。焦虑当中容易出现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潮,对这些极端主义的思潮要看到它出现的不可避免,但是要防止引起一些不理智的选择。在这样困难重重的选择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点理性的思考,减少一点非理性的冲动。

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这般,从时、空双向——历史的和全球的——更加展开来观察与思考,就不难发现,它是与人类文明演化中,中国近代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在时段上明显地滞后,在路径选择上之偏离主流,从而形成的时、空双向的深层间距和强烈反差有关。这是历史的与现实的、地区的与全球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制度的与文化的、利益的与价值的、理性的与感情的,……多维空间中的多重差距与对立。

中国今后的发展进程能否比较顺利,较少折腾,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冲击、三种经济、两大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

跨越文明的峡谷,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华民族艰难之所在。但同时,它也是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创造民族伟业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曲折中艰难探索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一步一步往前深入,但是每一步都遇到了困难,几代人为此在文

化问题上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艰难的判断。

前些年我和几位 80 多 90 岁的老同志聊这个问题:怎么会从五四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表征),最后走上了苏联的道路?这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20 世纪初,当我们正在进行探索的时候、正在寻找道路的时候,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其内部便蕴含着许多矛盾和危机。生产过剩,经济震荡,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阶级矛盾尖锐等。这些矛盾导致两次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全球有识之士都在思考:西方工商文明所建立的制度究竟怎样?站得住还是站不住?为了走出危机,20 世纪出现了四大思潮及其社会实践:

第一是法西斯主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治经济;希特勒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第二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第三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错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 20 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 1935 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

第四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二战以后,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但是,从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如果画一个坐标来描绘这四大思潮及其实

践的话,那么,共产主义运动大体上类似一条抛物线,20世纪初十月革命后升起又慢慢下来,最后到这个世纪末,以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作标志。希特勒就像一个尖脉冲,急剧升起又急剧掉下来。北欧社会民主党类似一个平缓的渐进线,它也有波折,但是比较平缓。突出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社会党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慢慢走向了核心,欧洲很多国家的社会党比较长时间执政,或者单独执政,或者联合执政。而处于这个危机中的美国又是原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他经历降低曲线几乎破产的时期,在罗斯福新政的带领下经过二战,借助新的技术革命逐步上升,进入了持续的发展。

这四大思潮不是学者在书斋里面的思考,而都是有大量的人群跟随,都建立有政党,形成一定的国家制度,我们的选择应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进行的。

苏联的道路曾经在全世界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危机的时候苏联搞工业化很有成就。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几大实践的背景下,孙中山先向西方学习,后来又向苏联学习。面对20世纪的多种探索,经过各种文化的交流、磨擦和碰撞,在各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的交叉作用下,我们终于走上了这么一条路:两千年皇权政治的传统,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两种东西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毛主席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不同文明在交流、磨擦、碰撞中,选择自己的出路,当然有自己的立足点。如果没有自己的立足点,就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凝聚力。所以,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单位。但同时要看到,不同文化在交流、磨擦和碰撞中,逐渐形成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超越民族国家的趋势也在发展,具体的例子就是欧盟。历史上战乱不休的欧洲国家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如何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寻求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找到既有差别、各具特色又共通的前进道路,这恐怕是我们思考文化问题不能回避的问题。

前面说的20世纪四大思潮,是我上世纪90年代的看法,后来我思考,实际上有六大思潮。另外两个思潮是指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两种路线选择:暴力革命的路子与和平渐进的路子。比较研究民族独立运动两个路子会给人以启发。关于和平渐进的路子,早一点的是印度甘地为代表,晚一点的是以南非曼德拉为代表(严格说来,这是曼德拉出狱以后的路子,他早期也是主张暴力的)。

在1980年代,小平同志会见非洲的一位领导人时就跟他讲,你不要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我觉得这句话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背景。二战以后有一个民族独立的浪潮。这个浪潮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就是武装斗争、暴力革命,赶走殖民者,包括农场主,最终建立民族国家;另外一类突出的代表就是南非的曼德拉,他没有搞武装斗争、暴力革命,而是采取和平的、渐进的办法。现在南非经济社会都比较平稳,发展也比较好。第一类国家不是全不好,但的确有相当一批陷入到部落民族的纠纷里边,打了几十年,现在还没完没了。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者赶走的同时,还清除了殖民者带来的文化。因此这些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断层。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殖民主义也有多重性,起码有二重性。它既是对这个国家民族主权的侵犯,经济利益的剥夺,又带来了一种不同于你这个国家的文化。如果在赶走殖民者的时候,把它带来的文化也消灭了,就是连洗澡水带娃娃一起泼掉了。一个国家的道路怎样选择,恐怕要有多重考虑,不要单一化。特别是在文化面前,更应当保持一点冷静,保持一点思考,减少一点非理性的冲动,防止一些不理智的选择。极端主义往往会有不良的后果。

从这里引出一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怎样管理文化?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讲了文化问题的三个“宽”:对不同意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宽厚一点,把文化环境搞得宽松一点。文化思想上不要强求一律,不要搞思想文化一元化。我想到费孝通,费老,他80大寿的时候说过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老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

(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从政的几点体会

• 田纪云

从1941年入伍至2003年退休,我从政六十二年,期间在地方工作四十年,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十二年。在我长期从政同各种人物打交道或相处中,使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起码应具备以下政治品德:

要敢于坚持原则。这是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最基本的素质。在关键时刻,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要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党的原则,不能做墙头上的草,刮风两边倒。毛主席说要“五不怕”,我看有“一不怕”就行,就是不怕丢乌纱帽。没有原则性的人,老好人,噙着冰化不出水来的人,或者只会鹦鹉学舌的人,是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条件。当一个错误潮流来临,个人又无力抗拒时,也要尽量避免卷入,不说或少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违纪的事。例如“文化大革命”,谁也抗拒不了,但你至少可以不去诬陷他人,更不要去打人。

要处以公心,秉公办事。这对领导干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品德。

主要体现在用人、容人和团结人三点上。

所谓用人,就是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用人不能受什么老部下、老同事、老乡亲、三亲六故等因素的影响,更不能以人划线,拉帮结派。古人说,“举贤不避亲”,不能倒过来,变成“举亲不避嫌”。在用人问题上,要力避有恩必报、有仇必报或者恩仇都报的江湖义气,这是党性原则所不允许的。用人问题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素质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优良传统的关键所在。否则,你说得再多、再好听也没人相信。

所谓容人,就是要谦虚谨慎,博采众长。要心胸开阔,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说作为领导干部气度要大一些,善于集思广益。凡是领导干部听不得不同意见的,刚愎自用,一触即跳,动不动就训人骂人,让人望而生畏者,难免决策失误,给党和国家造成损失。毛主席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要懂得多数人的智慧总比一个人高,个人与群众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永远是人民的小学生。“谦受益,满招损”,这是自古不变的真理。

所谓团结人,就是要宽以待人,团结各方面的人,包括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要求全责备。谁有点不同意见,就记仇,伺机报复,给小鞋穿,这是心胸狭隘,心术不正的表现,缺乏领导干部应有的水平,更非政治家的表现。

真正深入实际,走群众路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凡重大问题要提请集体讨论,让每个领导成员充分发表意见,不可搞“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说了算。胡耀邦同志任总书记时,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之一,人们敢讲话,讲真话,不担心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

要激流勇退,不要恋权恋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大力提倡干部的年轻化,提出废除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胡耀邦同志身体力行,在推动干部年轻化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各级都提拔了一批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子。胡耀邦同志多次说过,部长干到65岁,中央领导干到70岁就可以了,他自己只准备干到70岁。任期满了,或者年龄到了就退下来,天经地义,不胜光荣。现在人才辈出,不愁后继乏人。要明白,到了眼睛睁不开了,嘴巴合不拢了,腰也直不起了,头脑也不清醒了,还赖在台上,是不讨人喜欢的。

退休,关键是要“休”。领导干部退休,关键是要“休”。退休后应安心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争取多活几年,享享天伦之乐。千万不可再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朝政”,对现在的领导人指指点点。要知道,革命就像接力赛跑一样,一人跑一棒,你的一棒跑完了,就坐到一边休息去吧,不要再对跑下一棒的人指手划脚。更应懂得,长江后浪逐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而且转得更好!

这些体会中没有涉及利用特权榨取人民血汗的腐败分子,因为那是另类性质的矛盾。

“扭秧歌”也是在前进

● 杜导正

4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温家宝纪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5月4日,温家宝在北京大学与学子们座谈,纪念五四青年节。温总理的文章和谈话,引起很多人关注。有客来,也多就此漫谈,刺激了我的一些思考,遂成答客问小文一篇。

关于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

问:温家宝4月15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的纪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热情的关注,成为这几天议论的中心,说什么的都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家订了二十多份报纸,但可惜没有《人民日报》,杂志社也没有。海内外电话打来问我看法时,我很抱歉无法回答。我当晚是从网上看的,第二天《羊城晚报》转载了全文,我立刻读了两遍,感觉很好。

首先,温家宝的文章写得朴实,没有一句虚话,没有一点夸张。胡耀邦是1987年初下台的,温家宝写的是胡耀邦1986年春节前夕带着中央三十多人到最穷的贵州西南深山察看旱情的事,大年三十到年初一跟老乡一起过。由于怕了解不到真实情况,胡耀邦特别派温家宝半夜到周围农民家去暗中查访。由于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我们党已经严重脱离群众,大大小小的官吏为了报喜不报忧,上级来,看哪里,看什么,都是上级领导察看前事先布置好的,并规定了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因此,胡耀邦才会叮嘱温家宝悄悄夜访,“看看(他们)没有准备的地方”,并一直等到半夜温家宝回来,带病坚持听汇报到深夜。这时,正是全国放鞭炮吃饺子的时候。胡耀邦关心群众疾苦,紧密联系群众早已是佳话,在人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国人赞他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因此温家宝的文章使耀邦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形象再次感染了人们,给我们党加了许多分,也有助于我党恢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对当今的领导应有很强很强的启发和教育意义。

问: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么宣传胡耀邦,高调地纪念和怀念胡耀邦,是这些年来极少有的。这篇文章之所以会引起社会巨大的关注和反响,是否也跟人们渴望中共现任领导人,也应当像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那样,接近群众倾听诉求,遏制贪官,缓解贫富悬殊,加快政体改革的需要有关?

答:人们关心这篇文章是否有更深层的意义,是否关系到北京政局的动向和局势,是不是一个进步的积极的信号,是有原因的。近几年中共给人的感觉是对意识形态控制严格了,好像只能有一个政党、一个声音、一个主张,与多元化的、追求民主和科学的、主张社会前进的声音和力量好像形成了对立面。我同意你说的在最近这个时期,中老知识分子与中南海的心理关系和距离处于逐步拉开、疏远的过程,弥漫着悲观绝望的情绪。这的确是非常危险的。是我党应要高度警惕和重视的动向。

前不久,一个老记者来看我说,“老杜,如果共产党能听取你们这些老同志的意见,政治民主上碎步前进,坚决刹住官员腐败,如果不思进取,这么专断腐败下去,可惜可怕啊。”

前几年,中央关注农民工问题、扼制“非典”、取消农业税,汶川抗震救灾新闻比较开放,听取知识分子意见也多一些,后来胡耀邦九十华诞纪念会,使知识分子中间力量倾向于中南海,向中南海凝聚,中国的事就顺利些,这两年又差了。也许发布一些指令的是某些部门的某些人,也可能中央领导胡锦涛、温家宝根本不知情,但是老百姓、知识分子不了解上面的事,以为都是中央领

导决定的，把账都算到党中央头上。例如我最近出了一本书，有的县市的公安局说，要发现一本没收一本还号召互相举报。我就认为，这绝对不是胡锦涛、温家宝的意见。国内盗版的这本书我已经看到六七种版本了。

关于温家宝“五四”青年节在北大的讲话

问：温家宝总理“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与学生的座谈，似乎印证了你这个判断。

这是温家宝担任总理后第三次来到北大，第一次是“非典”时期，第二次是2005年5月4日。温家宝说，总觉得“五四”这一天到北大最合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总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自由、文化、民主的气息。今年总理再次来到北大与学子们过节。我想，这不是总理对北大的偏爱，而是对历史的尊重，对民主科学的尊重。

答：90年前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喊出了“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与科学。温总理在和同学们座谈之前，特地强调了科学民主精神今天在中国一点也不过时，并阐释了民主科学精神与现代化建设、与教育改革、人才培养的关系。说得非常好！

说起五四运动，很多人都强调这是一场爱国运动，这不错。但是，五四运动的精髓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民主、科学这四个字。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逐步壮大，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民主！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安，投奔我党，就主要是冲着共产党要建立民主的国家这一条去的。可是，1949年以后，到粉碎“四人帮”前，我们渐渐丢掉了五四精神，丢掉民主这面旗帜，搞了数不清的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因此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我们党丢了分。改革开放以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时期。那时，邓小平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反封建；



2010年5月4日，温家宝在北京大学与师生座谈

胡耀邦和赵紫阳执政也相当开明，民主和科学的气氛比较浓厚，知识分子和中南海的距离也很近。可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又发生了民主和科学精神某种倒退的现象。

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分子的中间一块都是最要争取的力量。政治力量一般都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力量向哪边倒，那边就胜利，否则就失败。蒋介石丢掉中国就是一个明证。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时候，温家宝在北大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有很强很强的纲领性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问：不过，温家宝的讲话也透着一些无奈。比方说，有同学用钱学森老人的话“为什么当代中国培养不出大师、创新型人才？”来提问，总理也只能用“大学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这样无奈的语气。另外，据报道，温突然对围在身边的学生代表道：“不用说，我知道你们是安排好的。”温还说，这次到北大前已交代校方不要刻意安排，“但我一来，就把学生关在楼里不让出来。”陪座的北大校长尴尬之余，温又说“不是说你！”

答：你说这些，我也看到了。不过，我觉得应该从积极方面看。温家宝用“应该”这样的词，是有些无奈，但是，他至少承认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现在办教育的，很多是不太懂教育的官员。我们党现在必须首先承认这是现实，才能逐步改造这个现实。可是，很多领导人现在连这个

现实都不愿承认不敢承认。

我们党的领导人下基层,握手或说话,往往都事先由地方或部门挑选、安排那些靠得住的自家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官场的潜规则。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为什么特意说到耀邦要他微服私访,我想,他是对现在的这种潜规则不满意。他在北大特地指出这一点,事实上是公开地反对这种潜规则,是极不容易的。

“扭秧歌”也是在前进

问:知识分子阶层,对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和“五四”北大讲话反响很好。可是,耳边却又听到各种各样的禁令,与温家宝的声音又是那么不一致,不免让人产生困惑。有的人甚至觉得温总理好像也在作秀。您怎么看?

答:眼下,整个中国处于历史上的大转折大变革大发展大变迁的时代,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左的、新左派的、右的、保守的、自由的、独立的,各种思潮都在大碰撞,表面上看来相当混乱,因为中国内部确实在酝酿着巨大的历史性伟大变化,就像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时期一样。经济上,中国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向经济多元化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化,政治思想文化上,也一定会必然会从专制集权向民主的多元的方向发展。“五四”前后中共创始人最早举起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伟大旗帜,是中国将来发展的旗帜,这也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谁也挡不住的。

最重要的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一个忘年交小朋友曾经总结六十年来中国政体的变化,说毛时代是“强人政治”,邓胡赵时期是“双峰政治”,此后就到了“常人政治”时代。我同意这个分析。“常人政治”时代,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思想多元化,有进步的有保守的,这些必然会反映到中南海里面,因此,中南海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温家宝的文章和谈话,是进步的、积极的声音,而你所说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各样的禁令,多是保守的、倒退的声音。中南海这些常人政治的执政者处在那个位置上,必须考虑全局,必须在各种力量的比较中间斟酌,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因此自然地常常地表现出进进退退、摇摇摆摆的情

况,这就像扭秧歌。尽管是扭秧歌,但总的说还是在前进。所以,看现在的政局,不要光看到倒退的消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它进步积极的一面。

问:三年前,您在香港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政治改革要碎步前进的观点,很新鲜,有道理,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今年您又提出了中国政治扭秧歌前进的观点。有乐观派人士说温家宝的文章和谈话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央要马上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您又是怎么看的?

答:三年前,我在香港大学谈过,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要碎步前进,就像梅兰芳《天女散花》中的碎步前进一样。因为国家太大,沿海内地差别太大。封建统治几千年,专制独裁体制太久,经济发展太落后,而人口又太多,所以进步起来难度很多很大。中国社会目前的形势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大转折大发展时期,各种力量在大碰撞引起的混乱中,由此导致的中央主张左右摇摆进退是可以理解或者说是正常的。所以我们没必要听到一点好消息就过分高兴就激动起来,也不要听到一点不好的消息又绝望消沉下去。当各种力量和主张在碰撞的时候,左一下,右一下,一会左压倒右,一会右又压倒左,都是正常的。我党在历史上辉煌过,“大跃进”“文革”惨败过,邓胡赵时期又中兴起来,“六四”后一直前进三步退两步,左一下右一下,扭秧歌似的,但是,总的说,还是前进了。我经常对我身边的人说,我们不要对中国政治改革抱过高过急的希望,也不要旁观,更不应悲观绝望。我们大家都应该做中国民主和科学新潮流的乐观派、促进派。要支持中国进步的、前进的力量,真心地推动国家在中共正确领导下小步前进,碎步前进。

问:你的意思是说,这次《人民日报》发表温家宝文章和他在北大的谈话,只能看做是一种进步的、积极的声音,若由此推出政治体制改革立刻会大步前进,并不现实,对吗?

答:是的,如果又过分地兴高采烈期望太多,那就难免有些天真了。我喜欢我给自己一本书起的名字《一颗平常心》,就是提倡一种比较平和比较平常的心态,劝大家经常跟庙堂之上的人“换位思考”一下,就不会过于偏激和激动。我就是这样经常跟我周围的老朋友们交流的。

深深怀念朱厚泽同志

• 李锐

厚泽住入医院时，曾多次和老伴去看望。4月28日，他还同我们一起照相。最后一次是5月6日，医生会诊，即将告别。我紧紧握着他的手大声说道：我们这些人一生，无愧于人民和国家，也无愧于这个党，我们都是好样的。9日早晨，知道去世了。第二天到他家中，送去一首未定稿的怀念绝句，同夫人细谈他的病情和后事。11日五点醒来，连忙起床，将那首绝句定稿，用大张宣纸写好。八点多同老伴到达医院，向这位老来结交的朋友告别，怀念绝句挂在他的遗像旁边：

高谈改革靠三宽，藏富于民天下安。

生活会时心似火，铁肩道义更忧先。

告别大厅内外，老中青三代挤得满满的（后来知道共去了八百多人），有认识的朋友在擦眼泪。我的怀念绝句引起许多人观看，还有人拍照。我希望这四句话能立即传开。

同厚泽相识，是1982年3月，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时，他正在中央党校青年干部班学习。我的二姐李英华（已去世）当时正在这个班任实际负责的副主任，她特同我谈到，朱厚泽是班上最优秀的，排第一位。厚泽是贵州人，抗战后期，二姐曾在贵州地下党长期“隐蔽”过，很了解贵州情况。同厚泽有了来往，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也曾长期下放十多年，吃苦不少。但藉此时机，他读了许多书，尤其自学了自然科学，深深认识到没有科学知识办不好事。这个一致观点，使我们很快成为至交。记得1956年《人民日报》约我写社论时，写过一篇《干部一定要学自然科学》，这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当时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潮，经济部门许多工程建设，负责人都是文化低的老干部。1982年下半年，我曾请耀邦同志到这个班讲过两次话，他认识了许多学员，也认识了厚泽。他对厚泽还说过这样的话：事情都有两重性，十多年不工作，是荒废了，但是意志



朱厚泽

徐庆全 摄

的锻炼，思想的开放，也是丰收的十多年。

十二大后，厚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贵州担任过二把手和一把手。耀邦到贵州广泛考察时，大讲经济开放，要藏富于民。于是厚泽在当地报纸上，用整版篇幅，连续宣传耀邦这一主张。由于曾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过，我是一直关心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和邓力群长期掌管意识形态，影响改革开放，很是不安的。于是向耀邦推荐厚泽担任中宣部部长，耀邦早就看重这个人才。1985年7月，厚泽到中宣部上任。大家知道，他极其慎重地在文化界首先提出“宽松”，随后提出“三宽”：不仅文化界，包括经济、政治各系统，小到家庭生活，都要讲“宽松”、“宽容”、“宽厚”，这样才能做到言论自由等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才能保障民主执政，实施真正的宪政。他的长篇讲话先在《文化报》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转载。胡乔木

和邓力群当然容忍不了“三宽”，首先不能“宽松”。他们“反对精神污染”被阻止后，又大大“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影响到耀邦主持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定稿和实施。终于出现1987年初的生活会，耀邦被迫辞职，在中宣部只工作一年半的厚泽也随着下台。后来我给江泽民写过一封信，请他重视朱厚泽的才能，继续任职。

都不在位了，我们的来往、交谈就更多了，“关怀莫过朝中事”，尤其关心“何时宪政大开张”。我还记得1997年老中青三代朋友几十人为我祝八十寿辰时，大家都讲话，厚泽讲的尤其理论意义，他念的稿子：

（前面几句没记清楚）“理论和实际结合，逻辑必然，使言论和行动统一。因而，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认识论命题，也是崇高的人生道德观的一个命题；以其鲜明的正确性，同林彪、江青一伙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类的极端无耻、极端愚蠢和彻底堕落，形成了认识论和道德观上的尖锐的双重对立。从而为新时期的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提供了前提、制定了标准。十几年来事实证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凡是坚持同实践相结合，言论和行动相统一的，那里的各项改革就比较深入，人们心情比较舒畅，遇到困难也比较易于克服。反之，发展就比较慢，困难就比较多，人与人之间关系就很难融洽、和谐。

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似乎五彩缤纷，但也是苟延言利，转眼就成为泡影。对个人来说，也是一样。凡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总是被人理解，被人信赖，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成为社会凝聚的核心。无论历史的阴霾多么浓多么汹涌，也遮不住那水晶般纯洁透明的灵魂，挡不住那奉献人民的正大光明之心，人民是始终不忘、永远铭记在心的。反之，凡是言行相背，表里不一，无论他多么精于表演，巧于打扮，装腔作势，能言善辩，人民也不得不以怀疑的目光对照言行，观察表里，审视前后，还其本来面目。‘救救孩子’这是我们民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鲁迅先生本世纪初发自肺腑的呼声。为了‘救救孩子’，首先要救救大人。大人们要自我拯救，救救自己的灵魂。在孩子们天真纯洁，而受到伤害的心灵面前，怎样自我选择呢？首先用崇高的理论自勉，用高尚的道德自律。我不晓得理解错了没有？”

我还记得，厚泽讲完了这段话后，全场热烈鼓掌，还有人大声说：讲得好。可见这段反思过去的理论大总结，何等深得人心，厚泽是何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看看我们现在社会种种可怕的现象，各处官场的集体腐败，何时能实施宪政呵！厚泽十三年前讲了这段话，他是真正铁肩担道义的，他能死得瞑目吗？

2010-5-16

呈厚泽病榻(诗二首)

• 邵燕祥

地震灾连沙暴天，
清明谷雨倒春寒。
早年抱负成遗恨，
同样遭逢亦夙缘。
一入病房如禁锢，
顷闻呼吸已艰难。
何时历史出三峡，
执手相期四十年。

今春迟见柳飞绵，
枵触情怀惨不欢。
大地囚笼尊一士，
时光隧道忆三宽。
百年功过归青史，
终古忧思薄远天。
堪笑都门夸首善，
牂牁一树自昂然。

二〇一〇年五月一日晨

同日中午

悼孙起孟老

• 吴象

2010年3月2日12时30分,孙起孟老逝世于北京医院,享年100岁。

这位百岁老人,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曾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为筹备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也是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的起草人之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出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

3月10日举行庄严隆重的追悼会。会上印发的《孙起孟同志生平》指出:“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共同的事业中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样高的评语决非轻易判定,而是经过慎重考虑、仔细斟酌才确定下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想到的是近年颇受热议的“协商民主”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党的领导”和“两会”应该说是最基本的东西。“人大”系仿照前苏联的苏维埃而来,政协则是新中国的创造。历经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大跃进”、“坚持三面红旗”、“十年浩劫”、“市场经济改革”,一直沿袭了下来,基本体制未变。其实变化和小的改革还是不少,“党的领导”和“人大”更是如此。既有执政的共产党,又有参政的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对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到底利弊如何?是利多弊少还是利少弊多?孙老晚年对此似有志加以探索研究,惜因年老多病未竟。我想,总结“协商民主”的丰富经验与历史教训,应该是促进政治体制深层次改革的重大课题之一,而孙老留下的一些实践体会和设想建议,又是研究这个课题的重要参考资料,只可惜鲜见存留,整理成文字。

青年睿智有为,遇挫不屈不挠

孙起孟1911年生于安徽休宁县商山村,长我11岁。他父亲孙培钦是位中医,早年迁居苏州。他母亲汪景秋是我外公汪静安的堂妹,我母亲汪玉蓉的堂姑,我叫她素姑婆。我外公家是个大家族,十多户老小分灶而同居于一个大宅院里,称“承志堂”。我幼时常到外公家住,素姑婆家在苏州,有时也回商山住一阵,我刚会说话时就认得她了。

小时候我是个受宠的孩子,只怕祖父一个人。到苏州后,我对他的管束常感到不自在。他对我说,你看人家孙起孟,初中毕业没上高中,自学了一阵,就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东吴大学,18岁就大学毕业了,还正式出版了两本佛学的专著。我到苏州念书时,起孟叔已毕业应聘到江苏省立女子师范任教,不几年又升任训育主任。在上海就听父亲说过,祖父喜欢藏书,曾邀起孟叔来家在书房里小住数日,自行阅读,并与他倾谈心得。祖父对我说,一般人是“三十而立”,孙起孟不到二十就立起来了。1935年起孟叔举行婚礼,他特地携我同往。我想大概不仅是“走亲戚”、“吃喜酒”,而是期望我找到一个学习的楷模吧。

起孟叔的婚礼非常简单朴素,只请了两桌至亲好友,自由交谈或几个人一起攀谈,气氛亲切而又热闹。我一看都是大人、老人,只我一个小孩,谈话根本插不上嘴,显得有点拘谨甚至窘迫。倒是起孟叔主动来找我攀谈,说了几句就问起了读课外书的问题,幸而我那半懂不懂地刚读过几本鲁迅、郁达夫、冰心的小说,便信口开河地和他瞎扯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和他的直接交谈,他谈话的亲和力消除了我不自在的感觉,不久便使我融入了整个屋子欢乐的气氛中。我看到起孟叔非常善于应对,好像学问挺大,和谁也谈得来,而且时出妙语,引发阵阵笑声。从此对起孟叔有了好感,一种钦佩、敬重和向往之情。

不久突然就出事了。江苏教育厅竟把起孟叔革职查办,并通令全省教育单位永不录用。后来想

背景很明显：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侵华野心膨胀，步步进逼，民间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浪，国民党当局却对日坚持妥协退让政策，对内加以压制，省教育厅便抓住向学生灌输民主思想、宣传抗日救亡的孙起孟下手开刀。

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来说，这显然是巨大的甚至毁灭性的打击，亲戚间渐有所闻。祖父没有和我说过，我是在学校里从侧面隐约听到的。大部分人同情孙起孟，也有人说他少年得志，锋芒毕露，咎由自取。后来知道，他毫不气馁，沉着应付。得好友相助，远走贵州，任师范学校校长。1936年又应黄炎培邀请，回上海到中华职教社任教，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活跃分子。

“七七”卢沟桥事变炮声响时，我还在南京安徽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正在期末考试。放暑假先回到苏州祖父家，又回到上海父亲家，正是“八一三”的当天。连租界上也流弹横飞，人心惶惶。不久，祖父从苏州转来学校迁移皖南屯溪的紧急通知，祖父预料战事将扩大，嘱我速离上海，到老家找外公，继续学业要紧。于是我又随亲戚逃难，经杭州回到徽州继续读高二。1938年我结识了三个青年，决心相伴远行。经地下党同志指引，辗转数千里，于9月到了陕北抗大，年底又东渡黄河，到了敌后太行山区。烽火硝烟隔断南北，从此与家人完全失去联系，互相不知生死。敌后游击区发展成根据地，也有了报刊，但很少登大后方的事情，更难见到孙起孟的活动，偶尔见到了，总是仔细地看，好像可以从中找到家人的消息，因此曾惹起我一缕淡淡的思乡思亲之念，不过很快也就过去了。

大批著名民主人士支持新政协来到解放区

1948年秋季，我作为华北《人民日报》记者到太原前线采访。一天，突然听到新华广播电台发布的消息，国民党区一大批著名民主人士，经由香港安全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大连。谁都知道，这是表明人心向背、影响时局发展的大事件，显示着蒋管区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力量的团结与强大，使人预感全中国将要发生大变化，莫不为之欢欣鼓舞。对我尤其如此，因为从长长的名单中，我发现了孙起孟的名字，渴望与他相见，探寻家人消息。此后不

断有这批民主人士在东北解放区参观访问的报道，我追随他们行踪，寻求与他联系的渠道，苦无结果。最大的困难是我早已改过名字，他怎么找得到我呢？战争岁月紧张繁忙，变动性大，慢慢我把这事也就放了下来。

岁末年初，中央军委为配合平津、淮海战役，命令围攻太原的部队暂缓总攻，一线部队从东山前沿撤下，在榆次附近村庄中休整。我忽然接到一封信，正是起孟叔写的。他说：“到解放区后，几次托人打听你的消息，均茫无头绪。最近看到人民日报上太原前线的战地通讯。有次闲谈，偶然听说作者是徽州人，又托人探询，果然是你。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禁大喜过望。”我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信中对我当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果敢行动大加赞许，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我自己长时间对这一点内心里也是很得意的。经过整风学习，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参加革命，主要还不是信仰、理论这些因素，而是求生存找出路，在时代热潮的影响下，选对了路罢了。当然，能得到起孟叔的赞许，我内心还是非常高兴的。但我最想知道的是家中的情况，信上只说：“子鼎伯（注：我祖父）已于1945年去世，你奶奶和父母都还健朗，弟弟上了中学，又添了三个妹妹，不必担心。”我还想知道得更多，却没有了。十年离乱，战火纷飞，这两三句话怎么满足得了思亲之念，但毕竟有了消息，比我想象的要好。冷静一想，可能他知道的也不多。大后方不像敌后，但他也是在担惊受怕中忽而重庆，忽而上海，忽而香港，可能连家里也未必去过。我赶紧写了回信，按他信上告诉的渠道邮去，并附了封平安家书，托他设法捎回上海。我想，一有机会我就请假去看望他。

可是这个机会并不容易得到。因为这时我已奉令调离《人民日报》，参加《山西日报》筹备工作。入太原后留在山西，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一直到1949年夏，才有机会初次来到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我在《人民日报》住下，便打电话同起孟叔联系，他接到电话很高兴，说素姑婆也到北平来了。邀我当天下午就去，他在宿舍里等我。我按时到一座宿舍楼里找到他家。他在客厅里和我握手寒暄，没有多说几句就起身对我说：“咱们先去看老人家吧，她正急着等你哩！”我跟他一起走进最里面的一间，素姑婆已笑吟吟地起身，双手抓住我的手不

放,叫着我的乳名,对着我的脸和全身,上上下下端详了好一阵,才说:“瘦弱,还是瘦弱!这些年的苦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呀?你爷爷、奶奶可急坏了,想坏了!”我笑着不知怎么回答好,起孟叔在旁笑着看完了这一场“见面礼”,便说:“妈,你们慢慢讲徽州话吧,我还要赶着去开个会,晚上回来陪你们吃饭。”

起孟叔把她接来北平,正是最繁忙的时刻,一天很少能在家停留。培公早已过世,起孟叔侍母至孝,只要在身边同住,早晚必去请安,说几句徽州话。

素姑婆说,苏州沦陷之际,我们两家先后逃难到了上海租界,后来他们家去了重庆。日本投降之后,才先后又回到了苏州。你爷爷总是挺精神的,不是作诗就是画画,老说不能当亡国奴。可是太平洋战争后,日本接管了租界,亡国奴的命运仍然难逃。再见面时你爷爷显老多了。他晚年有两大愿望,一是想看到抗日胜利,这实现了。二是想看到长孙还活着回来,却没有实现,他先走了。国共和谈时,收到过你一封信,是从河北邯郸寄的,虽然是用假名说做生意的事,但从字迹上一看是你写的,虽然他写的回信刚寄出就被退回,他仍然坚信你还活着,还为这事写过一首诗。她还说,合泰(我父亲)抗战后不久就失业了,后来只好去经营你爷爷那家衣庄,那个年月生意怎么能兴旺,五间门面缩成四间,又缩成三间,还想缩。广仁里租的房子也退了,又添了你三个妹妹,一大家人在衣庄阁楼上隔开挤着住。你弟弟读书聪明,上中学了,可是物价飞涨,日子艰难,谁也不能像你小时候那么开心了。

素姑婆尽其所知,一一娓娓道来,使我多年压抑在心底想见亲人的渴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简直像回了趟家,见了亲人又悲又喜,不知该哭该笑。

素姑婆说,她们一家在战争中也没有一天安稳过。逃到上海租界后,培公去世早,起孟夫妇又去了大后方,她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在清贫拮据中挣扎。后来经过长途颠沛流离,艰难困苦,千里迢迢到了重庆,得以全家团聚。日本投降后重回苏州。你祖父逝世,我还带着昌治去你家悼唁。起孟回到上海仍然忙着四处奔波。

她讲起儿子的事更显得神采奕奕,掩饰不住

一位母亲对儿子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她说:“忙啊,忙啊,每天总是忙。你们共产党什么都好,天不怕、地不怕,日本人不怕,国民党反动派不怕,不贪财,不图利,不算计人,什么都好,就是一条不好,不顾家。整年整月,在家里急急忙忙吃了顿饭就又忙着走了。”

我记得原话,说的就是“你们共产党”。在她看来,我小小年纪老远跑到延安去,当了八路军,当然是共产党。她儿子虽然被称作民主人士,在她看来也一定是共产党。那时候共产党还不能完全公开,却受到老百姓拥护、热爱。

没有几个月,新中国成立了。孙起孟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当时新政府人才济济,阵营强大,全国振奋,世界瞩目。党内有种种议论,有人说什么“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经批评、解释后很快平息了。其实,对民主人士安排的高低,也有不少议论。有人认为人事部门掌握用人权,不能随便交给党外人士;有人猜测孙起孟可能是个地下党员。我又想起素姑婆的话,心想:“我也有这个疑问。”那天素姑婆说“你们共产党”时,我听出了她话的意思,当时觉得不便问她老人家,她也未必清楚这些事情。只是心里想起孟叔可能是地下党员,带有点年轻人的好奇。上世纪80年代后,正式知道他这位民主人士是党员,有次谈到党籍问题,曾问他何时入党,他说:“我入党时间很晚。”只淡然一笑,没有多说。我意识到这可能涉及党内机密,也没再追问。追悼会印发的《孙起孟同志生平》中有一段话:“1939年夏,他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同志鼓励他服从革命需要,并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相勉。此后,他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和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斗争。1942年至1946年,在昆明中华职业社任职期间,他不顾自身安危,帮助了不少共产党员,并掩护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为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长期的民主斗争实践中,他更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更自觉地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奋斗。”我想,周恩来善于慧眼识人,并敢于放手用人。经过那些年艰苦复杂的斗争实践,起孟叔必定是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许、自勉,独立思考,埋头苦干,业绩卓著,不愧是“党外布尔什维克”,而且影响到全家的人。多年后昌治表弟同我说过,他们

家住在昆明时,掩护过共产党地下电台。这位同志化名钟钧,是红军中的电务人员。上世纪40年代他转到上海秘密电台工作,一度因受国民党特务追捕,又逃到孙家。恰恰起孟叔到香港去了。幸亏素姑婆认得他,二话不说就带他到苏州乡下一个熟人家躲了一阵。后来才知道他原来就是担任新中国成立时北京第一任电讯局长沈志诚。孙老在新中国成立时如此受到党中央的倚重,并在1950年入党,是毫不奇怪的。我的谜终于解开了,也对起孟叔多了一层亲近和敬重。

新中国成立后,我虽然长期在太原工作,但每到北京开会或办事,往往要去看望素姑婆和起孟叔,像过去走亲戚那样。素姑婆病逝后,每到北京,仍然要去看望起孟叔。有时谈话时间比较长,感到很愉快、很受启发。

坦然淡然对待个人处境

没有料到和起孟叔的交往又中断十年以上的

时间。“左”倾错误终于不可避免地陷入乌托邦泥潭,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了。首当其冲的是全国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我在《山西日报》任总编辑多年,当然在劫难逃。先是大字报炮轰,接着批判、斗争、挂牌、戴高帽、游街,终于彻底打倒,关进“牛棚”去了。传闻孙老也受到冲击,心想他是民主人士,不致严重到何等程度,但从此便失去了联系,不能也不便探听。

1979年我从山西被调到安徽工作,一年后,1980年5月又被调到北京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随后全家也迁来北京定居,便去看望孙老,重新有了来往。

在此之前,1975年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领导干部增加了许多新出来的人,我见报上名单里也有起孟叔,心想他的命运就要好转,这是一个准确无误的标志,可以不必再为他担心了。多年以后才从他的儿子昌治表弟那里得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孙老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七年。到底为什么呢?又怎么没事了?连家属都不知道。据说是“四人帮”要从他那里搞周恩来的什么材料,搞来搞去毫无结果。1975年周恩来已经病重,国庆节上天安门的名单仍然是他草拟的,原本写不写孙起孟,

周颇犹豫,送给毛泽东审定时,周问:“还有个人要不要考虑一下?”毛问是谁,听到是孙起孟表示同意,自己拿笔就加上了。原来如此,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1980年我哪知道这些内情?再去探望他时,还是1949年的老办法,只打电话问清楚宿舍地址就去了。他好像很高兴:“赶快来吧,见面再说。”见了面互相确实都很高兴,久别重逢么!他已经复出几年,身体经过调养,恢复得不错,气色也好,还是那么谦和的笑容可掬的样子。我不免问到他的“文革”受到冲击的情况,他只说:“冲击还能没有?也就是那些吧,大字报,围攻,批判,口诛笔伐么!”好像那些早过去了,不值一谈。根本没提秦城监狱四个字,他大概也已经了解到我这几年的概况,反倒关切地对我询问起来。我曾经长期困惑过、迷惘过、痛苦过。经历了那么一场是非颠倒,敌我混淆的暴风雨,见识了那些出卖和背叛,时代倒退,沉渣泛起,确实心情沉重。痛定思痛,对为何陷入乌托邦也有了一些初步的反思,又投入了正在艰难中摸索的改革。

记不清是1980年冬或是1981年春的一天,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林涧青通知我与另外几位室务委员一起到政协去开会。会议是政协倡议的,主持人就是起孟叔。他当时是政协党组副书记,政协方面参加的人数相当,都是党组成员,这次会议主要是商谈双方如何紧密合作,加强交流情况的渠道,对某些调研课题进行协作,供中央高层抉择。大家谈得很愉快,许多人都发了言。

他在这个会上的两段话我至今未能忘却。

他说:“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在许多事情太不实事求是了,完全走到了反面。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按实际情况办,按中国国情办,回归实事求是的传统。陶行知原来叫陶知行,他深知实践第一的重要、深知行的重要和困难,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

他说:“下情上达,了解群众真正的困难和需要,很不容易。有些人认为,把意见反映到我们这里,就算‘通天’了,就能够解决了。其实哪有这回事?从我们这里‘通天’比从他们那里反映给我们,困难程度至少不相上下。所以,对各位我们真心诚意寻求帮助,多多拜托!”

这两段话,夹杂在许许多多的话里并不显什

么特别,但我以为针对性、现实性很强,甚至有“刺”。他同许多老同志一样,走了一大段弯路,急切地要总结教训,加快改革,把失掉的时间赶回来。“不用扬鞭自奋蹄”这句话他用了两三次。他待人谦和,彬彬有礼,表达意见重视掌握分寸,所以容易与人达成共识,取得一致。我后来离开了书记处研究室到了农口,不知事情进展结果。

上世纪80年代前期,正是农村改革的黄金时代。家庭承包责任制得到中央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之后,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取代了农村人民公社。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蓬勃迸发,显示出无穷的生机与活力。但是,来自旧体制、旧观念的阻力还是很多很严重。“包产到户”从“复辟资本主义”变为“农民的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之后,广大农村中出现了许多“种粮大户”、“专业户”、“重点户”、小商店、家庭工厂,带动了全国商品经济最初的发展热潮,成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前奏。这时,“雇工剥削”问题又被尖锐地提了出来,甚嚣尘上。中央不急于表态,而是先派人下去调查。有次在起孟叔家里谈到这个问题,说起调查中了解到的各种复杂情况。他插话说:“人数不是最重要的。从经济发展来看,资本家的定位首先应该是工厂的管理者,是生产要素。作为资本的钱也是生产要素。改革就是要促进这些要素的流动和合理配置。为什么一说雇工就是剥削,不能不看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后遗症,你想想,这个口号1962年就提出来了,强调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连续讲了几十年,是多么深入人心,哪能一次会上宣布取消就取消了。要做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情。”这些话他以平静的语调随口而出,我当时就感到很有启示。我如果就此提出什么问题,讨论还会再深入下去。我们一般谈话都是讲徽州话,真是随口而出,随后忘掉,只有印象深的留下点记忆。从来做过笔记、追记,次数多了,受到的教益是不知不觉的。我感到起孟叔是勤奋学习的,他的秘书说:“孙老直到晚年病重,每天还要在桌子边、藤椅上翻阅报纸、文件,桌上总放着那本辞典,时不时就要查一下。”

我从多次交谈中感受到他为人处事的原则性。我们是亲戚,过去谈话拉拉家常,很少涉及彼此的工作和政治,后来熟悉了,也更随便了,有疑

问就想问他,他总有回答,并不避讳,也不乱说。我发现他绝少背后谈论人,更不用说是有意吹捧或贬损。不少人都知道黄炎培十分器重他,1936年当他遭到打击、身处逆境时,黄炎培热忱邀他到上海中华职教社任教,抗战爆发不久,就派他到重庆任职教社四川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邀他共同筹组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负责主持日常工作。1947年被推派为民建驻港代表,建立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联系;1948年5月,又代表民建赴东北解放区,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秘书长,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这些事都和黄炎培紧密相关,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多次长谈,也曾涉及黄炎培和民建,我回忆他的话都是比较得体的,表现了谦虚和实事求是。著名的大诗人赵朴初是他东吴大学的老同学,两人情谊甚笃,家属子女来往亦密,我在他家案头、墙头偶见赵朴老的诗作,也没有听他说过他们间的私人交往。

我还知道,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不少被批判、打倒的右派家属生活发生困难,他曾尽其所及,默默无闻地做过一些救助工作。

社会主义改造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十年动乱中不知怎么就把“定息”取消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些民族资本家及家属也发生困难。他对这件事很重视,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促成了补发“定息”的实现,解决了他们的困难,这对私营企业重新崛起显然是有好处的。

他早年是个教育救国论者。在抗日救亡时代大潮中,一直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许自勉,入党以后又以共产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认为,他的一生应该称为一个与时俱进的思想者、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坚定不移的改革者。

晚年致力于民主的理论探索

本文开头提到,孙老晚年对协商民主的实践和理论有过一番探讨、研究之意,这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事情。他已经是八旬老人,仍兼任几个领导职务,时间却比较充裕了。我也已入古稀之年,还不时应邀到外地参加研讨会或做一点调查、考察,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比较多,经过多次倾心交谈,我们好像缩小了年龄的差距,情意更加

融洽,可以随意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往往都是说徽州话,上年纪的人用家乡话静坐对谈,真有种说不出的惬意。此事就是一次在交谈中提起的。

孙老颇有理论素养、理论兴趣。出任民建主席之后,曾聘吴敬琏、董辅初、厉以宁等一些经济学家为顾问,我也在其中,还到中央统战部会议室开过一次座谈会,正式发了聘书。我到外地时间较多,并没有多参加活动,倒是到孙老家看望,大概一个半月左右就有一次。新加坡帮助我国合作创办新型工业园,是改革开放中很引人关注的大项目。有次我从南方回来,看望他时顺便谈起,因为提到苏州,他说:“有个材料你不妨看看。”说着便从抽屉里找出一个大信封,里面却不是什么工业园材料,而是当年苏女师闹学潮的几个学生所写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写得很生动,不仅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慷慨激昂,也可以看到那位思想民主作风也民主的青年教师如何向学生做工作。我想,起孟叔阅历丰富,如能写出来很能感动人启发人,也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那一段历史,便建议他写本回忆录。他却说:“不急,也没有多少值得写的。这几年国内外风波不断,苏联解体,东欧变色,我们却继续平稳较快发展,靠的是什么?‘发展是硬道理’起了大作用。但是,长时间过分强调难免发生另一方面的问题,追求GDP的声音压倒一切,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过多,就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扭曲、变形,在二元结构下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扩大,贪污腐败日益加剧,成为令人担心的突出矛盾了。”我很赞成他的看法,便也说了些意见。

他忽然问我:“徽州有句老话,叫‘前有孔夫子,后有朱夫子。’你听说过没有?”我说:“听到过一点。”其实,我对此了解甚少,既然问到便不能不知一说一,知二说二。于是,把我了解的朱熹理学、“三纲”、“五常”、“明天理、灭人欲”及其对巩固封建专制制度、加强皇权主义意识的作用说了一些看法。他说:“对!”接着,他说了一大段话,大意是,“三纲”孔孟都说过。孔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儒学内涵很丰富。值得重视的,是孔子对人的概念是平等的,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尊重、互助互爱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人的本质就是“仁”。他主张“仁者爱人”、“泛爱

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秦始皇建立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封建政治已相当成熟。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是封建统治者利用了儒学。此后,儒学为皇权主义服务的色彩越来越浓。近500年明清时期,中国治乱兴衰的历史已经走过几个循环,始终走不出小农经济、封建王朝的框框。而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进入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促成生产力空前未有的大发展,西方列强称雄全球,中国却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侵略战争不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而知识分子中的仁人志士,发奋图强,追求现代化。应该说,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康梁维新,就开始了向西方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1919年五四运动是思想文化革命,打倒孔家店,请来德(民主)、赛(科学)两先生,实质是启蒙。不料日本人来得那么快,要独吞中国,不能不集中力量先抗日救亡。以后的事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了。回顾历史,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工业化的道路也应与西方有所不同。既要学西方,又要重视自己的国情,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传统,走自己的道路。我最近常想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大家都熟悉的话,方才问你朱夫子也是为了这句话。我国封建社会极权统治的理论框框是以“君”为中心的“三纲”。然而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只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互相都有责任和权利,是双向的关系。孔子说“克己复礼”,又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要作修改,这都体现了他的人本思想。他强调修、齐、治、平,目标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而朱夫子对“三纲”赋予客观真理的哲学形式,使“五常”成为与“三纲”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于是,人的价值就在于实践“三纲”、维护“三纲”。“三纲”、“五常”就成了人的最高价值目标,也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稍有违背,就为社会所不容,所以要“灭人欲”。说穿了皇帝就是天子,皇帝高于一切,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朱熹理学后来成为儒学的正宗,成为历史前进的最大阻力。最近我读了几篇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章,又翻查了几本书,才领悟到列宁主义不是至少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发展的,马、恩本人对前期作品中的一些观点作过郑重的反思。重要的是我们学的甚至还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的联共

党史。所以，我们不仅有两千年以上的皇权主义的老传统，又有不到百年却更为直接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传统。两者相距十万八千里，却又紧密结合，纠缠不清。改革开放初，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思想解放，没有这种非凡的理论勇气，就不可能有扭转乾坤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如今这巨大辉煌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当前政治体制改革要走出困境，加快步伐，思想理论方面非进一步正本清源不可。也就是要弄清楚民主是什么，到底怎样落实民主集中制，前提是怎么认清自己的国情？怎么认识和学习西方的经验？怎么认识和继承发展自己的传统？他一口气说到这里，才稍作停顿。我赶紧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应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写出一篇文章来。”他却平静地说：“刚刚提出问题，自己还没有想清楚，怎么能写文章？”话虽如此，我相信他对此已作过相当长时间深入的思考了。

1993年，孙老在民建内部经过一系列讨论和研究，3月1日，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3月18日，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作为补充条款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孙老认为，这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特点就在于这个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是共产党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与八个民族党派亲密合作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点就在于这个政党制度有利于维护、巩固和发展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增强我们国家处理应变的巨大民族合力。孙老认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一个坚持一个发展，两者缺一不可。不坚持，发展就会失去前提和基础，正确的方向也难以保证；不发展，坚持就容易流于僵化，丧失其生命力。

一次我外出回京又去看望孙老，他把多党合

作制写入宪法的事谈了一下，就又谈到政治改革的问题。他说：“上次我们谈的题目不好下手，不如先找些资料，研究点具体经验。建国初期，政务院每周必开一次政务会议，是周总理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之一。作为副秘书长，我必须列席会议，因此手头还有些残存的资料。新中国的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权机关，政务会议又成为推进多党合作、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的最高活动场所之一。研究这个问题，我想就从整理残存的材料入手，我写了一小段，你拿去看看，提提意见。”我正想看，他说：“这份复印稿是送你的，回去再慢慢看，先谈谈你新的见闻吧。”

回家我仔细看了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短文——《罗隆基眼里的政务会议》。这个题目就吸引了我。心想，罗隆基鼎鼎大名，民主同盟的负责人，1957年的大右派，高傲自大，目中无人，谁不知道？他眼里的政务会议能有什么客观公正的看法？

起孟叔的文章说：

我同罗隆基40年代在昆明就相识，可以随便交谈。有一天我问他：“努生先生，你为什么住医院还要参加政务会议呢？”他稍微沉吟一下，讲了一段话：

——说实在的，有些会我并不乐意参加，觉得参加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政务会议在我心目中却大有不相同，不论我怎么忙，身体怎么不好，总要参加。这是为什么呢？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得到的教益很深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周总理的讲话见解精辟，纲举目张，其水平之高是一般领导人所达不到的。然而它的最大特点还不在此，而在于周总理在讲话中把其他人发言时哪怕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同时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实际上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

读完这篇短文，当时我的感受是：一，罗隆基这个人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我和他并未接触过，可说不了解，为什么一见到题目上的名字就有“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印象呢？显然是反右派斗争留下的成见即“左”的遗毒作祟，值得我自己反

思。二，文中说罗对周恩来的崇敬有可信度，是“心悦诚服”，也就是孟子说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逮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三，最重要的是论证了执政党与参政党搞民主协商关键在执政党平等待人。平等才能显示尊重，形成民主，能够协商，解决问题。如果居高临下、颐指气使，那当然不行。但表面谦虚，内心仍然我是老大，得听我的，也还协商不好，不能解决问题。这才是要旨所在。

这次我又找出这份材料看了一遍，最后周恩来的那段话，初看时觉得比较熟，便忽略了。这次仔细品味，才领悟这段话更加精彩、深刻，堪称经典。起孟叔引用周恩来的原话说：

“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好处在哪里？从根本上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按宪法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国家事务。从作为建设国家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完全有必要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兼听的过程中，还得“分辨出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对的”，周总理把这看作对共产党员的“锻炼、教育和学习”。政策的要求到这里还没有打

住。按周总理的分析，至少还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摆事实、讲道理，帮助同盟者接受真理、修正错误；同时，同盟者也可以对居于领导核心地位的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实行民主监督。二是经过民主协商，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同盟者取得共识之后，通过他们“把党的政策传达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中去”（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232页），共同努力，把国家的事情办好。那样，这部分同盟者就成为建设国家的动力。（1994年5月25日刊于《光明日报》）

这段话朴素实在，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又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可惜只见到这一篇，没有再读到别的。此后他住院的次数渐多，时间越来越长，但是我相信他一定继续在想、继续在写……

这位百岁老人走了，中国改革的实践还在不断地发展。就在孙老逝世的三月，又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两会”。今年的“两会”较往年有明显的进步，特别是选举人民代表的比例，城市和农村原有的4：1的差别，这次修改《选举法》，把这个差别取消，城乡一律平等了。这大概是孙老在天之灵也会感到高兴的吧。

四月七日

（责任编辑 吴 思）

SIEMENS
SW 声望听力
好听力，好生活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聩耳鸣的烦恼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层

电话：010-84608877 400-610-0896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9080150号

我给吕正操当秘书

• 张友坤

2009年10月13日,吕正操将军逝世。我曾在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将军(时已年过八旬)身边工作,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其道德情操、言谈举止,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有一次,他在参加讨论十三大报告时,认为把成绩说得太满,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没留余地;在有关交通运输业的提法上没有突出重点,缺少建设中心。对于前者,他让我尽快询问国家计划委员会有关部门,查阅一下我国国民经济历年来的发展情况,并将结果告诉他。对于后者,他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应明确提出“尽快发展以铁路建设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查的结果是除十二大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较快外,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困难时期后的1963至1966年,国民经济的运行也是很好的。因此,他建议在报告中应表述为“十二大以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

1986年5月下旬,我随他到江苏检查全国政协委员落实政策情况,并参观了6个不同性质的工厂(武汉柴油机厂、株洲电力机车厂、杭州第二中药厂、常州柴油机厂、无锡无线电总厂和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回来我把他参观工厂时的几次讲话归纳为“关于搞活企业的几点建议”(后来以吕正操“关于搞活企业的几点建议”为题,刊于当年国家经委出版的《经济工作通讯》上)。在送给计委吕东同志前,吕老发现其中一个数字有误,让我打电话核实,结果他的记忆准确,而我却记错了。

1987年7月,我随他回家乡海城探亲,住市委招待所。在视察乡镇企业、西柳大集、民办中学、“花果山”后,我提出,把他年迈多病的胞妹及有关亲属接到招待所,吃顿团圆饭,叙谈阔别之情。为了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同时也担心三妹见面时心情激动而犯病,政委(他最反感我们这些在他身工作的人称他“吕老”,可又不能直呼其名,只好称他政委,即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的简

称。)不同意这样做,只是让他的夫人刘沙趁大家参观西柳大集时,单独乘车去看望病重的三妹。三

妹含泪说:“我的病要能好点,还想上北京再看上我大哥一眼。”由此体察到他们手足情深,盼着兄妹相见。后来,征得政委同意,当晚我们悄悄将他三妹接到招待所,兄妹叙旧谈心。他老人家眉开眼笑,病容顿消,短短的亲情会面,她不但未因激动而犯心脏病,而且听说回去后心情特好。

探亲期间,政委多次告诉当地干部与乡亲:农业是根本,是基础,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农业发展了,工业才有市场和原料,才有后劲儿,钱多了,也不能乱花,还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底子薄,是个穷国,不少地区还存在温饱问题,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干扰和十年动乱的破坏,使我们与先进国家原有的差距又拉大了,因此,要把眼光放远些,要有大目标,尽量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扩大再生产和兴办教育事业上。在参观了农民投资150多万元创建的一所能实施9年一贯制教育的育英中学时,吕老挥毫泼墨:“莫把财富当遗产,唯有知识能兴邦。”并告诉时任海城市委书记的于均波(后来调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同志:“看来海城的教育是大发展了,但不能满足。你们提出先富农民,后富干部,先富乡,后富县。这很好,但还应该加一条,先优师,后优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想办法提高教师待遇,尽量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树立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回程上车前,在乡亲们的一再劝说下,政委还是接受了原县委书记鲍辉送的10斤他最爱吃的高粱米及侄子自己做的一罐豆瓣大酱。

在视察东北森林火灾灾情期间,政委不住宾馆,唯恐给地方增加负担,白天到灾区察看,食宿均在火车上,必要时由地方干部到车上作简要汇报。在某车站停留时,地方上事先未与我们联系,



吕正操



吕正操在签名赠送笔者《吕正操回忆录》

就准备了午饭，记者们还扛着摄像机，在火车站迎接政委下车，但都被一一谢绝。他最反感在外工作时，前呼后拥，请客吃饭，保卫“森严”。地方上负责接待的同志也开玩笑说：“吕老，你要能把这一套‘规矩’都取消了，我们就不跟着你了。”

在无锡市，他想买点碧罗春新茶，市政协的同志要赠送，吕老说，不要钱，就退给他们。结果是付了钱才要茶。在杭州中药制药厂参观时，其厂长按出厂价卖给我们随行人员一些“青春宝”（当时很畅销），我一再说，我们有规定，不能买。厂长说，没事，吕老有意见，我来解释。此事在回程的汽车上被吕老发现了。他说，你们怎么在这儿买人家的东西？占便宜，北京药店有的是，干吗要在这里买！厂长赶快解释：“吕老，这是我让他们买的。我厂每年的广告费就要支出上百万，他们用后也可给我们做点宣传。”

吉林市在北京饭店举行“人参节”，他们没有按预定时间把请柬送到，在我下班后才派人给政委送来请柬和一盒人参。我在电话中让他们把人参拿回去，请柬留下。当第二天向政委报告时，他问：“到时吃饭吗？”我说：“中午有饭。”他说：“那我们下午再去。”他真的这样做了，使邀请者很难为情。

有一次警卫员在我们的公务车上给朋友带了一台电视机，受到政委的批评。他说，有铁路，又有邮政，干吗要在公务车上给人家带东西，以后不能这样做。从此，遇到有关事情，我都特别注意。

还有一次，我在抄写一份文稿时，不慎将“尊”抄写为“遵”，被政委发现。他不紧不慢地说：“大学生写错别字，不应该。”站在一边的另一秘书说：

“我也看了几遍，也没发现。”表示他也要承担一份责任。政委说：“这说明你们都是马大哈，做事不认真。”当我们有些面红耳赤，不好意思时，他又半开玩笑地说：“当年我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认真得很，哪能出错？当然，那时我每月有几百银元现大洋的薪俸。”说得我们笑而不语。

在视察中苏边界我方某哨所时，政委即兴题了“北国干城”四字，当时一位师参谋长低声问我，这是什么意思，因我实在没把握说准确，就小声告诉他，大概是北方保卫者的意思（看来是猜对了），政委听后问：“‘干城’一词出自何处？”“不知道。”我实话实说。“你回去好好读读《诗经》就明白了。”他十分自信地说。

在游完长白山天池临走时，游览区的领导邀请政委题词留念。政委的夫人刘沙问，要不要张秘书给你拟几句。他摆手示意，不要。他稍加思索，便挥毫书写：“一池浓壁好景，天成溯源观瀑，不虚此行。吕正操 1987 年游长白山。”短短的 16 个字，已勾画了天池的美景和笔者的心情，并道出它是松花江的发源地。

政委每次会见外宾前都要问清外宾的姓名、性别、年龄、爱好、访问内容与接待单位等。因为我缺乏经验，第一次就忽略了这些细节而受到他的批评：“你都没有弄清全部情况，给我说什么，弄清了再说。”

政委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要他题词、写信的单位，都必须有单位部门的正式介绍信和证明，如果是为某著作题词时，都要亲自看原著清样。他曾为我编著的《张学良年谱》题写：“巨擘扭转乾坤，丰功彪炳史册。”在给我撰著的《张学良世纪风采》（大型影集）和《张学良画传》题词时，他还认真为文字部分做修改。

在我的印象中，政委题词较多的是冀中方面的要求、铁路方面的邀请，以及有关张学良著作和纪念馆等。他常说，我的字写得不好，又不是书法家，最好不给人家题词。即便题词，他也从不收取分文。有一次沈阳铁路局拍了一部电视剧，请他题写片名并寄来了 300 元的“润笔费”。我照规矩如数退回，毫不含糊。

仅此以上诸点，足见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知识渊博，记忆超群，始终关心国家大事，心里装着人民。

（责任编辑 萧 徐）

保育钧：“两会”应该关注什么？

• 马国川

采访时间 2010年3月21日

采访地点 北京万寿路万寿茶宴

被采访者：保育钧，蒙古族，江苏南通人，1942年生，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编辑、国内部编辑、政文部负责人、科教部主任、报社编辑、秘书长兼老干部局局长、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1996年任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1998年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2000年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现任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

“不是看不懂，是不让人看懂”

马国川：今年的“两会”看起来很热闹，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反而有一些代表委员的言论和提案很“雷人”，有的甚至传为笑柄。

保育钧：在我看来，许多代表委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职责，不清楚自己该关注和讨论什么问题。

马国川：在您看来，哪些问题应该关注和讨论呢？

保育钧：如果笼统地说，代表和委员应该关注和讨论真正与国民有关的切实利益问题。具体来说，有五个方面问题。第一，应该也必须审查预算报告。怎么保证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必须做到税收法定。以2009年为例，GDP增速是8.7%，财政收入增速是11.7%，达6.8万多亿。今年一、二月份，北京税收增长32.8%，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路走低，现在只占35%，比解放初还低，国富了，老百姓穷了，这样老百姓怎么能够消费？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钱怎么收的，怎么花的，都要由最高权力机关来决定，不能由任何其他机关决定，再让代表走过场式的“审查”。

马国川：许多代表根本看不懂预算报告。

保育钧：过去，每次“两会”期间，报告财政预算情况，头天晚上才发下那个表格，第二天就得收回去，看也看不明白。不是看不懂，是不让人看懂。今年财政部公布的数字很有意思，画了一个直观的图表，这个多少，那个多少，就是没有国家行政支出，加起来两万亿，还有两万多亿跑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国防应该占多少，教育应该占多少，行政支出占多少，都应该由人大讨论决定。过去陈云讲过，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现在还是这样。首先是吃饭，把我们这些干部都养起来，剩下的钱搞建设，而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没有真正让人大代表来决定钱该怎么花，花到哪里去。其实，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这样做的啊，瑞金时期也是这样。不要照抄国外，抄老祖宗也行啊。

国企改革还没有破题

保育钧：除了审查预算报告，第二个应该关注的是国企改革。

马国川：近年来“国进民退”的争论很激烈，一些部门坚决否认存在“国进民退”现象。

保育钧：“国进民退”是一个现实问题，否认不了。“国进民退”的实质是什么？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权力配置，还是市场配置？配置的时候是往国企倾斜，还是往民企倾斜？国企占了那么多资源，国家给了那么多钱，对国家的贡献却远不如私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现在的国有企业不是凭借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是靠权力配置资源的优势。到了这一步之后，国企比不改革还坏。国企成了无法无天的恶霸，政府管不了它了，现

在它成了独立的市场主体了,对我有用的我听你的,对我没用的我就不听你的,并且还在肆意扩张。不光是抢地皮,现在国有企业开的酒店就有两千多家,一般都是赔钱的,成了吃喝玩乐、搞腐败的场所。

马国川:国企确实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最典型的反映了权力和资本媾和的权贵资本主义。

保育钧:目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11.3万户。国资委只管理其中128户央企和各级地方国企。在国资委管理势力范围之外,还有五大类国企,包括80多个国家部门下属的6000多家国企,中央一级的30多家国有金融企业,此外,还有铁路、烟草、邮政企业以及科教文卫等行政事业单位下属的由非经营性转为经营性的国企。除了烟草公司之外,这些企业的税后利润绝大部分均留在企业内部,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成为马立诚所说的“豪门经济”。它们凭借垄断地位侵占老百姓的利益,对国家也不买账。许多官员都是国有企业出来的,千丝万缕,搞不动它。现在必须要真正搞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当干什么?尽管嘴里说,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骨子里是排斥的,视为异己力量。我们这代人深受《资本论》影响,背熟了“资本自从来到世上,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个剥削、一个资本、一个私有制,脑子里总是排斥的。可惜理论界没有勇气讲清楚,马克思当年讲的理论是指导工人阶级起来夺权指导革命的理论,现在掌了权,还用革命理论来指导,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马国川:能否定吗?这里有革命合法性问题。而且意识形态更多的时候是幌子,根本问题是利益。

保育钧:国企改革远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破题。“两会”几乎没有人真正关注这个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要真正搞明白,国企的责任就是集中去搞公共产品,光提保值增值也是错误的。说涨价就涨价,谁争得过它们?深化国企改革,还必须把央企等大型国企列入各级政府预算,接受各级人大监督。国企红利应当由全民分享,而不能任由国企内部处置,形成特殊利益集团。

各种自然资源全部在权力的掌握之中

保育钧:第三个问题是金融。

马国川:在一些人看来,金融没有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可是我们这里没有事啊。

保育钧:这是井底之蛙,自欺欺人。美国是金融衍生品失去控制,我们呢,还没做到这一步,侥幸躲过而已。现在中国的金融看似是多元化的,实际上是一元化。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膨胀得不得了,前几年不到60万亿,现在83万亿,真正的净资产不到三万亿,其他的都是负债,包括企业存款、政府存款和老百姓存款,而且企业存款和政府存款超过老百姓存款。虽然早就提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多种所有制,多层次、结构合理、运行安全的金融体系,实际上现在还是政府垄断了金融资源,14家股份银行也是国有控制,没有民间商业银行。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办银行,但是中国自己不能办!把老百姓的钱拿过来,只许我经营,不许你经营,吃存贷款利差息,练不出真本事。没有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健全金融体系,没有大量中小银行参与竞争,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难就很难解决。现在允许搞村镇银行,但是还必须国有商业银行控股。为什么现在炒房、炒地、炒股票?就是那么多的民间游资用不出去。

马国川:也就是说,金融资源也是权力配置。

保育钧:其他各种自然资源全部在权力的掌握之中,自然资源不光是矿,空中频道是不是资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应该交频道占用费,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是个资源问题。城里人毕竟还有块房产,买了房子有产权证可以到银行抵押贷款,而农民却不同。第一房子不能抵押,第二承包的土地多数地方不承认产权,到银行抵押人家也不认。因为始终不动土地所有制,农民对土地没有自主权。农民的土地为什么不可以转让?应该让农民真正有自己的产权,尽快让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抵押,住宅、宅基地都能够流转。转让后才可以进城买房子。现在开了个口子,说进村镇可以转户口,不给

农民土地权,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政府自身的问题。政府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才有理由存在,不应该有自身的利益。可是,现在官越大权越大,能够配置的资源那么多,政府本身成了利益主体了。现在都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是政府转变职能,把该放的权力放掉,真正从权力配置资源变成市场配置资源。没有这样的转变,一切都是空话。

不触动现行不合理的体制,解决不了深层次问题

马国川:您所提到的五个方面的问题确实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为什么没有代表委员涉及这些问题,而是热衷于“雷人”话语,甚至歌功颂德呢?

保育钧: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官员啊。人大代表中85%是各级官员,一些成为代表和委员的私企老板也是利益集团里的,他们分了“一杯羹”,怎么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呢?有些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些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维护既得利益嘛。

马国川:所以一些朋友说有两个“两会”,一个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两会”,一个是老百姓网上开的“两会”,话题完全不一样,而且很对立,后者对前者充满了冷嘲热讽。

保育钧:要通过改革,让人大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不能在最高权力机关上还有一个“太上皇”。代表首先得是真正的代表,而不是官员。人民代表是代表人民来审查政府工作。要参政,不是议鸡毛蒜皮。至于政协,应该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舞台,有代表工人的,有代表企业家的,有代表知识分子的,也有代表农民的。现在政协慈善界的都有,竟然没有农民界的!

马国川:出路在于改革。

保育钧:还是要依靠民众,指望既得利益者不行。改革应当是一个神圣的词语。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30年的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可是近些年改革的力度有所削弱,甚至被异化了。为什么?因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

说改革被异化,就是权力配置资源取代市场配置资源的现象复活了,如果是不受监督约束的权力配置资源,那就更是倒退了。

马国川:有一些人假改革之名,行营私之实。有些人把改革当做口号,缺乏真正能够触动不合理体制的实际动作。

保育钧:如不抓住这个要害,光说大而无当的空话,不触动现行不合理的体制,深层次问题解决不了,就会贻误了改革的时机。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不得已采取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包括财政投资、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必要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要看到,这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不应是常态。现在的危险在于,一些人据此认为市场取向的改革失败了,美欧都不行了,还得靠政府强势的干预,靠政府权力配置资源。这些人不知道,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恰恰是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任由华尔街贪得无厌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骄傲自满,不能得意洋洋,而是必须深化五个方面的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政府自身改革。

马国川:从根本上说,五个方面还是要依靠政治体制改革。

保育钧:从一定意义上说,五个方面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我坚信,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是中国大趋势,如果不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不改变政府权力配置资源的模式,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但是现实大格局已经形成,利益格局已经形成,要突破很难。越是这样,越要坚定信心。就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所宣示的那样:“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从消灭私有制到以人为本

• 林蕴晖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从建国以后第三年（1952年）秋季，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算起，经过30年的实践，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向全党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需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 we 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1} 邓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的最早反思。此后，1984年邓在同外国朋友的一次谈话中说道：“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2} 1985年，邓更向人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3}

搞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竟然说没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在批判赵紫阳的时候，有人质问赵说，你是党中央总书记，竟然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实际是在质问邓小平。可以认为，1978年以后30年的改革开放，党内不断出现姓“社”姓“资”的争论，正是这种质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回顾一下这60年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过程，对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会是有益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

首先得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对社会主义是怎样认识的？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人作过回答。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刊登了一篇署

名笑蜀访问李锐老先生的文章，标题是：《宪政主义与现代中国》，副标题是：《李锐访谈录：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史》。

访者：早年你参加共产党，肯定是向往社会主义的，那么你当时想象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

李锐：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

访者：为什么？

李锐：因为苏联强大。当时我们认为，苏联强大是计划经济的成就，对计划经济是正面理解的。苏联那时候被我们看成是人类未来的样板。

访者：你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在到延安之后？

李锐：到延安之后也只有一些很粗浅的书可读，那时我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联共党史》，这本书是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也是相信这本书的，尤其是《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这是当年的干部必读书。

关于《联共党史》里所表述的社会主义，概括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 公有制 + 计划经济 + 舆论一律。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这可以说是前提，所以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搞社会主义主要是把原来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建立由国家统一管理经济的计划体制。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说，研究马列主义，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注4}

1953年,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所反映的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注5} 后来又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注6}

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就是消灭“私有制”。对这一点,周恩来和刘少奇也都有过说明。

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说:

“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注7}

1954年1月20日,刘少奇在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总路线作了理论说明。他首先指出,“列宁主义过渡时期的学说对于我们是完全适用的。”毛泽东同志最近所规定的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按照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运用列宁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而提出来的。接着说:“列宁教导说,决不可以把建设社会主义看做成是轻而易举的事。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最后消灭一切形式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要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成为全社会的唯一基础。”^{注8}

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夏季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后,掀起一个热潮,人们对十五年要做的事,一下子在三年时间就要完成提出了疑问,刘少奇解释说:“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于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形式,用多少时间来改变这两种所有制,特别是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可以根据各国的客观条件来决定的。”^{注9}

刘少奇的以上论述,可以看成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当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实理解的集中反映。

基于以上的基本认识,当对个体农业、手工

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的时候,中共八大正式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

社会主义要有点资本主义作补充

就在1955年冬到1956年初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党中央领导人已经发现,把所有的行业都改造成公有制,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都由政府来管,完全打乱原有的生产经营链条,造成了供、产、销脱节。由于实行统一计划安排生产、产品统一计划包销,生产单位不必关心市场需求,导致商品品种减少、规格单一、质量下降;统负盈亏、固定工资(农民按工分计酬),也使原来的个体手工业者、原有的夫妻老婆店和农民因吃“大锅饭”而失去了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既影响生产,又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作了《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和罪行。更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注,毛泽东由此提出要“以苏为鉴”,对苏联走过的弯路,我们要引以为鉴。此后,中共八大就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构成提出了新的设计,这就是有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具体内容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注10}

同年12月,毛泽东同工商界负责人谈话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11} 刘少奇也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

济作比较”。^{注 12}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必须允许个体经济、市场调节和自由市场,甚至还可以又搞资本主义,当年只是作为克服暂时出现的困难,弥补目前制度的某些不足而提出的政策措施,并没有作出理论的论证。相反,中共八大在提出一系列新政策的同时,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则继续写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继续采取正确的方法,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因此,八大前后所产生的上述新思想的萌芽很快夭折,就不奇怪了。这说明,要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观念中突破出来,并非易事。

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

这个话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讲的,原话是:“什么叫共产主义呢?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是为公的。”^{注 13}

从 1958 年到“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来看,正是这样认识的。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注 14}

在超英、赶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1958 年毛泽东发动了经济建设“大跃进”运动,与之相应的是在农村建立起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当年人们的认识是,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农业社纷纷合并组成人民公社(中央北戴河会议决议就规定户数可以从 2000 户到 6000 户或 2 万户以上),取消自留地,组织公共食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提倡吃饭不要钱,实行供给制,还要破除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消除各种差别。当时,把人民公社在生产水平极其低下的状况下,实行平均分配的办法,看成是已经找到了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

1958 年 8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人民公社时就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注 15}并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主要是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改变成全民所有制,这种改变大概需要三四年,或五六年时间。根据这种认识,会议通过的决议宣称:“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1958 年到 1960 年三年“大跃进”造成的损失达 5000 多亿元人民币,导致了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 3000 多万人口。本想创造一条自己独特的建设社会主义和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结果是在原有苏联模式的基础上越走越远,企图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实行单一公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胡绳称这完全是一种“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注 16},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面对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和人民饿饭的现实,1961 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一些环节作了松动,具体说就是“三自一包”——给农民发放“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让个体经营的手工业和商店实行“自负盈亏”,农村搞“包产到户”。对如何能更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陈云更主张“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当面向毛泽东提议。对这一历史情节《陈云传》作了详细叙述,时间是 1961 年,毛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作农村调查后,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谈到农民和农村干部提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要求。毛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包产到户就不能听。”田将这个调查报告送给陈云,陈读后说:“观点鲜明”,并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提分田到户。”陈要姚依林帮他算一笔账,分田到户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粮食。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6 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他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先后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周恩来交换意见。刘表示同意,林彪也同意。邓说这是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各样方式。周第一天听后说

要考虑一下，到第三天周说耕牛农具等已经合了，不应再散。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恢复农业，群众中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7月6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讲了自己对恢复农业生产想了一些意见，希望当面与毛谈谈。毛即约陈谈了一个多小时。毛当时没有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很是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注 17}

以上表明，毛泽东当时虽然对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表示同意，但绝不允许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所以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严厉批评了所谓的三股歪风，即“黑暗风”（把形势说成一团黑）、“单干风”（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翻案风”（翻1959年庐山会议批右倾机会主义的案），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是主要矛盾，重申“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3年，毛多次把所谓的“三和一少”（指对当年称之为的帝、修、反采取和缓政策，对正在兴起的民族独立国家的援助要量力而行）“三自一包”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和国内纲领；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更向人们提出：“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各省委要顶住！”1965年制订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正是为了捍卫单一、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分配大体平均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当中，除了打倒所谓“走资派”外，就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提出“要斗私批修”，强调要做到两个“决裂”：与私有制决裂；与私有观念决裂。就毛泽东而言，这是为实现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理想蓝图而进行的战斗，而且不只一次，要隔七八年就来一次。

对毛泽东所要追求的社会主义，胡乔木在

1980年6月9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谈话时说：“仔细研究一下中央一九七六年四号文件（毛泽东关于“批邓”的谈话——引者注），一九七四年理论指示，一九六六年五七指示，可见这三个文件确实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相当带乌托邦色彩。”^{注 18}

“五七指示”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林彪送来的总后勤部一个报告上写的批语，毛称赞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他强调各行各业都要像解放军那样，以一行为主，兼学别样，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不变色了。

1974年12月，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注 19}

可见，毛泽东所要建设的是一个在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基础上，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否定市场经济，否定物质利益，收入大致均等，以平均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带有更加浓厚色彩的军事共产主义。林彪所说的“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可谓是点眼之笔。

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

从以上这段历史，人们可以看到从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都把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基本制度。实践证明，当年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剥夺剥夺者，即没收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由国家来统一安排和调节生产，以为采用这样的办法就能调动全体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分配，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这只是一种主观设想。但从斯大林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来，人们不顾本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简单地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当成是建立社会主义

的主要任务,显然是本末倒置,把手段当成了目的,这就大错特错了。实践表明,原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商品短缺,老百姓都在过着穷日子。

所以,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不得不对30年来我们所搞的社会主义进行反思。

1978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讲话中就提出:“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注20}当年农村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万里说1977年他在安徽农村看到的是:“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注21}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说:“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注22}1984年6月,邓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更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注23}

但是,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以后,几乎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包产到户、个体经济、开办特区、八个以上的雇工、私营企业、市场经济等等,都有人提出姓“资”姓“社”的质疑。邓小平坚持“不争论”的原则,倡导“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为什么?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我们骂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修正主义,苏联骂我们引经据典是教条主义。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谈到当年争论的教训时说:

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

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

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注24}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党内、甚至中共高层很多人并没有理解邓的这一席重要谈话,一直到1992年邓的南方谈话之前,都在姓“资”姓“社”问题上喋喋不休。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专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25}

邓小平这一段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由实现公有制,转向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其中,核心是“以人为本”。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把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把以人为本提升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高度,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可以认为,这是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真谛。

在过去的长时间里,一直把人性论、人道主义,当作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上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批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个重要内容。“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曾经

有过一场生产目的的讨论。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为的是什么呢?提出这个问题,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可笑,但是在长时间里,这个问题确实没有解决。建国初期,因长期战争的破坏,经济亟待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很多基础工业要建设,所以在那个时候强调要“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把这作为长期的方针,就有问题了,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老百姓连饭都还吃不饱,能行吗?所以当时不少经济学者在讨论中就批评了上述观点。

于光远指出:我们的生产活动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本性。以前流行的是看生产增长的速度,也对,生产是个基础,但光那样看是不够的,生产不能包括一切。要从人的角度、从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角度、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角度来看问题,这就是人本主义。过去把人道主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从来是关心人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是人的幸福。

王惠德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了什么?就是为人民过幸福生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谈“异化”问题,就提出这样的思想:人本身就是目的,人不是完成别的什么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就是把人看成是完成什么任务的手段、工具,好像人只要不饿死,只要吃饱了就行,然后就去完成什么任务。这个“左”的指导思想一直这么继续下来,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注 26}

从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初阐述的思想中,不难看出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意义。当然,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远远不只限于经济上的意义,而是指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要遵循公正、公平的原则,尊重不同群体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为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与舞台,人人都享有有效的人权、民主、平等,具有同等受教育的机会,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不断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发展。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

由上可见,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60年的摸索,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开始逐步觉醒

了。

李锐先生在接受访问中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弯路,说明不仅有后人的问题,经典作家的理论,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也有问题。比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就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并不科学。恩格斯晚年对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反思的。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谢韬老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引起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有些人坚持过去的传统观念,大批修正主义,甚至对谢老进行咒骂。诚然,如邓小平所说,搞社会主义,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是不能成功的,但是,邓小平又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注 27}李锐先生在答问中提出了以下看法,他说:

“在上一个世纪,第三国际领导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已红旗落地,而第二国际传统的欧洲有社会党的国家,社会主义都在生长和发展中。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不能性急,社会主义不是强制推行的产物,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自然演进的结果。马克思讲过,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再不能发展了,生产关系才能改变。所以发达国家最有资格搞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也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元素最充分。我看过一个材料,瑞典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个人收入差异本来高达300多倍,但经过国家税收的平衡,下降到4:1,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也没有腐败,三十多年没有贪官。不止瑞典如此,北欧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

李老说:“我上世纪50年代去过苏联两次。1979年后,去过美国两次,去过巴西,去过瑞士,经过日本、法国、比利时,还去过澳大利亚,这使我大开眼界,启发思考。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有国际视野,关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关注社会民主主义,思考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我现在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就是大家过得好一点,共同富裕,生活有保障,社会生活讲平等与公正,人权有保障,真正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

应该说,李老的说法与中央对“以人为本”的解释是一致的。温家宝总理今年在人大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

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也正是这个意思。由此,是否可以认为,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价值观,而不是一种什么具体的制度,更不是建立了一种什么制度就说明实现了社会主义。这种价值观在不同国家,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用不同的具体制度去逐步实现,而要完全达到人们期待的社会主义目标,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种以为只有按马克思最早的主观设想去做,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完全是一种理论的误区,是对实践的误导,它已经被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

注释:

注1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注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页。

注3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注4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2~803页。

注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

注6 毛泽东:《关于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10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359页。

注7 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9月8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5页。

注8 《新华月报》1954年第2号第11~12页。

注9 刘少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1955年11月16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77页。

注10 《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注11 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0页。

注12 《刘少奇年谱》1898~1979,下卷第383页。

注13 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注14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25~326页。

注1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参见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下册第106~107页。

注16 胡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994年6月。《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注17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卷第1321~1323页。

注18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注19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13页。

注20 陈云:《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1978年12月10日。《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36页。

注21 田纪云著:《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页。

注22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

注23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64页。

注24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

注25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373页。

注26 转引自冯兰瑞:《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

注27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稿—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山东夺权的“三结合”经验

• 丁龙嘉

“文革”中,以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为起点,全国各地造反派刮起了夺权风暴。这期间,上海、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山东两市四省的夺权,构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大浪潮。其中山东的夺权,为毛泽东提出的建立“三结合”政权提供了经验。

四股势力,在联合与拼杀中,于1967年2月3日夺取了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力

“文革”进行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济南的造反组织开始聚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山大主义兵”)为首的山东省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简称“山红联”)、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山工联”)、红卫兵文艺界革命造反野战兵团;一派是以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联红卫兵(简称“山师串联兵”)为首的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简称“红山指”)、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山工指”)、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两大派相比较,前者,因为山东大学是1901年建立的直属国家教育部的享誉国内外的大学,所以影响力较强,不仅影响遍及全省,而且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其扶持的“山工联”,是由大中型工矿企业的造反组织构成,以产业工人大军而自居;后者,因为山东师范学院是1950年建立的省属大学,所以影响力较弱,影响主要在济南市,其扶持的“山工指”,是由中小工矿企业甚至街道办企业的造反组织构成。

1967年初,当上海造反派夺取党政大权、掀起“一月革命”风暴时,上述两大派造反组织尚未形成对立,但随着夺权的进展,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省直部门最早起来夺权的是中共山东省委机

关报《大众日报》社。1967年1月10日,报社的革命造反联络部在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示范下,夺了报社的权,当时得到了两大派造反组织的支持。夺权后的报社造反派,为了寻求靠山,立即去青岛与毛泽东支持的造反干部王效禹取得联系。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致电祝贺上海32个造反组织打倒市委、进行夺权。13日,“山大主义兵”联合162个造反组织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全面总攻击大会”,并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两天后的15日,“山师串联兵”联合近12万人的造反派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亦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两个大会,虽然都没有直接提出夺权,但是都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响下进行了夺权的预演。两个大会,表明两大派造反组织都要以自己为核心,对上争取毛泽东和中央的支持,对下纠集更大的势力。造反派分裂为两股势力,对立开始了。

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中央的推动下,24日上午,两大派造反组织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夺权问题,结果没有达成协议。当天,“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等17个造反组织决定:以自己一派为主夺权,并发表《告全省人民书》,打着大联合的旗帜,号召展开全面夺权。这时,《大众日报》造反派同这一派结合在一起,发表社论表示支持。当天下午,“山工指”、“山师串联兵”和“山工联”、“山大主义兵”两派分别行动起来,到山东省委、省人委和济南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属机关单位进行夺权,一时间出现了抢权的局面,在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突。济南市支持“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的9个造反派组织宣告夺了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组

成了“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委员会”。当天晚上，“山工指”出动了1万人袭击了“山工联”总部，砸毁了办公机关，绑架了主要负责人等。接着，“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纠集部分造反组织成立了大联合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委筹委会”），加紧了夺权的步伐。戴着红领巾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大学生，没有受到民主理念的熏陶，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妥协原则，懂得的是“有了权就有一切”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实行联合。工人则尤甚。

为了保证夺权的顺利实现，毛泽东批准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公安六条》。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其中传达了毛泽东的“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的指示。驻济南解放军部队于28日举行了全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誓师大会。大会在给毛泽东的致敬电中表示：“对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生死大搏斗，绝不能中立，绝不能折中，绝不能调和，绝不能和稀泥，绝不能不介入。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是要介入！介入！！介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我们硬是要支持！支持！！支持！！！”致敬电鲜明地表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紧跟毛泽东指示，要全力以赴地介入地方夺权斗争。这是第三股势力，一支强大的力量。

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在中央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力后，又遵照中央的指示组成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南代表团，准备到济南。1月29日，“大联委筹委会”在得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要赴省夺权，立即致电表示欢迎，要求他们“带着夺权斗争的丰富经验前来参加夺权的筹备工作，共同并肩作战”，把联合之手伸向了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30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发出《最紧急呼吁》，号召“全山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以谭启龙为首的省委、省人委的权夺过来”！表现出一幅十足的救世主的姿态。这是第四股势力，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当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代表团于1月31日到达济南时，济南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这一天，“山工联”、“山大主义兵”在集会庆祝青岛市夺权胜利之后，来到省公安厅，要求释放被“山工指”绑架、拘押的负责人，与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形成了对峙。在对峙中，部分人连续两次冲进公安厅办公大楼，砸烂了部分扩音器，割断了部分电话线，并与前去包围现场的解放军指战员发生冲突。傍晚，与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同属一派的“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的大批人员赶到公安厅进行声援，两派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晚，解放军济南卫戍区负责人宣布：“这次袭击公安厅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立即取缔”，并当场逮捕了200多人。紧接着，“山工指”、“红山指”、“山师串联兵”等与解放军一起砸毁了“山工联”济南各分会、红卫兵山东造反联络总站。2月1日，济南卫戍区向全省城乡发布《通告》，宣布“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这次事件是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斗争锋芒指向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的极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三一”事件，使“山师串联兵”、“山工指”这一派造反组织与解放军站在了一条战线上，共同反对“山大主义兵”、“山工联”另一派造反组织。力量对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王效禹在青岛造反时，得到了“山大主义兵”的大力支持。他所率领的赴济代表团中，约有1/3的人是“山大主义兵”的成员。他原来打算依靠“山大主义兵”一派夺权，并准备或驻在山东大学，或驻在《大众日报》社。是周恩来安排他们一行驻在济南军区的招待所。王效禹面对着济南两大派造反组织的斗争和部队的倾向性态度，权衡利弊，决定与“山师串联兵”、“山工指”一派结成同盟。在2月1日“山师串联兵”、“山工指”召开的声讨“山工联”总部反革命分子罪行大会上，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赴济代表团的代表声明“坚决支持济南驻军镇压反革命”。至此，局势迅速演变为：“山师串联兵”、“山工指”一派造反组织，济南驻军，王效禹奉中央指示率领的青岛赴济代表团三股势力合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准备夺权；“山大主义兵”、“山工联”一派造反组织在骤然而至的

打压之下,开始分崩离析。然而,理念各异、利益不同的三股势力,果真能够实现真正的联合吗?

“一三一”事件的第二天——2月1日,王效禹即同“山工指”的负责人韩金海,既是“山师串联兵”又是“红山指”的负责人王竹泉,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的负责人花光隆紧急策划夺权。王效禹向他们三人传授了青岛夺权的经验之一——闪电战术,要求抓住“山大主义兵”、“山工联”一派成为惊弓之鸟、一时无法聚集力量之机,仿效青岛夺权,一举夺取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力。

2月2日,“山工指”等25个造反组织的2000多名代表举行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省大联委”)成立誓师大会,声称夺省委、省人委的一切大权。为了打压“山大主义兵”、“山工总”一派,《大众日报》发表社论,指责他们是“老子天下第一”、“实行霸权主义”、“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2月3日,“省大联委”召开了有近十万人的大会,宣布夺回省委、省人委领导大权,以谭启龙、白如冰为首的省委、省人委黑司令部彻底垮台。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发表讲话,表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的反扑,这显然指的是“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一派。王效禹也发表讲话,指出“夺权斗争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最新特点和中心内容”,表示要“彻底粉碎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这显然指的也是“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一派。军队代表童国贵、造反派代表王效禹同时向“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发出了警告。

大会阐明了夺取山东省委、省人委权力的三条理由:第一,1960年前后,大搞“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包产到户”;第二,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第三,在“文革”中,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培植和操纵御用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大规模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今天看来,第一条,是使农民在灾荒中少挨饿少死人的正确之举;第二条,是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而为;第三条,是青岛市委而不是山东省委制造了大规模镇压学生运动的

流血事件。但是,欲夺其权,何患无辞。

“二三”政权,在风雨飘摇中,经中央扶持提供了“三结合”的经验

果然不出童国贵、王效禹所料,一度被打懵了的“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很快清醒过来,开始反击。他们集会、游行,反对“二三”夺权,还假造了《北京来电》和“政治谋杀案”,图谋用上压下反的方法聚集力量,进行“反夺权”。

但是,他们此时面对的不只是一派造反组织,还有造反新生的政权和支持这个政权的军队。“二三”夺权的第二天——2月4日,王效禹按照青岛夺权的手法,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发去了加紧电报,称“可能出现一场反夺权的大反扑”。2月6日,王效禹又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交由王竹泉送往北京。他在全力争取中央的支持。王效禹同时发表声明,谴责“山大主义兵”、“山工联”,号召“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此时,军队响应毛泽东“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注1}的号召,坚决支持“二三”夺权。2月4日,济南部队领导机关暨全体指战员发表声明,支持“二三”夺权,谴责“山工联”,赞扬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挥师来济、夺权有功。2月5日,解放军指战员和10万造反派在济南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表示“打垮阶级敌人新反扑,誓死捍卫红色新政权”。整个2月上旬,“省大联委”和军队展开了全方位的声势浩大的反“反夺权”行动。济南卫戍区于2月19日发布了《第二号通告》,声称要严厉惩处“山工联”。就在《通告》发布的前后,军队和公安机关拘捕了“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部分负责人。此前的16日,“省大联委”以反动组织的罪名通令取缔了8个造反组织。

“省大联委”和军队的上述行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王效禹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保住“二三”夺权,电话指使捉捕“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负责人^{注2}。他在又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山东夺权前后正在紧张的时候,毛主席有指示,表示了态度,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注3}

在镇压与围剿中，“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反夺权”（又被称为“二月黑风”）很快被平息下去了。

自开始夺权后，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毛泽东，知道只有造反派和军队是不可能有效执政的，就关注干部问题，并提出了“三结合”的政权模式，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新的政权。

中央关于干部政策的阐述和对干部的要求，使素来“执行正确路线坚决，执行错误路线也坚决”^{注4}的山东党员干部，特别是省、市机关的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在“二三”夺权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仅省级机关处以上干部就有近300人站出来支持夺权。这其中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穆林，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雷、杨介人，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王历波，1959年之前担任山东省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后被打成右派又获平反的王路宾，济南市人民政府市长杨毅。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示山东“省大联委”要重视干部问题。在1月3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发表的当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就电告王效禹：领导班子的组成，要按社论的精神办，社论的重要一点是正确对待干部；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心中有数“省大联委”，开始有选择地吸收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进入“二三”政权。

夺取省委、省人委权力的“省大联委”，急切地盼望得到中央的认可。中央早一天承认，他们就早一天获得合法地位。2月18日至22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取了山东“省大联委”代表团的汇报。这是第二次赴京汇报。第一次赴京汇报，因准备不足，被中央要求回山东再准备。

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听取了夺权情况的汇报。20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接见了“红山指”代表，要求他们“主要关心学校的问题，又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问题”，指示他们“山东大学不是出了问题嘛，你们要考虑怎样去团结、教育、帮助大多数同学”。22日1时，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代表团，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代表周恩来和文革小组讲话。他首先说：根据文革以来的经验，请大家考虑，可否建立一个以

王效禹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我们看，王效禹同志是可以依赖的。全省集中在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核心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夺权的成果，让文革更顺利地进行。接着作了五点指示：（一）王效禹从青岛到济南工作；（二）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三）建议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四）要慎重处理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基层组织问题，相信你们会处理好的；（五）请发一套新闻报道资料来，经中央审查批准后发布。周恩来最后讲话，他要求：成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人员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一倍；做产业工人的工作，把大厂子的工人争取过来；农忙季节到了，一定要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要配合一起开；不能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也不能搞超单位的组织。他的结束语是：现在宣布各省夺权斗争胜利的消息，都由毛主席审定，今天不可能多谈。^{注5}看来，以王效禹为首的“省大联委”还得焦急地等待数日。

2月23日，山东“省大联委”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有委员60多人，其中常委19人。

同一天，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出席了周恩来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会。周恩来要求省、地、县各级都要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注6}

2月25日至3月1日，省革委会和省军区联合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干部、造反派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各占35%、27%、38%。杨得志到会讲话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指示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组成领导核心”；“周恩来总理指示，当前的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的领导拿总，吸收省里的干部参加……也要吸收农林部门的同志参加。已经夺了权，造反派能够讲话的地方，也要派人参加省、地、县会议，联合起来搞”；“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同志参加领导”。会议批判了山东夺权中的“反夺权”观点，意在打压“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王效禹作了会议总结。

就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山东胜利夺权的消息。第二天——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山东胜利夺权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二三”政权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这篇社论说:“山东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所谓革命的“三结合”,即“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革命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强大的靠山”。从此,“三结合”成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一条基本经验。社论有一点十分引人注意,即给谭启龙、白如冰和“山大主义兵”、“山工联”捏造了一项罪名:“他们进行秘密交易,搞什么‘君子协定’、‘和平让权’,以达到幕后操纵,保护自己,继续把持权力的目的”,“演出了假夺权的丑剧”。^{注7}之所以说是捏造,是因为当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后来也没有发现有关切实的证据。

山东的“二三”夺权,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两级军区强力介入、全力支持夺权,在全国是第一家。王效禹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在整个夺权斗争中,解放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夺权斗争中,没有解放军,我们很难得到山东这样一个夺权的胜利”,“就是把权夺过来,恐怕也巩固不住”。他具体说,我们认为“解放军宣布‘工人联合会总部’是反革命组织,镇压了反革命,对打击反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好得很。如果没有这一着,那个反扑不会被打下去得那么快,功劳也应该是归于解放军”。此时,王效禹与军队的关系还处于蜜月期,他说的是实话。

(二)以王效禹为代表的一派造反组织同军队携手镇压了另一派造反组织、进行夺权,在全国开了先河。镇压“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都是济南卫戍区发布的公告。军队与“山工指”、“山师串联兵”共同摧毁了“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

(三)镇压与被镇压、夺权与“反夺权”的双方,都以污蔑不实之词欲置对方于死地。镇压、夺权一方,诬称对方与谭启龙、白如冰签订“君子协

定”,进行假夺权;“山工联”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山大主义兵”的“反夺权”是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被镇压、“反夺权”的一方,假造《北京来电》和“政治谋杀案”,图谋“反夺权”。

(四)众多的山东省领导干部快速地挺身而出、支持夺权,对夺权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五)以一个省辖市的副市长、曾被打成右派分子、从体制内造反出来的王效禹担任山东这个大省的一把手,在“文革”中,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这五个显著的特点,对“二三”政权的稳定潜伏下了危机。

“三结合”革委会,在理念和利害的搏斗中,名存而实亡

“二三”夺权后,山东军区立即指示各个地区、县的驻军和军分区、武装部参加夺权斗争。“二三”夺权前后,济南军区开始派出部队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任务。3月22日,省革委、省军区联合发布通告,要求全省民兵作为军队方面的代表,积极参加公社以下“三结合”的夺权。仅军队就派出了十几万人支持左派夺权。军队等武装力量参加夺权,甚至以军队为主进行夺权,使全省的夺权进展迅速,从2月3日至2月25日的22天中,全省13个专区和市中,已有7个夺了权;全省112个县和市中,已有62个夺了权,均超过一半。从2月到3月,全省有近10万个单位进行了夺权。

因为以王效禹、韩金海、王竹泉为代表的“山工指”、“红山指”、“山师串联兵”一派造反组织在全省影响力小、势力单薄,而相比较影响力大、势力雄厚的“山工联”、“山红联”、“山大主义兵”又被镇压下去,所以从全省范围看,参加夺权的群众组织有相当大数量是具有保守色彩和中间色彩的。当然,他们也打着造反夺权的旗帜。

作为支左夺权的军队代表和参加夺权的民兵代表,对于谁是革命左派组织有着自己的看法。长期形成的观点和感情,使他们大多数倾向于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行为稳健的具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不倾向于党团员少、出身成分复杂、行为暴烈、造反较早的群众组织。因

此,他们大多数认为前者是革命左派,并支持其夺权。

作为支持夺权的领导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长期形成的思想观点和利害关系,不可能通过八九个月的“文革”而转变。这就决定他们与军队代表中的大多数持相同的观点和行为,甚至有的联合军队代表借摧垮“山工联”、“山红联”的下属组织,推垮了所有的造反组织,支持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带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夺权。

于是,山东全省的夺权,呈现出军队、领导干部、带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联合夺权的局面;军队、领导干部支持较早造反组织进行夺权的,数量并不多。

夺权之后,相当多数的新政权中出现了与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的愿望相反的情况。其一,带有保守、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参与掌权,没有造反派的位子。其二,军队代表、领导干部、带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借造反派整风的机会,指责造反派自认为的革命行动为错误和罪恶,甚至逮捕了部分人,把一些造反人物整掉,借大联合的名义,把一些造反组织整垮。同时,有的领导干部否认自己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甚至要求平反、恢复名义、赔礼道歉。其三,军队代表、领导干部、带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依旧采用“文革”前的方式执政,这在省会济南市表现得尤为显著。无疑,上述情况对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独揽大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很快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自3月中旬开始酝酿反击。他们组织力量在济南市和全省进行调查,如对省立第二医院、济南国棉第三厂、济南百货公司、济南针钉厂进行调查,王效禹亲自到济南国棉第三厂调查,搜集新政权整垮造反派和走老路、向右转的材料。通过调查,得出了结论:中央出现的“二月逆流”反映到济南和全省来了,普遍出现了走资派和保守组织的反夺权,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一股反革命逆流,要采取措施进行斗争,不然,已夺取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危险。

这时,中央发生的两件大事影响到全国和山东“文革”的局势。一件是中央文革小组煽动起反对针对“文革”错误进行抗争的几位国务院副

理、军委副主席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一件是林彪提出了揪军内走资派。

在上述背景之下,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在山东发动了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的斗争,亦称反复辟逆流。3月25日,《大众日报》发表了社论《迎头痛击反革命复辟的逆流》。3月29日,新华社发表了载于《红旗》杂志第五期的王效禹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4月2日,山东省革委会第三次全委会通过了当前全省“文革”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在上述三篇动员令的号召下,一场遍及济南市和山东全省的反复辟逆流迅速展开了。在反复辟逆流中,发生了影响全省的两大事件。

第一件是冲击济南针钉厂。1967年1月31日,济南军区工程兵部队到济南针钉厂支工,支持部分群众组织夺了工厂的权,成立了革委会。反复辟逆流开始后的4月上旬,厂内受到压制、没有参加夺权的一派在“红山指”的支持下起来反夺权。从4月14日开始,“红山指”组织两三千人围攻针钉厂,双方发生武斗,厂内参加夺权的一派中的部分职工遭到殴打。此时,《济南日报》发表了题为《刮起十二级台风,摧毁一切腐朽势力》的评论员文章,将针钉厂说成是“当前济南地区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典型表现”。15日,省革委会作战部负责人姜庆本以作战部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对济南针钉厂问题的几点意见》,表示坚决支持“红山指”的行动,称针钉厂的夺权是保皇派夺权、假夺权,省革委会作战部不予承认,煽动把权重新夺回来。此后,每天都有数千人围攻针钉厂。21日,济南军区军宣队发表了《关于济南针钉厂文化大革命的几点意见》,称针钉厂的问题,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工厂夺权问题,从中挑拨省革委会、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的关系,妄图制造混乱,扭转斗争大方向。23日,针钉厂革委会被摧垮,参加夺权的一派受到了打压。

第二件是冲击济南市公安局。“二三”夺权后,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花光隆按照王效禹的指示,成立了专门镇压不同观点群众组织的班子,还以公安厅为主并从济南市公安局抽调20人组成了庞大的调查组,对济南100多个没

有参加以王效禹为首一派大联合的群众组织进行秘密调查。在王效禹指挥下,自2月8日至3月底,公安厅直接拘捕了200多人,并公开宣布取缔了部分群众组织。济南市公安局于1967年2月4日被局内一派群众组织夺了权,成立了革委会。夺权后拘捕了一部分人,其中有两人是济南市第三十三中学群众组织“八一战校”的负责人,他们因有打砸抢行为被行政拘留15天。夺权后的济南市公安局,因在某些观点上与省公安厅花光隆一派不同,就被王效禹、花光隆视为保皇派掌权。王、花曾多次派人到市公安局进行分化工作,但都未得逞。在反复辟逆流中,王、花决心解决市公安局问题。3月23日,花光隆以要求尚未进入市公安局革委会、只是参加工作的原副局长李虎汇报工作为名,将李虎等人诱骗至公安厅,然后以镇压第三十三中学造反派的罪名将李虎逮捕。逮捕李虎,遭到了济南市公安局一派干警的强烈反对。王效禹遂调动“山工指”、“红山指”等造反组织的人员,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从4月15日起对市公安局进行围攻。4月28日,围攻人员冲进市公安局,对部分干警进行侮辱、殴打,致使多人受伤。此时,王效禹下令解散市公安局革委会,由花光隆负责组织班子,重新夺权,成立了符合他们心意的革委会。

反复辟逆流迅速引起军队及其支持的革委会和群众组织的反弹。这时,省及济南市一些受到冲击的革委会和群众组织开始联合起来,已经垮台的被认为是保守组织的“黑字兵”(所戴袖章上的“红卫兵”三个字是黑色的)又拉起了队伍。4月22日,他们在济南组织了10万人的集会,一方面宣称拥护省革委会、拥护解放军,一方面表示对省革委会以反复辟逆流的名义进行打击部分革委会和群众组织的行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笔者目睹的当时的情况,是井然有序、群情激昂。济南部队参加和支持了这次大会。这次集会和游行,不论是阐明的观点,还是喊出的口号,都是讲究策略的,不论是集会的秩序,还是游行的秩序,都是组织严密的,显然有高手指挥、组织。这部分群众组织被称为“四二二”派。

随着反复辟逆流的进行,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造反派同军队及其支持的革委会、群

众组织之间的矛盾由公开而激化了。同时,军队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动荡起来的济南局势,促使中央出面解决问题。4月27日,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在北京接见了王效禹、杨得志和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的袁升平,造反组织的代表。周恩来在讲话中,要求军队坚决支持革命左派,说“不强调支持左派,只强调团结、争取保守派,实际上是支持了保守派”,指出“山东省夺权的特点是,有了省革委,但集权没搞好,下面有了二重政权,名义上是由省革委领导,实际上是和省革委顶着,根本不听省革委的”;又指出“全省下面夺权快,只是换了块牌子”,强调“两级军区都要参加省革委,王效禹任主任,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把省革委的领导统一起来,军队的支左指挥部可以不要了,由省革委统一领导起来”;又专门强调“军队转过来,问题就不难解决了,两级军区应该和省革委站在一起”。^{注8}当天,两级军区即以犯了支“保”错误而被迫做出检讨,同时撤销了军队系统的支左机构。

4月28日,省革委会组织20万人集会,指责“四二二”派反对省革委会,表示要坚决反复辟逆流。刚刚从北京赶回济南的王效禹到会讲了话。他传达了中央支持山东反复辟逆流的态度;以中央的名义给“山工指”、“红山指”、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大造反组织戴上了“左”派的桂冠,表达了中央对“黑字兵”和济南市公安局的态度。这强有力地支持了反复辟逆流和三大“左”派组织,同时也就强有力地打击了“四二二”派组织。

4月28日大会之后,矛盾非但没有降温、解决,反而更为激化了。

为了解决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三大“左”派组织同军队及其支持的革委会、群众组织日益激化的矛盾,毛泽东直接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到济南,做各方面的工作,解决山东问题,并当面具体交代了如何开展工作。^{注9}张、姚于4月30日到达济南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一方面做军队的工作,一方面做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

5月4日晚上,“四二二”派群众组织冲击了《大众日报》社。事件的起因是4月29日出版的

《大众日报》，全文刊登了王效禹等人在4月28日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大会决议，将4月22日的大会说成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向省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示威的保守组织的黑会”。于是，济南钢铁厂、济南汽车制造总厂、济南机车工厂、济南机床第一和第二厂、济南国棉第一和第二及第三厂的群众组织，“一五一”联合兵团，冲击《大众日报》社，进行质问和辩论。这些群众组织都属于“四二二”派。《大众日报》社革命造反联络部指责上述行动是“一伙法西斯暴徒袭击《大众日报》社的反革命事件”，并纠集部分红卫兵组织进行反击。双方在冲击和反击中发生了不严重的殴打。王效禹等阴谋策划扩大事态，鼓动报纸停刊，制造镇压“四二二”派群众组织的借口，但报纸没有停刊，事态没能扩大。这一大规模冲击《大众日报》社的行动，显然是为了展示力量，给张春桥、姚文元施加压力。这一事件，成为第二天冲击省革委会大院的预演。

5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八一礼堂向群众组织作报告。王效禹等以“四二二”派群众组织冲击《大众日报》社，要保护张、姚安全为由，指示有关人员不得把大会入场券发给“四二二”派。于是，部分“四二二”派群众组织就到省革委会索要入场券，结果遭到拒绝。之后，他们冲进省革委会大院，占据了电话总机室和部分办公室，要求王效禹出面回答问题。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就高喊“舍得一身剐，敢把王效禹拉下马”！6日，“四二二”派1万多人在八一广场集会，要求改组省革委会，并伪传“杨得志接管山东一切大权”。会后，调集6000余人去增援占据省革委会大院的人员。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展示力量，给张、姚施加更大的压力。这样，公开反对中央支持、部分造反组织支持、解放军不能公开反对的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就置自己于被动了，而占领省革委会大院，就更错误了。具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王效禹，立即于6日下午在省公安厅召集会议，决定驱赶占据省革委会大院的“四二二”派群众组织。于是，“山工指”、“红山指”立即调集二三十万人包围了省革委会大院，掐断了水电。这时，济南军区驻济部队派出宣传车进行劝阻，遭到“山工指”、“红山指”人员的围攻，被迫撤

回。7日晨，王效禹派庄中一进省革委会大院宣布“冲击省革委会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之后，“山工指”、“红山指”的大批人呐喊着冲进省革委会大院，对“四二二”派人员展开围攻、甚至武斗，最终将其驱赶出省革委会大院。这期间和后不久，“四二二”派有5人被捕、22人被拘留、200人被关押。这就是著名的“五七”事件。8日，省革委会作战部召开了8万多人的大会，声讨“四二二”派。自此，济南市“四二二”派群众组织及以其为主建立的革委会几乎全部垮台，且迅速影响到全省各地。^{注10}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三大“左”派组织认为，“五七”事件标志着反复辟逆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五七”事件后的两天，即5月9日，中央决定，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山工指”负责人韩金海、“红山指”负责人王竹泉、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修德任副主任。5月18日，中央又任命王效禹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6月，中央批准成立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任命王效禹为组长。当时，拥护王效禹的造反派据此大肆鼓吹王效禹的“六个第一”，王效禹也以“六个第一”为资本建立自己的帮派。王效禹一生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据说他一生念念不忘自己的“六个第一”，到晚年时还说：“我那六个第一是党中央毛主席给的。”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到达顶峰之时，也是走下坡路的开始。

为了维护大局，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领导机关，多次在肯定“三支两军”取得成绩的同时，检查所犯错误，承诺支持王效禹、省革委会、三大“左”派组织、革命的“三结合”，时称“四个支持”；表示反对把斗争矛盾指向王效禹、省革委会、三大“左”派组织，时称“反对三个指向”。这主要有5月28日山东省军区发表的《声明》和6月7日济南军区党委发出的《给山东革命群众的一封信》。

“五七”事件之后，军队似乎转向了，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他们与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三大“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依然十分深刻。袁升平在若干年后说，“五七”事件后，王效禹和三大“左”派组织搞了一个“老保冲击省革委会罪行展览”，王效禹要杨得志、袁升平通知济

南军区常委会成员前去参观,常委们付之一笑,无一人前去,王效禹得知后说:“军区就是不支持我”;王效禹等企图将“五七”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拟好了文稿,要以省革委会和济南军区的名义联合下达通知,济南军区拒绝签署,并与之进行了斗争。(《革命史资料》,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增刊1第8页)尖锐的矛盾暂时潜伏下来。

在反复辟逆流中,结合进革委会的领导干部经历了一场惊涛骇浪。他们或者站在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三大“左”派组织一边,或者违心地站在他们一边,留在革委会内;或者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或者不完全苟同他们的所作所为,被从革委会中清除出去,别无选择。在省革委会的常委中,被结合的王历波、王路宾两位领导干部和庄中——一位军队干部,在“二三”夺权和反复辟逆流前期,是支持王效禹和三大“左”派组织的,但在反复辟逆流后期,面对着他们支一派压一派、妄图独揽山东大权的劣迹和专横跋扈的作风,提出了不同意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就在1968年1月被他们打成“王王庄反革命集团”,在全省进行批判,之后,被撤销职务、投进监狱、隔离审查。被结合的另一位领导干部李予昂,在1967年12月被以莫须有的“叛变自首”的罪名清除出省革委会。如此,省革委会内的领导干部就寥寥无几了。

全省反复辟逆流的激烈搏斗,经过整整的春夏两季后,逐步和缓下来,但斗争并未止息。到10月,据王效禹向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汇报情况时说,全省112个县(市),有105个夺了权,有4个尚未夺权,有3个不需要夺权。到11月,据山东赴江西代表团介绍情况时说,全省13个地(市),有12个夺了权,建立了革委会和筹备小组;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和反复,绝大多数地区的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形势很好;个别地区,目前两派斗争还比较激烈,还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如此提供经验的“二三”政权系统的“三结合”,已是名存而实亡的“三结合”。一部“文革”史表明,从山东到全国从未出现过毛泽东提出来的那样的“三结合”政权;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

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注12}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探索的悲剧。

注释:

注1、12《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第5期社论。

注2、3、9王效禹1967年8月17日、10月26日、11月7日讲话。

注4《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64页。

注5、8、10参阅《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17、第523、第524至525页。

注6《周恩来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1至132页。

注7《人民日报》1967年3月2日社论。

注11《革命史资料》,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增刊1第8页

(作者为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书屋 2010年第6期目录

书屋讲坛	《三国演义》批判 ——权谋、权术与人性	刘再复
史佚佚篇	百年启蒙,两个“五四” ——读殷海光、顾准著作所想到的 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	姜弘 楚梦
人物春秋	倔强的斗士 ——回忆和满子足相处的日子 星期天到罐斋去看黄永玉 我父亲日记中的张订先生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张充和谈卞之琳与“卞、张罗曼史” 一枝玫瑰暗香来 ——《玫瑰诗人》读后	顾征南 苏晨 康睦 苏炜 宋颖豪
域外传真	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兴起与建立 《中华帝国志》里的中国婚礼 戴着镣铐的“诗意” 甜美的神伤	刘绪贻 郝稷 陈瑾 傅铿
灯下随笔	为“剩女”的青春和尊严请命 “汉奸老婆”与“汉奸哥哥”岂可同日而语? 《阿凡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刘剑梅 李工 周莉华
前言后语	“信·立·爱”——《青瓷红釉》后记 我们需要自审的一代 ——《耻辱者手记》第二版序言	秦燕春 摩罗
书林折枝	一部难得的书法史著作 ——王家葵先生的《近代书林品藻录》 殉道者的辉煌 ——读黄河《异类:从北京到纽约》 阅读李彬	谭庆禄 张昭卿 陈娜
编读往来	“石涂”辨——驳《关于武则天石涂 宴饮诗会若干问题的辨正》	楚人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沈阳毛主席塑像的建造

• 叔 弓

1966年,随着一纸《五·一六通知》传下来,人们“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文化大革命”风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发不可收。“造反派”们因袭《毛泽东选集》描述当年湖南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的方法,又戴高帽子又挂木牌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继而借助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把锋芒转向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进而殃及各地方、各部门、各级别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那时间,真可谓“造反派”风起、“专政队”林立,“专案组”如网,而且是“网大眼小,一个也跑不了”。

“有破有立,先破后立,为了大立”。“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大立、大树特树个人权威的运动。这一场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就是因为“他们要树一个人,我们也要树自己”。(毛泽东接见外国记者谈话大意)

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曾被塑为“红太阳”托出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可他本人一直谆谆劝说人们: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1950年5月,毛泽东收阅沈阳市政府一份反映人民代表会议决议的请示报告,在“修建开国纪念碑”几字旁批道:“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像”几字旁批示:“只有讽刺意义”;最后在报告上端挥毫:“铸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毛新宇《爷爷毛泽东》一书544页)。”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讲话说,“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这不是谦虚,而是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他说,“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

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7页与131页)。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不久,苏联报刊开始批评个人崇拜;1954年底,中共中央通知全党“不再使用(1943年首次提出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1956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后,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个人崇拜之嫌。

可是在中国“文革”期间一反常态,大树特树“大救星”形象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长江南北与大河上下,“红卫兵”、“造反派”浪潮排山倒海,“红宝书”、“红海洋”铺天盖地,“三忠于”和“四个伟大”、“四个无限”噪声四起,“早请示,晚汇报”童叟莫逆,捧送芒果、写效忠信如醉如痴,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若狂若癡,油漆楼面的“红海洋”淹过一切,画像、像章、塑像充斥寰宇。某火车车长在车厢内悬挂没露右耳朵的毛主席侧身相片,某人腹泻急跑厕所时顺手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叛、特、反”牌子放在了领袖像前,某人参加广场集会顺手把印有领袖相片的报纸垫在了屁股之下,某人对映太阳透视报纸所见编辑人员把第二版上民兵习武照片的枪口对上了第一版上的领袖相片,某人手持红色圆珠笔在闲聊中乱写乱画污染了报纸上的毛主席像,统统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了。这般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我身感莫名其妙的神经紧张,行走坐卧、念书读报、举止言谈、说今论古、喜怒哀乐……都千忌万讳半个“不”字,也似乎受了“怀疑一切”传染病的影响,生怕万一被周边什么人举报了出来而有嘴说不清楚。

1968年夏,悬挂毛主席画像的风气盛起于

中华大地，沈阳如同全国一样，城乡内外都在默默比赛“忠”心，一时间社会画家一人难求。我所在的工作部门借助职业方便，特别找来服刑犯人中的画匠帮办，在机关球场搭起画棚，登梯挥笔作画两天两夜，终于应时把两层楼高的画像“请”上了北陵大街岐山路临街的办公楼顶上，10月又敲锣打鼓把另一幅等高的巨幅画像，挂上了军管会主导在宁山路借用省粮食厅办公楼开办“学习班”的楼面上。



像小组”撰写的《总方案》是：使用专建厂家生产的经过海南岛暴晒考验合格的稀有合成树脂（俗称“玻璃钢”）塑成，总重量约两吨。整个造价180万元，当时说来或谓“天文数字”，据说动员全体市民男女老幼每人“敬献”一元钱而凑集的。

耗时3个多月，最后耸立广场中心的塑像全高20.5米，毛主席本人像高10.5米。基座高约8米，宽11米，周长23米。当然，不及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新复旦师”修建的第一座塑像“三数模式”

形式上，“在大军事机关大院和城市广场都要竖立毛主席塑像”，是林彪发出的指示。他发明印发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亲笔写下了4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统帅、伟大领袖”（刊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1967年，沈阳各“造反派”组织“抓大方向”争第一，都在中山广场打派仗，竞相依托塑像为自己正名“真造反”而树立不朽的纪念碑。

那样充满政治意义：毛主席像高7.1米，象征中共的生日；塑像底座高5.16米，纪念毛泽东主持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7.1米×5.16米=毛泽东生日12月26日，可谓煞费心机！

军政领导机关操控塑建权，昼夜兼行

由沈阳部队司令部、政治部暨辽宁省革命委员会、辽宁省军区、沈阳市革命委员会联合成立“敬建毛主席塑像指挥部”把住了塑建权。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担任总指挥，决定由著名雕塑家、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田金铎领衔，抽调同校的和下乡的教师杨美应、高秀兰及10名学生，组成13人创作组。他们昼夜兼程，设计了《像身骨架结构安装图》、《塑像环氧玻璃钢模具制作图》、《环氧玻璃钢塑像及浮雕表面处理工艺图》，以及“骨架总图”、“柱脚节点图”、“立柱节点图”、“右手反模型安装图”、“头部反模型安装图”、“像身模具卧式安装图”，还有毛主席塑像四周群雕的白描草稿，以及塑像泥样照片，40多张，不一而足。

沈阳独创的完美形式，在于由4部分组成高3.5米的群像：后部为《建立共产党》（1921）；左侧为《井冈山星火》（1927—1936）、《抗日烽火》（1937—1945）、（注：今为“1931-1945”）、《埋葬蒋家王朝》（1946—1949）3组；右侧为《社会主义好》（1949—1957）、《三面红旗万万岁》（1958—1965）、《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1966—）3组；正面两翼分别为工农兵学高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革命委员会好”的牌子，表现紧跟毛主席前进（参见1970年11月1日《辽宁日报》）。它们体现主办单位主张临摹林彪手书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9字为主题，以沈阳东塔机场新建军用机库为工场，最后按照沈阳一一二厂革委会敬塑小组总体方案，采用玻璃钢反膜型、环氧玻璃钢及浮雕表面处理工艺塑制而成。主雕与群雕联体在当时是全国独一份，也是最大玻璃钢塑像，用艺术手法把政治激荡固化成形。

1969年5月17日，沈阳“一一二厂”（今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革委会敬塑毛主席塑

1971年夏，我这个“老五七战士”，到沈阳郊区看“小五七战士”（儿子，下乡青年）。我顺路观赏红旗广场中央的那尊毛主席塑像，背向新建的省电子工业局（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原

址)左侧为沈阳市总工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原址),右侧是沈阳市公安局(日伪奉天警察署原址),面对辽宁宾馆(1931年日本人密谋“九·一八事变”所在的日本大使馆原址),所感四周一片平静。又见从沈阳火车站一直延伸到广场北后百十米处,大路两侧街树统统更换成了等高划一的成年松。步临其中如入古陵松林甬道,高峨的塑像也被葱绿的松柏簇拥着,显得额外神经兮兮的肃穆而庄重。回城恢复工作后,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曾安家广场东南百米外,晨操夕练在塑像前,心旷神怡,每生敬意。

香火浓烟熏染佛像脸庞,老人家不悦走下人为神坛

对待全国如此“大颂扬”的塑像潮,毛泽东本人多表不悦,埋怨“不该让我昼夜为你们在外头站岗”(大意)。他还针对用造飞机的铝材做像章的现象说“还我飞机”。1968年10月14日下午一点钟,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问到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151页,新华出版社,1998.5)。1976年毛泽东重病期间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床边会议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毛新宇《爷爷毛泽东》一书756页)。人们认为,即使毛泽东本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或确实错了,但现代迷信的统治仍被当做永远没有错误的神仙。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得毛泽东有幸解脱人为意识捆绑而走下虚拟的“神坛”。中共中央决定拨乱反正,排除“大颂扬”个人崇拜狂潮,要求清理整顿塑像数量多、布局滥、质量差的不严肃行为。作为省级媒体代表

之一,我同新华社辽宁分社负责人一起,列席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委员于1978年10月举行的一次专题会议,旁听了关于存留或废弃红旗广场毛泽东塑像的讨论。会上,有的主张有令则禁,大刀阔斧地废止清除,有的主张拆除主体塑像而保留基座群雕,最后听取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民主集中后的决定。

任仲夷默思历史,集中群众意见如是说

任仲夷没有急于表达意见,而是过电影似的默思省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感受,像他后来系统说过的那样:(一)1943年11月参加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初受“左”害,后来毛主席向所有无辜者鞠躬道歉。“也许由于心上烙印太深,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对于运动中的某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我在思想感情上往往有些反感,而没有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感觉”。(二)“土改运动是必须的,但有些过火‘左’的做法是不应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共和国诞生之初,也是完全应该的和必要的,但在具体执行中仍有‘逼供信’的现象,错捕、错杀了人”;“1951年到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也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在很多地方重复了‘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做法,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三)1954年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也牵连和冤屈了一些好同志,使我终身感到内疚和悔恨的是对××同志的批判,比我自己‘抢救运动’中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折磨和迫害更加感到痛心”。(四)反右派斗争,“我也整过人,但担心市里副局长以上干部不了解中央意图,不能领导好这次运动,竟擅自向他们传达了‘引蛇出洞’的两个文件,并要他们不再往下传达,结果副局长以上干部没有出一个‘右派’。‘文革’批我保护‘大右派都漏了网’,我也‘罪责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五)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反党集团,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是一个忠实执行者。作为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对于受到冤枉的同志负有重要的责任。我公开检讨,赔礼道歉”。(六)1963年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



位高一切、权大一切的“革命委员会好”大牌子和工农兵代表人物左手“红宝书”不见了

想)，“刘少奇的做法有些‘左’(集中表现在‘桃园经验’上)，而1964年中央制定的《二十三条》比刘少奇更‘左’，最后‘左’出了个‘文化大革命’。怎么也不会想到，刘少奇被定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我自己也成了哈尔滨市的最大‘走资派’”……

任仲夷沉重地想过：“时间是公正的，历史是无情的。许多历史事件，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历史事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历史的鉴别，才能得出公允的评价。吾老矣，这样的任务只能期待于21世纪的历史学家”(参见《独立史料典藏·当年事》一书225页)。可今天，常委们要听他对塑像处理的意见，迫在眼前，不容辞后。但他没有简单化采取“令行禁止”的态度一个“不”字(或不除，或不留)了之，而是冷静地综合大家意见，瞻前顾后、去芜存菁地坦言道：

红旗广场上的毛主席塑像及其基础浮雕，主题内容和艺术水平尚好，是雕塑家和鲁迅美术学院师生心血之作。沈阳市有选择地留存一两个塑像不算多，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作为创作艺术品予以保留。

现在的内容不合适的要修改，比如群雕前体部分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还高大的“革命委员会好”大牌子，还有什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打倒‘走资派’”的口号，高举《语录本》造反的“红卫兵”，而且浮雕中没有“八一南昌起义”……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看过了这些塑像，还拍了照片。修改前要发个文件，向干部群众说明白。要批判后再改正。改后的质量，不只是政治上，而且在艺术上，都要比过去的好。(据本文作者的会上记录)

任仲夷，中国共产党资深的高级干部，1980年由北国调去南疆主政，使广东尤其是特区成为中国的“窗口”，被誉为改革开放“真正的先锋之一”。正是因为他认真反思历次政治运动的得失，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是忽“左”忽右瞎折腾，才使先进的共产党人凝聚了共识，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推进了共和国60年中后期的巨变。

今天，我们看到修改后的四周托起毛主席塑像的浮雕群，不免残留些许激昂的“文革风”的痕迹，但是面貌大大革新了。看吧，那行临摹在基座正上方涂金的林彪所写9个字不见了，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不见了，那位女学生的“红卫兵”袖标及其手提贴大字报用的浆筒子、浆刷子不见了，那几个代表性人物人手一册“小红书”不见了，那块位高一切、权大一切的“革命委员会好”大牌子也不见了，只留下衬托大牌子框架的彩绸与花球(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修正《宪法》决议，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标志花簇锦绣的中华大地复归人间正道，亿万人民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大方向与时俱进，健步进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大道，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

仅有资料说，全国尚存露天毛主席塑像三十几座，虽然不及大洋洲和南美洲之外全球3200座(据俄罗斯《劳动报》，其中俄罗斯2100座)列宁造像的1%。据知在辽宁，丹东火车站站前广场上也有一座毛主席塑像。那是我从盘锦的省“五七干校”派下凤城农村插队落户以后，第一次也是在邻近城市看到的老人家塑像，那是背东(鸭绿江)面西的挥手像。或存？或废？丹东市请示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多、乱、差”的指示精神，出于处在边境城市的考虑，决定保留了下来。(责任编辑 萧 徐)

三大历史关口的张闻天

• 张培森

再大权威也莫大过于事实

张闻天是中共党内担任过中央总书记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而这一职务是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当选的。如此重大的史实却在相当长时期内党史上是一直讳言的,直至他逝世后,1979年中央为他平反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上,邓小平所致悼词中才公布这一史实。本人原是人民大学的一名党史教师,从上世纪50年代研究生毕业至1979年从事党史教学有20多年,但一直都不知道这样的史实。未料到的是,张闻天平反后的第二年,我的导师胡华教授推荐我参加一项中央批准的为张闻天编辑文集的任务,更没想到的是,我这个与张闻天本无亲无故,与他生前也从没有接触的一名教师,却从此与这位革命先辈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80年参加编辑他的选集起,到接着具体负责编辑他的四卷本文集,以及若干专题文集,再到进一步搜集资料协助小组同志编写他的传记,最终到2000年主编他的年谱出版,前后也有整整20年,如果有人问我,搞了这样长时间的张闻天研究,最深切的体会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一句话,“再大权威也莫大过于事实”,因为历史终究是给后人看的,而后人相信的终究是事实。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闻天生前长期遭受打击,其一生的历史也遭到严重的歪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他的冤案的平反和史料的不断发掘,许多长期被搞乱的问题终于逐步得到澄清,而且党史上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传统说法也有所不同程度的纠正。这里归结起来,事实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就以他有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来说,回想30多年前当我从报纸上读到邓小平《悼词》中公布的三件大事,一是他在会上做了批“左”倾军事路线报告,二是他受会议委托起草决

议,三是他“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不仅顿觉耳目一新,而且搞了20多年的党史教学竟全然不知这些史实,内心是相当震撼的。上世纪50年代学过党史的人都知道,过去党史最权威的本子有两个,一是收入《毛选》的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一个就是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而这两个本子有关遵义会议确立的中央领导又是如何表述的呢?前者是这样明白地写着:“……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而后者呢,则是这样写道:“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而当我对照邓小平所致张闻天的《悼词》所说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这一事实时,就立即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遵义会议选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又怎能说是“以毛泽东为首”呢,既然那时总书记是党的最高职务,又怎能说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不论出现以上这种文字现象有如何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背景,但起码它违背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了全党实事求是的新航向,也促使我这个党史工作者,得以从过去盲目迷信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开始转到求真务实的途径上来。

时至今日只要一谈及遵义会议,总还有人顾忌宣传张闻天就会贬低毛泽东,其实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是公认的,谁也抹杀不了的。因为人们都知道,正是由于他的正确军事主张使得红军扭转了长征危局,也正是由于首次在中央会议上从路线高度肯定了以他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并让他进入中央核心,从而战胜了错误军事路线,使得这次会议起到历史转折的作用。然而独木岂能撑天,何况他当时遭受打击在中央尚处于无权的地位。而事实上对遵义会议

起了重大历史作用的至少是四人,除了毛泽东之外,就是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而其中张闻天尤为关键,也正是由于他的重大贡献而被会议选为总书记。现在无论是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是上海浦东张闻天生平陈列馆,观众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部分时都会看到一座四人雕塑,其所列四位历史人物就是上述毛、张、周、王四人,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这一雕塑,据称还有这样一个曲折故事,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该馆对原陈列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后新设计的遵义会议部分的这一雕塑原来只有毛、周、王三人,恰恰没有张闻天。在新馆尚未正式开放的该年10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纪念馆,是胡锦涛同志看到这一雕塑时,向纪念馆的同志提出,这里怎么没有张闻天?那时候他是总书记呀。接着指着雕塑说,这里应该还有张闻天。这样,于是根据胡锦涛的指示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的三人雕塑补上了张闻天,成为现在四人的正式陈列。

1935年1月党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然而从党的整个历史命运的转变来看,那个时期除遵义会议外,还有另外两大事件,这就是紧接着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和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可以说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和西安事变这三大事件的前后构成了中共党史发生大转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张闻天这位中共领导人从走上总书记岗位,到担任总书记期间。本人曾于2006年发表过《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一文(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我在那篇文章中就已经说到,关于总书记问题绝非仅仅是一个职务名称之争,更要看到他这个总书记究竟有无起到总书记的作用。今年是张闻天诞辰110周年,本文不再来重复为这个“正名”问题作论证,同时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来对他这段历史作用做全面论证,这里仅以遵义会议前、瓦窑堡会议前和西安事变爆发后这三大历史关口有关张闻天的一些重大史实,让人们来看看这位领导人,是如何起到推动和促进党乃至民族历史命运转变的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对一些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混乱现象作进一步的澄清。

遵义会议前,危急时刻带头支持和挺举毛泽东,扭转了危局,为会议的成功召开,提供了重要前提

三大历史关口中的第一个关口是遵义会议前夕,这是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一个严重关口。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红军在刚渡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已经遭受了惨重损失,而另一方面,在明知敌人已经在红军北进的道路上布下大罗网的情况下,掌握军权的李德、博古他们却仍然要坚持向北进军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如果真是按这条路线走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现在世人皆知,红军后来实际是按毛泽东提出的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才扭转了危局,并给红军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然而人们应该知道,毛由于遭受打击当时在中央尚处于无权的地位,过去在中央苏区时他对五次反“围剿”也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却都没有被接受,为何这一次却被接受?这就要说到党内的另一个关键人物,而这正就是张闻天。

这里不妨举出两位当事人提供的重要事实材料,一是1960年夏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中苏关系的报告,毛当时也在场。周的报告谈到中共党从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就说到了张闻天。报告说:“那个时候,开始倒是闻天转得快,稼祥先转了,闻天也先转了。”因为那时距庐山会议批张还不久,因此报告用“倒是”这种批判的口气是很自然的,然而承认开始时是张闻天转得快,这是一个关键的史实。二是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说到那个时候有一次“飞行会议”,承认他的主张在这次会上遭到拒绝,而毛的主张却“不仅得到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李德这里所说的“飞行会议”实际上就是在湘黔边境召开的一次史称为“通道会议”的中央紧急军事会议。也正是这次会上毛的军事主张获得通过。以上两个材料实际都承认张闻天当时在支持毛的主张上起着领先或者可以说是带头作用。

然而又为何毛能在这次会上提出转兵的主张?而张又在这次会上带头支持毛的主张?其实

这里还有一个人们不太知道的具体背景。1986年本人在广州访问过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他为我提供了一点很难得的背景。罗明说,就在他到达通道的第二天去见毛主席的时候,碰巧遇上了毛主席同张闻天谈话,于是只好在门口等候。这样他亲耳听到了这次谈话。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是军事问题,张对毛谈了湘江战役红军通过四道封锁线后严重损失的情况,同时也将敌人已经发现红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以及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红军的情况告诉了毛。毛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显然毛张二人的这次谈话乃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而通道会议现在看来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毛的正确军事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获得通过,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一个前奏,而张闻天这时在中央起到的促进和带头作用,显然对于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非常重要。

接着,红军虽然按毛的主张实行了转兵,然而高层的分歧和争论并未就此结束,因此在部队进入贵州之后,就有中央黎平会议的举行,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而张闻天却是在这次会后进一步考虑到必须解决的组织问题,于是就有如今学者们常常引用的张闻天、王稼祥二人的“橘林谈话”。

在贵州乌江边的一个叫黄平地区一片橘子园地里,停着两副担架,一边躺着张闻天,另一边则是王稼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谈话。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就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就张闻天这两句话,王稼祥就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这件重要史实当初是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



张闻天

理、遵义会议前夕带领红军抢渡乌江战斗的团长耿飏,在1990年纪念张闻天90诞辰纪念座谈会上提供的。耿飏说,以上情况是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首先告诉他的,接着刘伯承也告诉了他,刘是总参谋长,当时在前线指挥。这样,耿飏就率领部队拼命地打,很快就打过了乌江,过了乌江之后,中央就布置在遵义开会。

值得注意的是,耿飏在讲完这件事后对张闻天作了这样一个评价: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就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耿飏这里所提供的史实,虽然只是历史关口瞬间的一幕,但却从中可以看出张闻天在当时确实是党内一个具有相当分量的重量级人物,因为他那时是中央常委,被人们视为仅次于博古的党内二号人物。所以他说出的两句话才能有那样大的作用。而耿飏对此事所作的评价也确实指出了张当时这一挺举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即便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所以毛泽东在七大时就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时

还要指出的一点是,遵义会议是有各军团领导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因此有这些事先得到信息并赞成毛出来的军事负责人的出席会议,也确实大大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至于张闻天为何能在此先后两个关键时刻作出带头支持和挺举的行动,应该说绝不是偶然的,这里至少又需要看到以下两点。

第一,他是从自身实践体验中自觉转变的,而且是党的中央核心中最早起来同“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进行斗争的中央领导人。党史上传统的说法,是说张的转变是由毛争取过来的,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本人参加编辑《张选》过程中,就将他从1931年至1934年发表的一百多篇文章进行过认真的阅读,其中固然很多是宣传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文章,然而同时也发现从他在上海时期就已经出现明显或不太明显的反“左”的文章,及至到苏区后不久就出现从经济到政治等重大问题上同博古发生明显分歧的文章。须知此时张同毛才从原来不认识到刚认识不久,又何谈得上毛对他的“争取”?及至1934年4月他就为红军广昌战役失利,同博古在中革军委会议上发生一场激烈争论,明确表示,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据与会的伍修权(时任李德翻译)回忆,会上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会后张又对伍说,这种打法不可能取得胜利。张闻天本人1943年回忆说这次会议是“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这场高层争论发生在距长征五个多月之前,此时张同毛虽已有接近,在军事观点上自然会受到毛的影响,但他这种同党的最高负责人发生如此一场不惜闹翻脸的争论,要说是由于背后受别人的“争取”,恐怕也是说不通的。何况一个尚在台上,居中央核心地位,一个还被博古排斥在中央之外,正在遭受打击和孤立。历史已经表明,造成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症结所在,就在推行错误军事路线的当时中央,就在高层的核心。然而这个核心如果始终是铁板一块,那这个问题就确实很难解决。因此张闻天的自觉转变其意义就十分重大。

第二,他还是一个具有战略思维的领导者。他在长征出发前发表的一篇有名的“战略社论”,就体现出从战略思想的高度上指出当时这场战争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应有的正确方针。这就

是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的一篇署名(张闻天)社论。文章原本是为红军转移进行动员的一份公开文件,然而今日仔细研究一下,却可以看出张本人同博古军事争论以来关于战争问题的若干战略思考。“战略社论”是长征过来的董老(必武)1936年对这篇文章的称誉。

文章首先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批评一种将战争看作“固定的”和“机械的”的错误思想,认为这是把革命看成“只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性)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的决斗。并且尖锐地指出这是“教条式的药方”,其表现就是“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要不然就是“退却逃跑”。另一方面文章在尖锐批评这种“固定的”、“机械的”战略方针的同时,还提出了一条与其相反的方针,这就是要“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方针,而且文章当时就指明红军此次“退却”进行转移的目的,乃是为了“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之下,继续粉碎敌人的“围剿”。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红军在湘黔边境时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同李德博古错误主张分歧的焦点。

文章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章在批评上述错误思想之后,对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做出了一个量化时间的估量,指出“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并将这个问题视做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问题”之一。这里所说“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换句话说,也就是“甚至要十几年”,把长期性量化到这样的长度,应该说至少是从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所未有的。须知斯大林1928年在中共六大对中共领导的讲话,估计革命高潮到来的时间是半年。毛泽东是井冈山道路的开创者,然而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初对这个长期性的问题,也还看不出有彻底的认识,他在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名著中批评当时“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缺点是“不该规定为一年”,但他认为高潮到来之可能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及”,而是形象地比喻说它已是海中“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已是东方欲出的“光芒四射”的一轮红日,已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了。而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革命战争

到基本完成是1949年，距离张闻天写的以上这篇“社论”是整整15年！而中国革命高潮形势真正形成，恐怕也至少要到1947、1948年，距这篇“社论”也有13、14年之久。

“社论”尽管一些用语不十分精当，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个时代的一些历史痕迹，但从其所阐述红军为何要转移的道理中，却可以大致看出一套与“左”倾军事路线不同的战争战略思想与战略方针。其中尤其是对中国革命战争长期性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战略问题的思考，能得出那样清醒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熟悉党史军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发表的第一篇论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论文是1936年12月，在此之前还没有一篇专论战略问题的文章，因此，张闻天发表于1934年的这篇“战略社论”，就在党的军事战争问题文献史上应该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笔者在编辑《张闻天选集》时曾经看到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中还收集了这篇重要文献，但后来中央编的包括《六大以来》的所有文献汇编中就再也见不到了。难怪在邓小平为张闻天平反的《悼词》中宣称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起草时，人们感到突然，甚至还有人臆测是完全按照毛在会上的发言而成的。其实确切一点说，决议固然是贯穿了毛的军事思想，但决非是一篇简单照抄别人发言的产品，而是有张本人在此之前已经形成的一套战略思考为基础的。

时至今日，许多宣传遵义会议历史的书和文章，仍然只是单方面地突出毛的作用，即使说到张闻天，也都只是说毛如何争取他这一方面，甚至引用张本人1943年《反省笔记》中关于长征初期如何在毛的教育下，接受毛的意见，开始了同博古错误的斗争直至遵义会议的一段文字，并且拿出张将会议功绩归于毛，说自己“不过是一个配角”来作证明。其实《笔记》是张在延安整风背景下写的一份自我检查，今日以此来评定其本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未免有欠公允。如将本文前面所列的事实加以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不仅早在长征前五个月他就在中央开始了同博古错误的斗争，又至少在长征出发之前就已对战争战略问题有了他个人的深刻思考；而且后来在挽救战争危局上，也不仅仅是毛单方面对他“争取”的一面，还有他主动向毛通报军事情况商议

如何改变当时军事错误的一面，确切一点说是毛张双方合作的一种互动。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如果党的方向路线有问题，无论是多么杰出的人才都难以发挥。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当时身居中央常委的张闻天首先从“左”的军事路线中觉悟并转变过来，不是他有着改变错误路线的强烈愿望，并在关键时刻在中央带头挺举毛泽东，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卓越军事人才也同样难以发挥出来，人们也就确实很难想象党和红军又将会是一个什么局面。而且需要看到的是，他当时的这种挺举行动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因为对他个人来说确实是担当相当风险的。因此公平地说，实现遵义会议转折最为关键的人物，除了毛泽东以外就是张闻天，而他的当选党中央总书记一职也是决非偶然，是得到大家拥护的，更不是某个领导人“照顾”的结果。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这样的话：“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他“本身的因素”用今日的话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素质。因此他的被选为总书记，除了其当时党内的地位以及考虑国际等因素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会议的贡献以及他自身的条件的。

瓦窑堡会议前，甫抵陕北即提出战略转变：要变保卫苏区的反“围剿”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二个重大历史关口是红军长征抵达陕北至瓦窑堡会议之前，这是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一个历史关头。众所周知，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在《毛选》上被称为“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中央会议”。可是过去所有的党史书上说到这次会议时都只举出这次会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连会议通过的决议都很少提及，至于会议谁是主持人，会议的具体地址，会议的决议又是谁起草的等等，人们更是一概不知。以至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其前部分“历史的回顾”中说到这次重大历史转变时，

还是作如此表述：在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从那以后这么多年，经过我们在编辑张闻天文集过程中对史料的考证和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党史学界的共同研究，终于根据事实弄清了有关这次会议的许多重要问题，而作为当时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的身影才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现在不仅弄清楚了会议主持人是张闻天，会议地址就在张的窑洞，会议决议的起草也是张闻天这些情况，而且还从史料的考证和当事人的回忆中揭示出一个重要背景，即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派的代表张浩，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瓦窑堡后，就在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的窑洞中同张彻夜长谈，首次传达了国际七大精神；那时毛泽东还在前线指挥作战，是张闻天在瓦窑堡，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等重大问题拟好了方案，通过电报征求毛周等的意见，并建议“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12月2日遂接到毛的回电，其中称“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在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推动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当时的中共中央为何能那样顺利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且迅速统一了认识，做出这样重大的决策；也就是说这里除了客观形势之外，有无领导人的思想内因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说到上世纪80年代编辑组从中央档案馆查看到的中央抵达陕北之初一批会议记录和有关文献，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早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传达国际七大之前，张闻天在陕北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和一篇署名文章，兹分述如下。

第一次讲话是1935年10月22日在吴起镇召开的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中央刚抵达陕北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均有讲话，毛的讲话侧重于军事问题，而张的讲话则是从政治上提出了长途行军结束后党和红军新的战略任务，明确指出要将目前保卫苏区的反“围剿”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他说：“如何来看粉碎当前的反‘围剿’，我只讲一个问题。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即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入侵今称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笔者）展开了二次世界大战问题，这将加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同时

减弱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反革命的帮助。应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第二次讲话则是11月13日，即中央机关刚到瓦窑堡不久的一次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这时毛正在前线指挥作战，而张在后方的这次讲话则是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的紧迫任务是：“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在接着这次讲话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1月17日，他就在瓦窑堡撰写了一篇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文章。也正是张浩到达的前夕写的这篇文章向全党提出了要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这个中心问题，明确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

仅从以上讲话以及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时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在听取国际指示传达之前就已经有了与共产国际基本相一致或是相吻合的思想，其中尤为可贵的是红军经过一年多长征，刚刚抵达陕北就明确提出，要变保卫苏区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也就是指明了党要进行从内战变为抗战这样一个战略目标，这是过去不为人知的。由此也就告诉人们，瓦窑堡会议的召开绝不仅仅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外部推动作用，而是有中共自身思想准备为基础的。

颇为令人玩味的是，1964年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张闻天在家读《毛选》，在读到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时，在毛的文章所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一句上，张闻天写了一条带惊叹号的批注：“在军事上是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并在旁边又加了一条注：“军事战略家和政治战略家的任务。”今日人们从已经弄清的事实来看，如果说红军长征中毛泽东尤为突出地显示出军事战略家的才能的话，而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则是张闻天这位总书记更为突出地从国内以至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出发，始终抓住了事关全局的党的战略转变这件大事，推动和主持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履行了一个政治战略家的职责。历史表明，瓦窑堡会议是一次真正转变

党的政治路线的会议,其在中共党史上的历史地位至少应该是与遵义会议不相上下,党从内战转向抗战的战略转变正是从此次会议开始的。不到两年之后国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发动,张闻天提出的战略目标也终于实现。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审蒋”、“除蒋”一时成党内主导意见时,独持冷静:“尽量争取南京政府的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就成为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一个枢纽,也是中共历史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然而在事变爆发后这个历史关口,党中央又是如何应对这个事变的呢?过去长期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毛主席英明决策和平解决,是张国焘主张要杀蒋介石。至于总书记张闻天则是根本不提,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上演的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当屏幕上出现陕北窑洞党中央讨论会的会场时,张闻天竟连一个身影都没有。近些年来虽然承认会上有张,然而又出现另一种说法,说是在12月13日中央讨论方针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致主张和平解决,独有张国焘一人主张“打倒南京政府”。其实这些都是歪曲史实的一种混乱。

早在198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就公布过《张闻天西安事前后发言和电报》,并同时发表了我们的编辑组几位同志根据档案合写的《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一文,接着不久《人民日报》(8月15日)又发表了本人的《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这些都在当时党史学界和许多老同志中产生过广泛影响。20多年过去了,如今却仍然在有关西安事变的历史阐述上出现如此的混乱。为此本人不能不在此再就当时中共决策过程这个问题在基本史实上作进一步的澄清。

人们在阐述党史上如何决策问题时往往总要竭力回避存在过的分歧。其实面对如西安事变这样突发而又复杂的事件,开始时党内出现不同意见,以至发生争论,应该说是完全正常的。而一开始就完全一致,倒是不可思议,何况那时还不是后来发生的那种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

当时的情况究竟怎样?首先就拿13日在保安窑洞召开的讨论应对事变的会议来说,有过不同意见的恰恰主要是会议的主持者张闻天总书记,和会议报告人(当时负责军事外交)毛泽东。那时中央会议的习惯做法是会议开始时由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做报告,因此这次会议首先由毛做报告。毛的报告从事变的意义,到形势发展的可能等都表明了他的看法和分析,同时还提出军事上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上,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但报告对蒋介石的处理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意见则是“审蒋”和“除蒋”,即“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的这个主张显然是以当时国民党失去了首脑,南京政府被蒋控制的局面已经被打破的估计为根据的,为此他还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在西安成立一个名义上不叫政府的“一个实质的政府”。

毛报告之后的其他同志发言都基本上同意报告的意见,有的作进一步的分析,有的提建议,有的则作补充。周恩来发言的一个有所不同之处,就是提出“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然而这里所说的南京也是没有蒋的情况下的南京。但是会议到了张国焘发言时,则是发展到了极端,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而且认为“内乱不可免”,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这是明确对党的“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方针的倒退。也正是在张国焘发言之后张闻天作了发言。

张闻天的发言早在1988年《党的文献》上就全文公布,后来又收入他的文集,这里不再作全面介绍,只需指明几点与毛的报告有明显不同之处,一是通篇没有一个“除蒋”、“审蒋”的字眼,也没有任何一点类似这样的意思;第二,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第三,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这里所说的南京政府不但完全没有与蒋分开的意思,相反却用了“正统”这样一个字眼。须知几千年的中国历代王朝,唯有“真命天子”的皇上才称得上正统,事实上当时的南京政府也唯有蒋介石才称得上正统。这里发言虽然没有明说要保蒋,因为在当时蒋的命运究竟最后如何,谁也不好断定,因此

发言这里用了“尽量争取”，然而其意思非常清楚，就是不同意那种“以西安为中心”，结成统一战线来控制南京的主张，而发言中“联合非蒋系队伍”一句，显然是以前一句为前提的。发言还要求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给自己造成困难；发言最后的结语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必须指出，在高举抗日旗帜，支持张杨，最终要结成广泛抗日统一战线这些问题上毛张两个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是不可否认两人确有过分歧和争论。在我们根据记录披露史实的文章发表后，我和编辑组的另一位同志一起曾访问过当时还健在的，曾列席这次会议的两位老同志冯文彬、郭洪涛。他们都证实毛和张确有过不同意见和争论，冯文彬还记得当时两人争吵得很激烈，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毛冲着张说了一句，让历史去做结论吧。这次会议由于情况了解不多，谁也没有定论，因此会议最后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以至15日还发表了毛泽东领衔署名的红军将领致国民党政府的电报，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直至周恩来17日到西安将外界情况用电报发回保安之后，12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才在认识上取得一致，会议遂正式做出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此可见党中央做出和平解决的决策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在19日这次会上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明确表态：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并批评过去“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及西安事变中央决策过程时也说不能认为过去那次宣言是对的。

回头看13日的这场争论，其实并不是要不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的分歧，而是究竟是在有蒋还是无蒋的情况下，结成以谁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问题的分歧。然而从随后五六天的实际形势发展来看，和平不和平的关键恰恰就集中在如何处理蒋的问题上。那种要除蒋或是把蒋同南京政府分开，建立以西安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设想被事实证明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而且也势必导致内战的扩大。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对蒋在当时国内人们心目中的“正统”地位，以及他作为中国

中央政府和军队最高权力的代表在国际上的影响，都大大估计不足。

至于党内为何会出现这种意见，从中央的高层来说，这里不能说只是出于一时的愤情，而是有其重要的两方面的背景为依托的，一是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态度的变化，须知事变之前国际对中国的方针实际是两面的，一面拉住国民党，一面又支持中共，中共同张学良秘密协议合作建立西北大联合，打通苏联获得物资和技术援助的计划是得到国际批准的。然而事变爆发，国际的电报中共虽未能及时收到，但从最初苏联《消息报》公开谴责张学良，斥之为亲日派的反应来看，就已经清楚表明苏联方面的态度，就可以判定共产国际是不会支持，要想拉苏联支持西北大联合的设想已经完全失去希望。另一方面从国内来看，事变之前社会舆论越来越呈现出对蒋“安内攘外”政策的不满，甚至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实力派的“军阀”中酝酿一股强烈的反蒋情绪，实际上事变前中共也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对他们做了许多争取工作。据此也就认为在蒋被拘的情况下，他们也就纷纷倒向西安一边，然而却未想到事变爆发后不久，从地方“军阀”势力到社会舆论却相反出现一股普遍的“拥蒋潮流”。因此党中央从这些客观形势变化中迅速取得认识的统一，做出推动和平解决的决策。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当时中共中央做出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短短六天就能对这样重大而复杂的事件做出正确的决定，也充分表现出当时党的先贤们的智慧和团结。然而弄清中央起先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不仅对澄清长期存在的历史混乱，恢复历史的真相，尤其是让人们了解长期遭到埋没的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的重大历史作用有益；而且也给予人们这样一个启示，即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如西安事变的这样突发的重大事件，中央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靠的也是党内民主，靠的是集体智慧，而不是靠任何的个人专断。

唯有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做到历史的公正，也唯有恢复历史的真实，才能全面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

近来中央提出社会公平与正义对当前的重要性,温家宝总理在3月14日答中外记者问的谈话中强调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由此我个人就联想公平与正义对于现实社会固然重要,而对于研究历史来说是否也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代人写历史不应该再像过去为封建统治者修史那样,只是站在胜利者的立场上来写失败者的历史,为尊者讳,为至高无上的帝王讳。拿张闻天这个人物来说,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犯过“左”倾错误,但随后又在实践中改正错误并为党和革命立了大功,公正地说功远大于过,而且为人正直从不为个人争权。然而过去却一直抓住其错误不放,在党史上对其贡献从来不提,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然而能否做到真正公正,关键也是在于尊重事实。目前在张闻天历史问题上仍然存在混乱现象的一个特点,是一些人不是不谈事实,而是抓住某些片面的事实材料,将其孤立起来,以其否定确凿可靠的基本的事实。仍然拿他的总书记职务来说,须知邓小平公布他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是确凿的事实(也许有人要问其有无历史档案根据,应该说张本人1943年所写的《反省笔记》就是一份可靠的历史档案,他在其中不但说到遵义会议“政治局许多同志推荐我当书记”,而且说到后来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曾想要“把总书记一职让掉”。如果根本没有总书记这一职务,又何让之有?),然而却因为后来(上世纪80年代初)发现一份陈云《传达提纲》(有人考证不像是当时写下的传达提纲,更像是事后经过整理的保存于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上没有写此决定,只是写在后来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他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就公然改变业已公布的事实,这显然是根据不足的。何况后来当事人杨尚昆又进一步提供了事实:是因为张闻天本人谦虚,再三推让才拖了下来,随后中央常委做出决定,他才挑起这副担子。由此可见并不能将后者否定前者,而只能说后来的常委分工是落实遵义会议的选举,否则确定中央总书记这样的大事,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选举,只是由一个常委的分工来决定,那是不堪想象的。而今日人们又从大量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位领导人在挑起这副担子之后

也确实履行了其总书记的职责,为党乃至中华民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如果我们仍然根据一个并未经全面论证的材料,就否定一个经过中央会议选举,并得到公认的张闻天总书记名分,这岂能算是历史的公正?

人们常说,要历史地看问题,对党史上过去的文件同样也要历史的看待,如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一个权威的文件,从其当时着重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批教条主义,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然而竟不顾事实地将遵义会议说成是“开始了以毛为首的中央新领导”,就显然是一个历史的局限。毛泽东本人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也承认,大家把遵义会议好的账都挂在他的身上,或者放在他的名下,而事实上这份决议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情况。明明是张闻天早在长征之前就已经在中央的会议上站出来反对“左”倾军事错误,而决议却说是红军长征开始后,“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立场上来”,于是都在毛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从而才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至于遵义会议以后到抗战爆发前这段时期,则是把包括“胜利结束长征”、“胜利克服张国焘路线”、“挽救陕北根据地危机”、“正确地领导‘一二·九’运动”、“正确地解决西安事变”、“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所有成绩通通归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中央”领导之下取得的,这样就把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作用彻底排除干净。这里有一点更为令人不好理解的是,在所有这些列举的大事中,竟然没有1935年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瓦窑堡会议这件大事,这是一时的疏漏呢,还是因为这次会议从思想准备到具体操办,到起草决议,直至主持召开全都是张闻天,太不好都归在毛的领导之下呢?

60多年后来看这份文件,不用多说,只要对照一下事实,其夸大个人作用的成分就显得比较清楚,而其一个严重的负面影响则是,埋下了后来滋长个人崇拜的不良种子。现在有些人总是顾忌说张闻天总书记这段历史,无非是怕它同毛从遵义会议开始就确立了领导地位的传统说法不一致,然而仅从已经弄清的事实来看,至少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也还没有确立起毛的这

叶圣陶日记中的 1958

• 蒋燕燕 叶永和

爷爷叶圣陶从 17 岁(1911 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延续到 94 岁去世(1988 年)。爷爷的日记中包括了七十多年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全国解放、解放后的历次重大运动,只要是他知道的,他参与的,在日记中都有记载。从爷爷的经历中反映了当代历史的一个侧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记。

我们选择 1958 年这个历史阶段的日记,意在反映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我国一穷二白的一张白纸上,描绘过一幅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美好的蓝图,曾鼓舞和煽动起亿万人民群众的巨大热情,敢想敢干,做了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创造”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奇迹。日记中记录了爷爷亲自参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迹和媒体对各种新鲜事物的宣传报道。出于对党的信任,对人民群众干劲的感染,对理想社会的向往,爷爷也被这场运动裹挟,充满热情地加以赞扬。但是由于科学认知的局限,缺乏理性的分析,加之盲目的崇信,即便是亲历亲为,也未必能够通过“现象”看到“本质”。今天我们再次翻看这段历史,是为了不让这些荒诞的故事重演。

让我们看看爷爷日记中 1958 年的经济发展情况:

在 1958 年年初的两会(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期间,爷爷在日记中记录了参加政协会议的情况。国民经济中工农业发展计划为“农业必须与工业平衡,而我国工业发展快,农业发展缓,故今日之首要,务使农业急起直追,期与工业相适应。”(1月29日)

关于水利建设:“钱正英谈水利情况,闻之大可兴奋。钱谓今时水利之方针已明确,包举之为下列三语:小型为主,中型为辅。积蓄为主,排泄为辅。社办为主,国家兴办为辅。又谓农民之干劲,治水利推而至于治山,蓄水于山上,实为新局面。因大搞水利,而扩大灌溉面积,而增进农业产量,今后将大见效益。”(1月31日)

关于钢铁生产指标:“观发来之材料,第二个五年计划生铁与钢之预计产量将为生铁 1700 万吨,钢 1500 万吨。1957 年之钢产量为 526 万吨。”(2月2日)

我想当年的与会代表对于 1958 年的国民经济发展前景与爷爷是同一个心情,同一个评价:“今年之经济计划,系为跃进之计划,各方面皆发展极多。由于条件充足,预计非第可以完成,而且可以超额。”(2月3日)“此次会议所有发言(口讲与书面),大部分谈兴修水利,积蓄肥料,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他则工业方面之成就与努力,总之,标明各方面之大跃进,大使人兴奋。”(2月9日)

两会之后,爷爷关注各方面的大跃进的情况。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直接参观和参与的一些大事件。如: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是大跃进中的一项重要举措,特别是除四害(四害为: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打了一场全民战争。在 4 月 18~22 日的日记中爷爷记录了北京市的打麻雀运动。“自明日起,北京市全体居民进攻麻雀,几如战斗。采用他地之经验,轰之(勿使下集),毒之,击之,并掏其

种地位,到真正确立应该是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而遵义会议将毛选入常委,这从组织上讲,对于毛后来在中央的提升和发展确实是关键性一步,因此可以说,遵义会议为毛后来确立

全党领导地位奠定了一个基础。

(2010 年 4 月 20 日完成修改)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叶圣陶

巢穴。以须轰也，凡可以敲击发声之器物均当利用，不用器物，则大声叫唤亦可。机关与人家，皆须划区看守，勿令麻雀得休憩。据云麻雀之力甚小，飞时较久，即当坠下。或不疲而下集，食有毒之食物，亦即毙命。机关中皆分班当值，学校学生亦各有任务，三午、大奎、小沫[注：孙辈，皆为中小学生]皆有其校分派之任务。如是者将连续三日，且看成绩如何。以意度之，必当可观。余谓如此办法，惟我国行得通，他国即社会主义国家，未必可行。余又谓此举之效，盖不仅在歼灭麻雀，尤重要之意义在训练人民，使浸渍于集体精神，凡有利于公众之举，人人均须参加。此种精神越来越强，我国之巩固，社会主义世界之巩固，均有最可靠之保障矣。

人家屋顶或树上，皆挂起假人，如田间设稻草人然。假人之衣多用红布，不设假人，则张红旗，据云麻雀惮红色也。”(4月18日)

“晨间四点过，围剿麻雀之役即开始。对门空军机关高楼上，扩音器中有人发号令。各家或敲盆桶，或放爆竹，或大声叫喊，勿使麻雀不获停息，倦飞下坠。房顶上皆有人执长竿，竿端系红布或他色布，时时拂动。余室后面高树(榆树)上，老田居之，拴一洋铅桶，时时敲响。三午、大奎、小沫皆参加其校中之组织，或即在校内作战，或出至城外。据‘北京晚报’称，今日上午扑灭麻雀，全市约一万五千只云。上午余往社中。机关之作战又不同，竟日分班轮值，值班者居于防区之内，见麻雀即轰之赶之，无使栖止。”(4月19日)

“今日报载，昨日全北京市共歼灭麻雀九万馀只。今日上下午两次全民动员，一如昨日。”(4

月20日)“今日仍围剿麻雀，敲击声呼噪声四起，视昨日更甚。盖以今日为最后一天，大家出劲，必收全功。”(4月21日)“据广播，北京全市三天剿麻雀，共得四十万只，厥绩不小。”(4月22日)

5、6月份文联组织各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参观了当年正在兴建的十三陵水库、官厅水库、北京周边[注：河北桑干河畔]的开山大渠，爷爷在日记中均有记载，并为之欢欣鼓舞。“劈山大渠者，引桑干河上游之水，灌溉黄羊山坡上卅三村之土地，俾三万五千亩旱地变成水田。此须将水抬上山坡，计高八十五公尺。开凿此渠，久为其地农民之愿望，至今而始实现。此渠长八十华里，须劈开黄羊山腰，如筑盘山公路然，凿石成渠，使水通过。有五十道山沟须填平，填平之后，让渠水横截而过，其两旁则筑土坝，谓之渡槽。预期以今年完工，明年即可利用。”(5月29日)爷爷还记录了工地报纸(油印)上登载的一首“非知识分子”所作之诗，“扁担不长七尺三，箩筐不大柳条编，你别小看这玩意，昨天担走两座山。”

6月22~27日爷爷亲往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

6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刘子馥来电话，言国务院方面动员部长级、司局级人员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为期一周，问爷爷身体情形如何，能否参加。爷爷在日记中写到：“余言愿参加，劳动当然非所习，然愿一试之。”爷爷记下了几天劳动之感受。

6月22日上午八点，“参加劳动诸人共登大车出发，其数为二百有馀，名为机关第四支队，分为五个小队，余隶第三小队。同队之文化部中人，余大多熟识。车行一点半而达技工学校之宿舍，亦即借与我人之住处。先入饭厅稍休。……既而周总理至，渠亦将在此劳动数日。周讲话谓此次动员我人来此劳动，意在造成风气。有人报告，第一批人劳动一星期，完成八百馀方，今第二批有第一批之经验可循，或当超过。此次来者，陈其璠最长，七十二岁。

既而分配宿舍，每五人一间，着地板铺。余与陈选善及交通部郝、葛、陈三同志居一室。十二点午餐，有饭有馒头，大锅菜，汤尽量喝。大家如学生旅行模样，食之殊有味。饭后入睡一时许。三点全队出发，前举队旗。行45分钟而达工地，据云

有八里。我人之工地在外围,故不能见数万人劳动之大场面。任务为搬运石头,将河床中之石头送至指定地点,备送至大坝前,供巩固坝基之用。工作分三项,一为捡石装车,二为推车送石,三为卸石叠齐。石头之标准,需大于两个拳头者。余参加第一项工作。每劳动45分,休息15分。六点半,在工地进晚餐,吃烙饼。餐后休息一小时,有总政文工团青年男女唱歌为娱。天黑后电灯齐明,运石如昼间。十点一刻休工,步行返寓所,觉道路比白天为长。自三点至十一点为八小时,其间走路去一点半,晚餐去一点,休息亦去一点有馀,实际劳动时间为四小时有馀。而其他一般人来此劳动,皆实足八小时。盖以我人究不夙习劳动,且年龄亦较大也。余尚觉没有什么,然知明日必将感其疲乏。到寓所后喝粥一碗,然后就寝,已十二点矣。”

6月23日,“昨睡尚佳,而两个腿弯觉僵硬,不易屈伸。七点起,步履亦复不甚自由。据人云,熬过三天,当即好转,余将一试其然否。八点半早餐。餐后洗浴。盆浴之设备胜于松竹园(注:东四浴池)。浴后觉两腿稍舒。……三点,仍步行至工地。余坐于石堆上,捡合格之石头,掷于筐中,他人则提之至小车旁,倾于车中。劳动有顷,心注于捡石,乃忘腿痠。……今夕九点一刻即休工,缘须开联欢晚会。部队同志为我人歌唱奏乐。继之,放映新制成之纪录片《英雄赞》……放映毕已将十一点。余步行殊不济,为所有在后之人追出,终于作殿军。两腿几乎提不起,勉强支撑,乃达宿所。非特腿痠,腰部亦觉异样,两手则感发胀。喝粥两碗即睡。”

6月24日,“晨以七点半起,疲困稍舒。队中同人大家写大字报,余成四句:‘两天217,成绩相当‘棒’。鼓足干劲儿,搞它一千方。’据称我们一批人之成绩必能超过前一批,努力为之,一千方可以达到,余固如是言之。”

6月25日,“下午三点,仍到工地,捡石运石,人人有劲。据云初习劳动者,第三第四日将为低潮,缘疲惫已甚故。我人共谓此说殊未确,已为我人之实际经验所打破。”

6月26日,“下午三点,全队往参观大坝,并装运砂子。余与(郑)振铎、夏衍、范长江皆以准备写稿未往。……往大坝劳动之人至十二点乃归,

据云今日与其他单位协同装运砂子,又紧张又热闹,觉得比前数日有意味。”

此次来做体力劳动,人人言大有意思。有谓‘思想劳动健康三丰收’者。或言宜定为经常制度,每年劳动二三次。余之来此,意在试验自己是否吃得消。今知勉力为之,固未始不能也。”

6月27日,“晨以六点半起。九点,各小队之小组分别座谈,共抒此次参加劳动之体会,然后由小组长汇报而作总结。……

余欲步行回宿所,观沿路景色与人物,柴君从之。独行不受拘束,尽量缓慢。太阳当空,山色田野俱明朗,列队而往来者,运输汽车往来者,皆时时而遇,所见无不足以欣快。环水库之马路方在修筑,远望山腰,截开一线,筑路工人纷纷如蚁。步行约一小时而抵宿所,已过午餐时间。

下午两点,至技工学校之大礼堂,我全队与彼校开联欢大会,谢其款留我队,给与种种方便之盛意。讲话者彼方为多,均言我队来此劳动,与彼校鼓舞极大,得任招待之役,引以为荣云云。……

回宿所,收拾行李,将全室打扫干净。旋即进晚餐,餐毕动身回城。”

9月1日,爷爷去参观定陵,顺便去了十三陵水库。“登车,循新修之环湖公路绕行一周。下望水库,似不觉其大,目测固不足为凭也。湖水澄碧,靠大坝处宽广,往北则狭长。大坝坡度极大,南面固以石块,此中殆有若干块系余所手捡者。环湖公路尚须整修。整修而后,不必乘车,步行亦复可喜。一边靠山林,一边俯碧湖,树木成荫,可以娱怀赏心。”



1958年5月25日在河北怀来县花园乡
叶圣陶为果树洒农药

1958年下半年,各种浮夸、泡沫越来越甚。一是粮食产量翻着筋斗往上长;二是全民大炼钢铁;三是成立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四是创造奇迹。

爷爷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一、粮食丰产

6月14日,“今年各地小麦大丰收,近日报上喜讯频传。向以为小麦非高产作物,今有亩产3530斤者,可知只要加上人力,小麦亦可高产。人力越来越见出成效,即自然越来越不足以难人。‘人作自然主’从今确可做到矣。”

6月30日,“报载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种一亩七分试验田,亩产小麦5103斤,为空前之纪录。麦熟而后,报上屡传丰产,自数百斤至五千余斤,真令人喜欲狂也。”

7月20日,“报载河南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有二亩试验田,亩产小麦7320斤,此实惊人消息。”

7月28日,“报载我国早稻大丰收,比去年增加一倍,达到八百亿斤左右。江西波阳县有一亩多地,平均亩产9195斤13两,此是今年早稻之最高纪录。湘、川、浙、滇、闽、皖、粤诸省,均出现亩产1000斤到5000斤以上之高产纪录。”

8月1日,“今日报载湖北孝感县长风农业社创造亩产早稻一万五千斤之新纪录,殊可惊人。……北京近郊某社将耕地深一丈,期明年之小麦亩产七万斤,此则更堪惊矣。”

8月10日,“安徽枞阳县石马乡高丰社之试验田,创造亩产早稻一万六千有馀斤之新纪录。”

8月12日,“今日又有早稻丰产之新纪录。湖北麻城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之试验田,亩产16260斤,多于安徽枞阳县者三十馀斤。”

8月13日,“今日又有早稻高产新纪录,超出昨日所传者远甚。亦为湖北麻城县,其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得到亩产36956斤之成绩。报导谓此试验田共整地十次,深耕达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五次,先后施用之肥料,计草籽三千斤,塘泥一千担,陈砖土四百担,硫酸铵一百零五斤,过磷酸钙八十斤,水粪肥六十担,豆饼一百八十斤。底肥系结合犁地分层施用。

不惜工本如此,故收获特丰。……究竟某种作物达于如何高度乃为极限,或竟无有极限,今

时俱难断言。此真农业史上划时代之事也。”

8月22日,“今日报载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有一试验田,收中稻亩产43075斤有馀,为空前之最高纪录”

8月30日,“湖北应城县白湖乡长春社收割中稻,试验田创造43869斤之新纪录,较之安徽繁昌县东方红三社之高产纪录,又多出793斤有馀。”

9月1日,“湖北麻城县熊家沟乡建新公社创早稻高产新纪录,其数为52599斤。报上标题谓《突破五万斤大关》矣。”

9月5日,“中稻又出现高产新纪录。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之试验田,亩产60437斤。突破六万大关矣。”

9月7日,“晨间夏景凡来,据谈近往天津观农事,试验田甚多,其中亦颇有处理不当,致稻干枯萎者。云有一块有希望收获十万斤(亩产),因而工作人员皆住于田畔,用种种方法,保其必达十万斤。恐日照犹不足,夜间则开大电灯照之。惧密植阻碍通风,则横贯中空之粗竹管,粗竹管复连中空之细竹管,以风扇送入空气。恐大雨或冰雹损及禾稼,则支架于田边,俟雨作即降帘掩护之。各地往天津观此一块稻田者,络绎不绝。如此之事,诚往昔未有之异闻也。”

9月18日,“今日报载三个消息,为中稻高产之新纪录。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之卫星人民公社,试验田亩产达61584斤,超过广东连县之60437斤。而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82525斤,又高出二千馀斤。尤有高者,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竟达130434斤,真是惊人之数字,恐将为今年之最高纪录矣。”

二、大炼钢铁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开扩大会议,……决定中有一项,号召全党全民为今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去年钢之产量为535万吨,倍于次数,即得1070万吨。《人民日报》社论中有云‘这样的规模和速度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9月1日)

9月17日,“上午在社中。看四天来之报纸。近日各报俱特别登载各地响应党中央之号召,大鼓干劲,努力生产钢铁之消息。……据闻今年之钢产量虽定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内定则争取达到

来, 党之领导确属了不起。”

10月17日, “日来京中各方面均在炼钢。闻部中已炼之有时。社中与文改会均有一个炉子, 社中尚无成, 文改会第一炉成功, 得钢一斤有馀。至诚今日傍晚笑颜相告, 谓今日居然得百斤钢。大奎小沫之学校中也在炼, 大奎在炉旁作辅助工作, 小沫则与同学到处捡废铁。至善以晚饭后出去, 谓将作击碎石块之劳动。并候至夜十二点, 看第一炉钢能否有成。满子告余, 菜市之卖菜者近殊减少, 亦为炼钢。此真是‘全民炼钢’此举影响之深远, 未可限量, 固不仅生产钢铁而已也。”

10月18日, “午后两点, 再到社中, 听许印章讲炼钢。转炉炼, 平炉炼, 坩埚炼, 反射炉炼, 全皆讲到, 余听之似懂而实未全懂。社中同志炼已数日, 用坩埚, 数回皆失败, 坩埚破裂。昨夜居然两炉成功, 得钢十斤。现在各单位皆有出钢之规定任务, 自今至月底, 每日须炼得二百斤, 乃可完成任务。故坩埚炼决当改换, 已出外参观, 明日将建一反射炉。”

若我社者, 以战事为喻, 仅为游击小组。专门工业学校之类炼钢, 乃为游击队。工厂则为正式军队。游击小组不配给原料燃料, 游击队则得配给。同志皆互相助勉, 冀自游击小组升为游击队也。”

11月4日, “钢铁生产之大跃进, 由于运用‘小、土、群’的办法, 发动群众一起来搞。小者, 小规模也。土者, 土设备, 土方法也。群者, 群力齐作也。近日报上屡有言论提及, 不仅钢铁之生产如此, 其他工业亦可以用‘小、土、群’的办法, 大大促进。此一号召, 于各项工业之推进大有作用无疑。”

与‘小、土、群’相对者为‘大、洋、群’。大者, 大规模企业也。洋者, 来自西方之设备与方法也。而‘大’与‘洋’亦须‘群’, 谓此种大企业亦必走群众路线, 发动群众一起来搞也。”

11月15日, “今日报上有数大事, 不可不记。其一, 截至本月十日止, 今年全国钢之产量已突破八百万吨。易言之, 即今年尚馀五十天之久, 在此时间内能产钢二百七十万吨, 即可达到



叶圣陶 1958 年日记手迹。左边是贴在日记本上已发表过的诗



一千二百万吨。此后逐年倍增, 明年为 2400 万吨, 1960 年为 4800 万吨, 1961 年为 9600 万吨, 1962 年为 19200 万吨, 则远远超过美国之产量, 居世界第一位矣。如此之事, 以我国今日之情况观之, 确非夸言, 当可做到。”

9月24日, “上日来全国炼铁, 已形成高潮。许多省份, 皆争取日产生铁万吨。又往往号召条件较好之县, 日产生铁千吨。事实上, 一个专区日产万吨者, 已有其例。”

今日接三官(注: 叶至诚)信, 渠在公社之炼铁厂中负责一部分技术工作。其厂出铁情况还好, 其小组已得三面红旗。有一个土高炉, 连续烧四十二小时, 出铁 1017 斤。还有两炉, 出铁都在六百斤以上。其厂中全是外行, 均在自己摸索。”

10月5日, “迩来全国各地, 无论城乡, 皆熔炉齐起, 各行之人俱分其时力炼铁。据闻夜间红焰烛天, 蔚为奇观。”

10月6日, “目前全国约有四五千万人投入生产钢铁之战斗, 决心做到今年钢产量倍于去年, 达一千零七十万吨。”

10月12日, “夜间王城来谈文化部同志炼钢, 数试而后成功。日来中央各机关响应号召, 均在炼铁炼钢。而如小沫之小学校, 亦复砌炉炼钢。余谓此等措施, 教育意义盖超过经济意义。凡党之号召, 必全力以赴, 一也。最富政治意义之生产工作, 人人研习而实行之, 二也。摸过一番之后, 人人知炼钢炼铁为何事, 三也。以后每有类似之号召, 干劲必同样奋发, 四也。实践之中, 思想方面, 工作方法方面, 人人均可提高, 五也。如是想

一千零七百万吨之指标。以目前全国各地之巨大干劲推之,其必能达到,毫无疑义。”

12月5日,“报载截止十一月底,全国钢产量已达969万吨。尚有101万吨,本月内自可完成。因此,今年生产1070万吨钢,必可达到无疑矣。”

12月17日,“三点,至作协炼钢之所。地在贡院直街。作协诸友曾于此炼钢,余并未参加。今日重复炼钢,为拍摄电影,作为炼钢纪录片之一部分,示作家亦在炼钢。到者皆熟友。大家依次持铁条炒钢,拍摄各历二三分钟。此当然有宣传方面之意义,然未免不真实也。”

12月22日,“今日之各报,俱印红字大标题,为1070万吨钢已生产完成。此是截至本月十九日之统计,其数为1073万吨。本年尚有十数日,并此十数日之产量而言,预计可达1100万吨。报纸叙述我国自1890年张之洞办汉阳钢铁厂,至1949年解放前夕,五十九年间共生产760万吨钢。其中年产量最高者为1943年,包括日本当时占领之东北地区在内,是年生产92万吨。若干主要之资本主义国家,钢产量自五百多万吨增至一千万吨以上,美为七年,英为卅二年,德为八年,法为二十九年,日为二十年。而我国仅为一年,可谓跃进,可谓史无前例。明年之指标为1180万吨。除此数量而外,奋斗目标为‘铁必好铁,钢必好钢,钢必成材,材必多种’。”

三、成立人民公社

8月21日,“上午在社中,看报纸与新收到之《学习译丛》。报上有有关人民公社之两篇报道。所谓公社,与乡合一,一个社其实为一个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俨成整体。粮食不按劳动日分配,而按人口之定量分配。将实行工资制,据各个社员劳力之强弱,生产技术之高下,劳动态度之良否,而发给一定量之工资,或于基本工资之外更视情形而给奖金。河南遂平县之卫星公社,论粮食,今已吃不完。猪肉,每人一年可得二百斤。到明年,每人一年可得二十四斤植物油,三十斤糖,一百尺布,每天可得一斤水果。观此数点,即可知公社之优越性尤胜于高级社矣。”

9月2日,“报载河南省农户,已有99.98%加入人民公社,此无异谓全部农业社均转为人民公社。发展之速,殊非意料。公社较之农业社。优越

性更大,大要为如下数点:更可提高劳动效率,扩大公共积累,打破生产局限性,便于加强统一规划,便于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全民办一切事业,逐步消灭城乡差别,树立共产主义思想。”

9月14日,“下午天已大晴,两点半,分乘大汽车往观商庄人民公社。先由社长介绍概况,次乃参观其畜牧场、兔舍、饭堂、幼儿园、红专大学、幸福院、浴堂、商店种种设置。皆颇整洁,路旁亦如是。然此参观见物而未见人,接谈甚少,且大多数人皆在各个岗位上,所遇不多,因此,余觉印象不深。归途经大寺各庄,此为毛主席所曾视察,报上登载,大为出名。各地来参观之人殆数千,行于陇上,皆为观其试验田之高产作物。余只观其两种。一为棉,其高逾于张志公,干粗,叶大,上部犹在开花,望之宛如木芙蓉,不似平时见惯之棉。底部所结棉桃如大核桃大,已有破绽吐棉絮者。每株结桃至数十个,多至百个,此亦为向所绝无。估计此棉每亩可收子棉三千斤。又一种丰产品为小米,据云每亩可收一万斤。此犹未极度密植,若加密则产量当更多。尚有丰产红薯及白菜。白菜每棵云可达一百斤。”

四、“创造”奇迹

8月10日,“今日报上有数事可记。……大连石油研究所用‘水煤气合成’之法制油,获得成功,此是开世界纪录之事。盖其成绩超过美、英、西德也。……此一方法不受原料之限制,既可用烟煤、无烟煤、劣质煤为原料,亦可用半焦、天然气为原料。需用之设备不甚复杂,技术亦易于掌握。可与合成氨工业、民用煤气工业相联合,充分利用废气,廉价生产汽油与化工产品。此法为煤的综合利用之新方向。”

9月19日,“哈尔滨建成一座‘四不用’之大楼。四不用者,不用钢材,不用水泥,不用木材,不用红砖也。此楼以矽酸盐加玻璃丝筋与竹筋制成之大砌块为之,门窗用菱苦土(用锯末、刨花、滑石粉等材料制成)制成,暖气片系白瓷,暖气管道系玻璃制成。据云如此建筑,花钱少,修建快,质量好,当为建筑事业之新方向。”

12月12日,“今日《人民日报》登一篇《柳枝接骨术发掘记》,其事甚有意义,摘要记之。……时为1957年春,刘(达夫)已在武汉市中医院工作二年有余,得党组织之支持,即着手试验。早年

刘所闻其师所说方法,颇为简单。将柳枝剥去皮层,整成骨形,安放于动过手术的两段骨头的切面之间,用以代替截去之骨头。木与骨头接触处,涂以公鸡之鲜血。缝扎之时,于肌肉及外皮敷以生肌长肉之药物。刘即按此法于狗腿上作试验……迄今年四月间,此第四狗受试验已历半年,切开其腿而视之,接上之柳木已不见。击其骨而听之,从声音亦不能辨何处为木何处为骨。为拍爱克司光照片,惟见骨木结合处隐约有一条纹路。武汉医学院为之鉴定云:柳木已骨化,形成骨组织,且骨质致密,无复柳枝残迹。后有大有悟县染匠刘礼修,砸断左腿骨,自愿一试接骨术。接骨之后,结骨良好,不久即出院。各地医院闻此,或在动物身上试验,或已在人身上施用云。”

1958年人们沉浸在大跃进所创造的“奇迹”的喜悦之中,看到了从理想到现实经历了怎样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过程,但尚未看到收获了什么样的结果。

这一年年底,食品缺乏的现象已见端倪,爷爷在12月29日日记写道:“午后,偕满子外出,闲游王府井大街。近来食品供应甚紧张,副食品

尤然。原因甚多,主要在于农村公社化,以及炼钢紧急,运输力以供应炼钢为主。此是前进中之困难,《人民日报》已发表社论,鼓励大家注意生产副食品,公社应顾及商品生产。今日余之外出,意在一观市场实况。凡可以佐餐之食品,以及糕饼之类,店中皆空无所有。历走若干家,居然购得蛋糕一匣,糟蛋五枚,满子谓成绩不坏。外出将三小时,余稍觉吃力。”

在1959年5月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迎来粮食供应殊紧张,供应米面为少数,多数供应杂粮。我家每日至窝窝头。今日至善听人报告谓去年粮食丰产,但以‘放开肚皮吃饭’之口号,多耗粮食八百亿斤。又以提倡密植,群众不知适量,下种以多为好,共种四百亿斤,两项相加,共为一千二百亿斤。于是去年之丰产实效颇少,今年又需多方撙节粮食。副食品之供应亦殊不济。满子出外买菜,往往无所得,怨声时作。余亦无法慰之。”

最终画饼不能充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为泡影,“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成为定局,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沉重代价。

图片说明

(责任编辑 李晨)

“开拓文库”系列丛书(总第1辑)征稿启事(文史类)

“当代社科人文”系列丛书(总第10辑)征稿启事(社科人文类)

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学术专著的社会化利用,将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开拓文库”系列丛书目前正在组稿中,“当代社科人文”系列丛书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9辑,共计90余部图书。这两套选题(丛书)新的一期图书正在组稿中,相关事宜如下:

一、书稿要求:条理清晰、论证有力,能够较好地反映目前社会领域学术研究和实践中的焦点问题、具有时效性,可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

二、征稿范围:书稿主要以社会科学、人文与伦理、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历史与年鉴等论著,以学术研究著作、学术研究论文集等为主。

三、其它事宜:1、保证尊重作者著作权,签订

标准出版合同;2、组稿、征稿长期有效,来稿来函将在十个工作日内回复;3、寄稿须知:书稿打印、复印、剪贴、抄写、磁盘均可,发电子邮件更佳,请注明联系人、地址、电话;4、未尽事宜,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

投稿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杨庄南里长城国际B6单元705信箱(101121)

当代社科人文丛书编稿中心(收)

咨询热线:010-58438169 52995426

传真:010-52995426

在线投稿:bookcb@163.com

联系人:王老师

网址:www.bookyswh.com

我在晋江遭遇“假药案”

• 张明俊

(一)

1984年2月底,我从卫生部直属中日友好医院调到泉州,担任晋江地委书记。胡宏同志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书记,是项南同志的好助手,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深受福建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我赴泉州报到前,项南同志要求我做好三件工作:一是抓好华侨工作;二要发挥山海优势;三要解决交通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把晋江地区的经济搞上去。胡宏同志也和我谈了话,他指出,晋江地区是全国闻名的“文革”重灾区,情况比较复杂,事情比较难办,搞好工作很不容易,要我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干部群众,首先解决好“人和”问题。到泉州后,我按胡宏同志的指点,经过一段时间的摸底了解,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泉州的发展既逢改革开放“天时”,又得侨、台、文(历史文化名城)、山、海、热(亚热带气候)“地利”,只要把各方面理顺,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各级班子团结起来,把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形成政通人和的局面,是完全能够改变面貌,把经济搞上去的。于是,我集中主要力量狠抓三件事:一、落实华侨政策,坚决清退华侨私房;二、解决地下党遗留问题;三、彻底清除“文革”遗毒,维护干部队伍团结。

但是工作开展并不顺利。1984年5月的一天,正当我大张旗鼓地狠抓落实地下党政策之时,省里一位领导同志竟打电话责问我:“江一真同志《关于落实原闽南地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政策问题的建议》,是中央组织部只发到省一级的文件,你怎么公开向下传达了,还成立什么落实地下党政策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什么登记表、简报,你请示谁了?”我回答:“文件是项南同志给我的,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是地委的职权,至于需要向上请示的问题,我一定会向上报告。”接着,我把这个情况分别向项南和胡宏同志作了报告。省委决定

就在泉州召开全省落实地下党政策会议,并由胡宏同志亲自坐镇主持。会议指定我先作汇报,然后各地区交流情况,胡宏同志作大会总结报告。他肯定晋江地区的作法是对的,强调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党中央历次有关落实地下党政策的文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公公正正、彻彻底底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包括抢救使用、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党籍和落实入伍伍龄问题;强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要向前看,团结起来同心同德搞建设。这次会后,晋江地区坚决排除了阻力,加快了落实地下党政策的进度。到1985年上半年,全区复查平反冤假错案1300多件,审查恢复党籍近700人,一大批干部得到抢救使用,恢复了职务、级别和政治待遇,不少人调整了工资,有的还连提两级。

与此同时,华侨私房的落实工作也逐步开展。全地区750户、7250间、1.8万平方米的华侨私房得到清退落实;又结合整党深入开展彻底否定“文革”和坚持党的宗旨的两个教育,消除了派性,加强了干部队伍的团结,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振兴晋江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积极性,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

后来,我有一次到省里开会时,胡宏同志问我,晋江地区引进侨资起步比较快,有什么经验?我说主要有五条:一是对华侨有影响的人物,领导要亲自接待,重视同他们建立亲密关系;二是要落实华侨政策,下决心归还侨房,这是侨胞的“根”,不落实好,华侨就不会回来投资;三是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受迫害的干部、侨属,要给予彻底平反,特别要坚决落实好地下党政策;四是要简化出入境手续,坚决打击敲诈勒索的不法行为;五是新技术、设备引进后,要扎扎实实地把企业搞上去,经营好,增强华侨投资的信心。胡宏同志听后很满意,认为落实政策和发展经济要两手同时抓,不能偏废,抓落实政策是解决“人和”问题,是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干部群众的

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了，经济才能发展上去。他补充说：“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政通人和，才能万事兴！”

回想往事，应该说，当年我是在胡宏同志的指导和有力的支持下，集中力量解决好“人和”问题，才逐步打开晋江地区的工作局面的。

(二)

泉州经济的发展和腾飞，乡镇企业起了打头阵的作用。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乡镇企业一直是泉州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可以说，没有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泉州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乡镇企业毕竟是改革开放涌现的新事物，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于缺乏经验，领导者在指导上也难免出现疏漏和失误。

让我所想不到的是，1985年六、七月间一场暴风雨突然来临了！《人民日报》在没有派记者到泉州现场采访的情况下，就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触目惊心的晋江假药案》一文，还配发短评，措词尖锐，提到“谋财害命”的危害高度。地委、行署的领导震惊了，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作出回答，主要有五条：一是层层统一认识，端正态度；二是停止生产，所有制药厂包括原来经过批准的都停下来；三是召回全部推销人员，查处烧毁全部假药存货；四是对屡教不改、危害严重的不法分子予以法律制裁，严肃处理；五是总结经验教训，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以上几条我直接打电话向卫生部崔月犁部长作了汇报。他说，很好，部里要派检查组认真检查落实。会议指定地委委员、公安处处长马上到陈埭镇现场监督烧毁所有假药。可是，公安处处长到烧毁现场后，听到群众反映“林则徐烧鸦片，共产党烧白糖（‘假药’其实是白木耳加白糖制成的）”后，产生了犹豫，没敢点火，失去了向全国人民公开回答的良机，使地委、行署领导陷入被动。

那时，有许多干部被这场暴风骤雨打得晕头转向，开始怀疑改革开放是不是搞错了，说什么“还好没迈步，迈了步就会犯错误”。议论纷纷，疑虑重重。

正在这时，省里召开党代会，胡宏同志特意参加了晋江地区的代表团讨论。他在发言中强调，项

南同志多次要求我们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发展中积累的“群众集资、山海联营、引进侨资、技术升级”等经验很好，大有文章可做，要发扬泉州人爱拼敢赢的精神，每年突破几个高精产品。当代表们谈到“晋江假药案”压力大时，他说，陈埭的成绩是主要的，有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不要出了问题就否定一切，发生问题不可怕，只要认真及时地处理解决，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

会议期间，卫生部派的检查组到了晋江县，省委领导要我立即赶回去汇报情况。7月10日，我直接赶到晋江县，第二天上午参加中共晋江县委扩大会议。会上，我按胡宏同志在省党代会期间参加晋江代表团讨论的发言精神，讲了这么几点意见：“假药案”是乡镇企业发展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假药案”不论是晋江县或是陈埭镇，都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假药产值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比重，晋江县为5.5%，陈埭镇为8%，乡镇企业发展的主流是好的，假药问题是它的支流，对“假药案”要高度重视，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及时果断地对待和处理。同时我也指出，要以“假药案”为突破口，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我在大会上宣布对待乡镇企业的12字指导方针，即“除虫洗尘保花，勤劳守法致富”。

可是，我又没有想到，我的讲话惹出了大祸。当天午夜，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在中央电视台发布了“致中共晋江地委的一封公开信”，这种破天荒的做法，像泰山压顶，重重地压得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收看完公开信后，陷入了沉思，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假药”的问题又被大大升级了，出现了全国“围剿”、口诛笔伐的局面。很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来了检查组，紧接着中共福建省委也派来了检查组，紧锣密鼓地开展案件的查处工作。

这时，有的好心人劝我打回北京去，申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有的出主意让我到北京利用老关系活动活动；有的要我高姿态主动辞职或请求停职反省。我一一谢绝了，义无反顾地主动配合检查组投入紧张的全面查处工作，同时加强乡镇企业的整顿、管理，引导它们走“勤劳、守法、致富”之路。

检查组对我迟迟不作检讨颇有意见，他们却不了解我的难处。陈埭的“假药”问题是在我到泉

州工作半年多前发生的,我一时搞不清来龙去脉,只能在主管这项工作的地委、行署领导先检查后,我才能依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实事求是地作进一步检讨。项南同志为了帮助启发我,提议召开地委委员扩大会议,由他带头作示范检查,主动承担发生“假药案”的领导责任。殊不知正是这个检查,成为以后不经征求本人意见,就径直给项南同志作出党内警告处分决定的依据。我作的检讨总被认为不深刻,调子一直只停留在三个“不”上,即对“假药案”思想认识不足、法制观念不强、查处不力。因为我不赞成不负责任地看上面脸色行事,一味顺杆爬,上纲上线地乱检讨,只顾个人过关,不顾别的相关或直接责任者处境被动。

经过大半年深入、细致的紧张工作,停产的停产,销毁的销毁,判刑的判刑,处分的处分,“假药案”总算到了要做结论的时候了。一天,我收到省委发来的给我做处分结论的征求意见稿,要我负起近3000万元假药总产值的全面责任,指出我态度不端正,检讨不深刻,查处不力,还批判我提出“保花”就是保名誉、保地位。我再也不能沉默了,决心理直气壮地申述自己的意见。我立即给胡宏同志打电话,激动地说:“发生‘假药事件’,我还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工作,我怎么能负全面的责任。我在大会上讲乡镇企业的指导方针是‘除虫洗尘保花,勤劳守法致富’12个字,怎么能只拿出‘保花’二字来批判,这分明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那一套做法,我坚决反对。”胡宏同志听完我的话,冷静地说:“你的意见有道理,是要实事求是,你可以毫无保留地把意见写出来,用电报发给省委,我们认真研究,重新改写。”

不久,改写后的处分决定发给我征求意见,不提全案假药产值了,肯定我的态度端正,积极查处,只是要承担领导责任,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后来因要处分已经离职的项南同志,我又被加重改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我经仔细斟酌后,写上“服从组织决定,同意”八个字,退还给省委办公厅。过些时日,我又打电话给胡宏同志,告诉他:“我虽然签字了,但有保留。”他回答:“我已经看出来,共产党员有这个权利嘛!”我因受到党内处分,失去了被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的资格。过了一年的处分年限,我又被补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过“假药案”的洗礼,实际上我得到的比失

去的多,我得来了晋江地委领导班子的充实调整,得来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他们不再讲我“唱功不错,不知做功如何了”,得来了地委领导核心的逐渐形成。

应该说,当年我是在胡宏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才艰难地度过这个严峻难关,化险为夷的。晋江地区经过“凤凰涅槃”般的洗礼,也迎来了以市场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具有侨乡特色的乡镇企业蓬勃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三)

对台大额贸易全面整顿停止后,1988年9月的一天,惠安县委领导给我打来紧急电话,说有条台湾渔轮驶进崇武对台停泊口岸,要在当地聘请渔工出外海打鱼,然后负责直接送回崇武半岛,不进台湾,台湾渔轮要求马上物色对象签订合同,否则就驶往别处去聘请。这位同志焦急地要求我立即给他答复“行还是不行”。我问清是台湾民间基隆鸿顺渔业公司的渔轮,没有政治背景后,回答:“只要不进台湾,从渔轮上,又从渔轮下,我看可以先试行签约,以后待我向上请示报告,有什么指示再告诉你们。”接着,我就打电话向胡宏同志请示。胡宏同志明确表示支持我的做法,同意在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先试先行,但要求我尽快把它引导到正规的对外劳务出口的轨道上来,他将交代有权经营劳务出口的省外经部门帮助泉州抓好这项工作。接着,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泉州市唯一具有对外劳务经营权的中泉公司,要他们直接找惠安县抓好落实工作。这就是全国最先迈出的民间向台湾渔轮输送大陆渔工的第一步。

后来,事实证明,当时泉州实行的对台劳务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不久前,泉州市中泉公司应我所请,送来了有关资料,其中写明:中泉公司从1989年起开展对台渔工劳务合作业务,在对外签约、渔工招聘培训、办证外派、派后管理等方面规范经营,取得了良好的成绩。1989至2001年累计外派对台渔工53114人次,期末在外渔工保持2000人以上,为促进沿海经济发展、增加渔民收入、推进闽台经贸合作、密切海峡两岸人民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泉州市的这一做法,引起上级政府和主管部

门的重视、肯定、支持和推广。原外经贸部和福建省政府在总结泉州市做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从此对台渔工劳务合作业务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后来,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和一些不良台湾船东不守信用,导致大陆渔工劳务合作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国务院六个部委联合发文暂停对台渔工劳务合作业务。2006年6月,在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下,停止5年之久的对台渔

工劳务合作业务又全面得到恢复。泉州市中泉公司根据新的管理办法,在崇武口岸设立办事机构开展业务,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对台合作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胡宏同志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但他在福建领导岗位上的业绩并没有随风而逝。我久久地沉浸在对胡宏同志的缅怀之境。

(责任编辑 萧 徐)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丁玲在北大荒	郑笑枫	2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抹不去的记忆 老三届新三级	张 琦主编	48.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	新华社总编室	26.00	6.00
吴江文稿	俞可平主编	200.00	18.00
李昌传	周士元	68.00	8.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 22 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	刘 刚 李冬君	58.00	9.00
1978 大记忆	苏 峰	35.00	7.00
刷盘子 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7.00
三十年河东 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绳	39.80	8.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的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问史求信集	阎长贵 王广宇著	58.0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	邓 鹏	97.00	10.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揭秘	杨天石	60.00	8.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经历——我的 1957 年	和凤鸣	29.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于光远	于光远	36.00	7.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叶维丽	30.00	7.0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代购代邮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一场突破禁区与僵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身处核心地带、参与和直面大讨论的亲历者,以第一手资料回顾 30 年前的讨论内幕。

《走出个人崇拜》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先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浮现,并泛滥成灾,如苏联 30 年代——50 年代兴起的个人崇拜,导致肃反扩大化灾难。中国 60 年代——70 年代个人崇拜的狂潮伴随文革悲剧的发生。作者对昔日政坛上的领袖们,以人生的视角做出新的考察和反思……

《李锐反“左”文选》1957—1978 年的 20 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苏共亡党十年祭》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深刻剖析了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文章针砭时弊,“实话实说”,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

《问史求信集》这是一部由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著的问信文革史研究著作,书中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回忆和记录下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是一部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书,但不同于个人回忆录,书中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作者将了解的情况如实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探讨。

北京市内乘车路线:公交车 13 路、21 路、32 路、65 路、68 路在三里河东口站下车,西行 50 米路北,西华饭店院内。

邢志恒之死

• 王金屏

阅读了《炎黄春秋》2009年第八期上赵遐秋的文章《跟风整人的懊悔》，我彻夜难眠，无法抑制悲伤心情，灵魂激烈颤抖，流淌着泪水饮泣，眼前总是飘浮着邢志恒的身影……他可是我的同乡，又是同小学、同初中、同大学同系同年级同学，更是我情同手足的兄长啊！

六十年前我们在德州中学（现德州一中）读初中时，连同霍宪义大哥，被人称为“夏津县三小友”，相处如亲兄弟，只差没拜金兰谱，我喊邢志恒为“邢哥”。1953年毕业后，邢哥考上济南三中，我考入北京一中，难舍难分的依依惜别之际，我俩曾不知天高地厚地相约：“三年后北大中文系见！”1956年8月28日，竟然真在未名湖畔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能上北京大学的美梦，且以为从此前进的路上铺满鲜花，只要努力学习，肯定飞黄腾达，鹏程万里。当时的踌躇满志之状，得意忘形之态，难以用语言描绘，可见多么幼稚可笑和愚昧无知。但是，我们没有忘记刻苦读书和课业：邢哥床头贴着音韵对照表，连吃饭睡觉都琢磨以济南为代表的山东话与普通话有规律变化及无规律变化——这个自命的课题深受汉语老师的嘉许，不久我又在《解放军文艺》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赶庙会》，还有两篇散文刊登在这年《北京文艺》第12期和《中国红十字》第10期的副刊上。家乡的亲朋师友们闻讯一时间传为佳话，引以为骄傲，因为这是我们县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有人考上北大，还是两个人，又是竞争激烈的汉语和新闻专业，县教科还将我的作品收入了《乡土教材》。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我们这两个曾为家乡争过光彩的青年，居然还会给乡亲们的脸上“抹灰”：一个成了“右派分子”；一个“自绝于人民”……

我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主要“罪状”：一是“污蔑党不关心少年成长，摧残儿童心

灵”——上高中时我作为优秀青年团员曾当过交道口旁的东宫小学的少先队校外辅导员，见有些活泼可爱、学品兼优的小学生，由于家庭或社会关系原因不仅戴不上红领巾（当时正值“肃反”时期），过“队日”时还要求“小白脖儿们”必须参加，而这类小朋友大多表现得谨小慎微，缩手缩脚，连唱歌跳舞做游戏都笑得不自在。我认为这会使“祖国的花朵”产生自卑感，影响幼小心灵的健康发展，不应当因为大人的个人问题而牵连孩子，人为地分为“红”、“白”两类。在班内的“鸣放”会上，经主持人再三动员，我才抱着忠诚于党就要知无不言的想法热心地提了这个“意见”，呼吁过“救救孩子”。二是“攻击党的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曾以“美中不足”为题谈过农村干部存在作风粗暴、多吃多占现象。三是“在《红楼》编辑部当编辑时与‘右派分子’同流合污，疯狂地向党进攻”（后被开除出编辑部）。四是“翻身忘本，背叛贫农家庭，蜕化变质”……

在我遭隔离挨批斗期间，邢哥一直提心吊胆地关注着我的命运，可又爱莫能助，连面都不得相见。我接受“开除团籍，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宽大处理”后，遣送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公社西斋堂村“革心洗面”和“脱胎换骨”——亦即将光荣的劳动作为“苦役”和惩罚手段来迫使我“赎罪”，折磨得我经常腹疼难忍，修水渠驮不动200斤的大石头，被“护送”回学校医院看病，确诊为亚急性阑尾炎开刀割除那天，邢哥才于1958年7月2日晚间，避开众人耳目来医院看我，听我哭诉了一次。又谁知这竟然成了我俩永诀的最后一面啊！

赵遐秋和她丈夫曾庆瑞也是我同学，与邢哥同在汉语专业一班，曾跟我比较接近，二人毕业后分配人大中文系任教，我复学人大时赵已成为我的古代汉语授课老师，我应邀去他俩新组建的小家庭做过客，从未谈及邢哥的话题，此后多年



没有联系。赵在文章中写道：“出身富农家庭的同班同学邢志恒，一天深夜，在一场闹剧式的批判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也留下不再申诉，而且当时也无处申诉的冤屈，跑到邻村南独乐河路边的一棵大槐树上上吊自杀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邢西岳伯父去北京为儿子收尸回来，很快便和伯母一同追随邢哥而去了；小女儿投奔了邢哥“前妻大姐”，总算有了着落；年轻的教师邢嫂刘庆龄只好改嫁，去了外县，将小儿子送给了一位尚无子嗣的一位公社领导；公社领导后来有了亲生之子，我那可怜的小侄儿受尽虐待又遭遗弃……这一系列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后果，远在千里外的赵女士可能没有想到吧！所幸的是，这个衣食无着、到处流浪的幼童却天资聪颖，竟会无师自通地哭泣着跪地恳求县工商局工人孙师傅，许诺“像亲儿子那样孝顺，给你老人家养老送终”，慈善的老人立即将面黄肌瘦、穿着破衣烂衫的弃儿搂抱在怀中收为义子，致使他免除了冻饿而死的下场！1980年我回乡探亲时，经辗转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位曾被命运抛弃、已是煤炭公司主管会计的贤侄。他长相酷似乃父，中等身材，圆头圆脑，两只眼睛距离较远，小而亮，如果不是留着分头而是留短发小平头的话，我真会扑到他怀里喊一声“哥哥！”同时，我了解到孙师傅待他犹如亲生，供他读书，让他接班，给他盖房子娶媳妇，当可告慰邢哥在天之灵吧！这些事实我已写在《邢志恒之死》一文中，附录于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的《金屏诗词选·西苑草》一书。

然而往事似梦似幻，有许多问题依然似是而

非，我还有很多话想说。

首先，我要说我佩服赵女士的坦诚和勇敢，并向她致以衷心的敬礼和谢意！她在文章中说：“我不会忘记，那是批判邢志恒的第三天，我不能不发言了。我知道，发言不发言、发什么内容的言，都在表现自己的立场，关联着自己的政治前途。发言吧，明明邢志恒所说的，符合农村实际，我怎么说呢？要说只能说假话。不发言更是个态度问题，至少是政治立场不鲜明不坚定。那天中午，左思右想，我竟为个人的政治前途，迈错了一步，作出了一个不能原谅的抉择——下午，我发言了……为了表现自己的‘觉悟’，我的发言调子之高，帽子之大，嗓门之响，结束语里一改批判邵家基时所说的‘我提醒……’而用了‘我警告……’‘我正告……’，俨然是个‘斗士’的模样。”如此痛心疾首地对半个世纪前的“跟风整人”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沉痛的忏悔，敢于正视那时代许多人都犯过而又不正视的错误，并从中汲取警惕自我和鉴戒他人的惨痛教训，不惮于严厉解剖自我的灵魂，深挖羞于明言政治动机和思想根源，大胆地承认这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我认为真实可信，全是肺腑之言，绝无虚情假意，实在难能可贵。这样审视自己的人，必然具有相当的精神境界、渴求净化灵魂的愿望、宽广的胸怀和面对事实的勇气，并与“理直气壮”、“讳莫如深”、自欺欺人、闪烁其词地辩解和文过饰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祈求人们都像赵女士这样光明磊落和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评论上世纪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还每个历史事件以原本的真实面目。

其次，我感谢赵女士揭示了邢哥“非常死亡”的社会根源，并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第一次有人肯定那样的“牺牲”也存在着正面因素，记录了“一个无辜的人为我们时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当时的北大党委害怕事态扩大，终于召回了自己的学生，我们的‘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这个事实，证明邢哥以死相争还有“现实意义”——即使这点小小的“让步”，难道也非得用鲜活的生命来换吗？

同时，赵女士为我提供了有关邢哥死亡的一些信息：一、时间是1959年秋天——她没说具体日期，但我很想知道，待同赵、曾二位取得联系

后相信他们会告知我；二、地点在北京市平谷县（现为区）南独乐河村路边的一棵大槐树上；三、挨批斗的“原因”是他“代表农民的利益”说了“符合农村实际”的真话。有了这三条，我就可以进一步向父老乡亲们多“交代”些悲剧发生的某些细节——因为邢哥去世时我还在北京，按说我有这个“义务”，许多人曾三番五次地询问过我。殊不知我那时正在深山老林里“炼狱”，每天早起晚睡，外加连续夜战着打眼放炮，劈山修路，淘粪喂猪，或叼了电石灯光着屁股下小土窑，傍了小毛驴爬着往外拖煤和石棉矿石，终日干又累又脏又险的活儿，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和“自我检查”，或参加相互指责的“评判会”，还失去了行动自由，没有休假时间，而且山高路远，五十里内不通汽车，我确实不清楚邢哥是如何地走向了那条不归之路的。直到1960年10月25日我复学人大新闻系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急忙去北大寻兄，问遍他们班的同学，那回答不是摇头便是不语，且匆匆地走开。我找到邢哥的同班、也是德州中学毕业的张曰凯，才听到“他上吊自杀，死了”几个字……此后我与《小说选刊》编审的张曰凯相逢于德州市文联，又于2002年5月去北京市潘家园专程登门拜访他，他仍然闭口不言此事。

多年来我一直清晰地铭记着邢哥的形象和言谈举止的特点，经常在梦中相会和哭醒，永远不想承认那个残酷的事实，怀念和痛惜之情难用语言表达——一条五尺高的堂堂男子汉，一副健壮的身躯，一颗装了不少文化知识的头颅，连同我们的兄弟情义和他的语音研究，竟然没等到开发其积累和潜在的能量，施展其才华和特长，结出累累的硕果，就化作了一抔黄土，能不让人惋惜和心疼吗？在我印象中他生性并不怯懦，是个富有进取精神、有理想抱负的青年，有实例为证：一、作为封建包办婚姻受害者的“小女婿”，他十几岁就敢于反抗传统的陋习，以新颁布的《婚姻法》为武器，既解放了并不幸福的“大姐”，且为自己以后与刘庆龄自由恋爱结婚扫清了障碍；二、是他将原名“兹衡”改成了“志恒”，摒弃脂粉味道，呈显阳刚之气，表达着百折不挠的信念……可如今又“志”在哪里，“恒”在何方啊？

当然，邢哥自杀不能完全归罪于社会，他自

己也有过错。我曾怨恨过他，怨他糊涂，恨他分不清轻重缓急。我当时以为“反右倾”挨“辩论”不会像“反右派”遭批斗那样激烈（若干年才知道原来“辩论”和“批斗”是同一“整人方式”的两种说法），“右派”比“右倾”的“罪孽”更深重，咱们学校不是只枪毙了几个，逮捕法办和“劳动教养”的也不多，大多数是像我这样“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吗？“自我解脱”，不仅辜负了国家的培养和父母的养育之恩，更是软弱的表现，是对命运的屈服。放弃的不仅是个人的性命和学业，还有时代的使命和家庭的责任——作为匹夫应该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力所能及的奉献；作为人子应该孝敬和赡养茹苦含辛养育自己长大成人的父母；作为人夫应该珍惜爱情，同甘共苦，相依为命，贫贱不移；作为人父，应该扶养和教诲年幼的儿女，而不该给最亲近的人们造成巨大的痛苦和重重灾难！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他会冒出“生不如死”的想法，并且付诸“实践”？是不是因为见我和其他的“右派学生”的遭遇太残酷无情，临到自己头上便产生了畏惧心理，导致了思维混乱，“钻进牛角拐不过弯儿”，感到绝望才走上了那条绝路？我对那些来势猛烈的“教育”和“帮助”，即“批判”和“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遥遥无期的“改造”，深有体验，感受痛切而刻骨铭心，尤其是那种人人喊打的“口诛笔伐”，比肉体的摧残更难以叫人承受，极可能引发出“彻底解脱”的念头。我也曾萌生过“自我了断”的想法，只因为一想到年老多病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子，怕他们经受不起天塌地陷般的沉重打击而有些犹豫，才没有“一了百了”。邢哥之死促使我昼夜冷静地思考，逐渐地看清了以言获罪的人比比皆是，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全是“在劫难逃”，每个人都在“过关”，进而认识到社会上不可能存在这么多的“阶级敌人”，如此“阶级斗争”有悖常情，真理一定战胜荒谬，迟早会还无辜受害者一个清白。

总体看我比邢志恒和一般“右派”还算幸运些：其一、出生贫农家庭，祖辈务农，不是1945年9月八路军解放了县城，分到了田地，家里不再饥寒交迫，我根本没有机会上学，更甭说考上北大。其二、处分中保留了学籍得以复学，1961年较早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64年拿到了毕业文凭。其三、在西斋堂“劳改”和在人大读书时，

多数人对我还较宽容,特别是分配到沈阳市毡业生产合作社继续进行工人阶级监督下的“劳动锻炼”,在灰尘飞扬的车间弹回收羊毛的那十五年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幸亏有工人师傅暗中保护,只“批斗”了一次,向毛主席像“请”了半年“罪”,从没触及皮肉,工厂还为我治好了肝病,不然当体弱多病、身为“牛鬼蛇神”的我,很可能过不了那一关啊!其四、1979年2月北大给“改正”了“错误的政治结论”,我正式调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后称辽宁省作家协会)工作,文学爱好和谋生手段结合在一起,总算是为国家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后半生还能出版几册著作,实现了部分理想——假如步了邢哥的后尘,这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便无从谈起,亦可谓之“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此生总算没白活!

作为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将耳闻目睹的事实写成文稿,使后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汲取惨痛的教训,我责无旁贷。于是,我记录了“知识分子的早春”、“百花齐放的初夏”、“风狂雨暴的金秋”和“冰天雪地的寒冬”,如实地写下了北大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换,“引蛇出洞”和“阴谋阳谋”的实施,闹剧和悲剧上演的场景及严重后果,从而揭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命运遭遇、思想冲击和精神状态——他们当中不少人既热情又单纯,既真诚又固执,既是国之娇子、时代

的宠儿,又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做这样的事,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回首大半生的“右派岁月”,我早已无怨无悔,“右派”二字也许会成为光荣的标志吧!

(责任编辑 萧 徐)

《炎黄世界》敬告广大读者 设立“订阅幸运奖” 欢迎破月订阅

本刊今年第一期在面世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好评如潮,而第二期的内容质量又大大超过第一期,我们保证今后一期比一期内容更丰富、精彩。

为此,本刊呼吁广大读者抓紧机会,破月订阅《炎黄世界》,这本内容丰富、卓越和全国同类刊物中订价最低廉的刊物,本刊还设立了“订阅幸运奖”,即凡订阅本刊半年以上的读者,请保留邮局或本刊给你们的订阅收据,于今年12月15日前把收据原件或复印件寄来本刊,我们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抽奖,共抽出35名幸运获奖者:

- 一、一等奖5名,每名电脑一部,
 - 二、二等奖10名,每人获赠数码相机一台,
 - 三、三等奖20名,每人获赠手机一部。
- 届时由本刊负责把奖品寄送给获奖者。

炎黄世界杂志社

2010年3月

联系电话:020-85171214 85171024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永福路42号永福楼西塔504室 邮编:510095

按需出版

2004年我公司在国内率先与出版社合作开展按需出版业务。5年来引领行业潮流,已为300多位国内作者出版了学术专著、回忆录、游记、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华人作者出版了著作赠送亲属友人,精美的按需出版图书深受广大作者欢迎,成为品味高雅的礼物和更有价值的纪念。

按需出版是新的数码出版方式,具备四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难题。(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投入过多印数过多造成浪费。(4)出版周期短,一般在1—2个月。重印在1—2周。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长辈遗作;书法、绘画、照片、奖状复制;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册以下最合适。

继续征稿 (50本起印)

资金投入:自费。以50本(大32开)为例,基本费用200页2000元,300页2800元。如需加增录入排版、装帧设计制作,则共为4000~4500元上下(含2页彩插)。具体价格视稿件形式、种类、字数情况确定。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需符合我国出版法规。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作者享有著作权。

正文纸张:70克胶版纸(黑白)、128克进口铜板纸(彩色)。印刷质量:上乘。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1号楼1509号,邮编:100192,热线:13521531088陶女士。

电子信箱(E-mail):173736757@qq.com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外地邮寄。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钱学森之问”： 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 张绪山

提问者心中早有问题答案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据说这是不久前驾鹤远去的钱学森先生为中国人留下的设问。最近这些日子，这个设问以“钱学森之问”的名称流传开来，成为许多人试图解答的命题。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颇有点类似古希腊神话中人面狮身女妖提出的“斯芬克斯之谜”：什么动物走路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而腿最多时最无能？其实提问者心里有着明确而实在的答案，只不过不愿说出而已。据报道，2005年温家宝看望钱老，钱老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的大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造成人才“冒”不出来。不过，人们不太注意钱老此前还有一段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就凭这个感慨，我们就可以断言，在钱老心中，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何以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在随后“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的时期何以日月不光、山岳潜形，是有着清醒意识的，换言之，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钱老的自问自答，胸中早有现成的答案。

钱老是绝顶聪明的人，以他接受欧美现代教育而成为杰出科学家的教育背景，他不可能不明白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生前对人们一再强调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自由探索的经历，说明他对于造就科学大师——更宽泛些，造就大学者、大思想家——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了然于胸；更重要的是，他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亲眼目

睹了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独立意志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失语到覆亡、再到新一代鹦鹉学舌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而他本人也在“科学为政治服务”那种咄咄逼人的政治氛围中，有违科学家的基本修养、写下那为后人诟病的“科学帮闲”文章，他不可能不明白，对杰出人才的致命戕害来自何方。以钱老本人那非同寻常的亲身经历，他不可能不明白，他之所以能够受到当局的一贯重视，成就一世的辉煌，虽历经一次次洪涛巨浪而安然无恙，风采依旧，而没有像他的大多数同代人那样遭受灭顶之灾，正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科学事业不仅与政治少有纠葛，更重要的是，他在自然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变成了政治家宣扬文治武功的资本。

很显然，集高度智慧和独特经历于一身的钱老，在来日无多的晚年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委婉地提醒当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前提下，现在是解决人才培养问题的时候了。

为何不允许杰出人才“冒”出来？

时下流传的“钱学森之问”，原来是这样一个问题：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本来不是问题，而是事实陈述。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老，他的谈话——“钱学森陈述”——涉及的是现时大学教育在培养自然科学杰出人才的缺陷，涉及面很狭窄。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培养出杰出科学研究人才，同样也没有培

养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而大科学家与大学者、大思想家，所赖以涌现的土壤是相同的，这两类杰出人才的出现犹如一对连体婴儿，是相偕而来。一个不能长出杰出科学家的土壤，同样也不会生长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反之亦然。也许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人们才将“钱学森陈述”转变为一个设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表达方式的变化中，“钱学森之问”已经扩大了“钱学森陈述”的内涵。



1999年12月8日，江泽民到中国“太空计划之父”钱学森家中去看望他。右为副总理李岚清（新华社）

不过，即使扩大了内涵，这个提问还是存在严重缺陷：如果仅仅从技术操作层面追问人才为何不能“冒”出来，担当培育人才的各级学校无疑是难脱干系、难辞其咎，但如果从教育制度所依存的整体社会环境来思考，恐怕不能简单地止步于对大学环境乃至教育制度的质问，因为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的运行模式乃至整个教育制度，都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在国家意识形态决定和支配教育运行方式的前提下，教育部是直接主事者，而学校只是教育部管辖的行政部门之一；在学校从根本上没有自主办学权的情况下，仅仅追问学校的责任，这就像旧社会的大家族里，对一个没有管家权的小媳妇发问“为何没有管理好家族事务”一样文不对题，一样怪异荒谬。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所谓“钱学森之问”，更精确地表述应该是：为何不让杰出人才“冒”出来？

亚里士多德已回答此问题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做了回答。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化思想的创造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真兴趣，二是充分的思想自由，三是充足的闲暇（时间之保障）；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一个时代出现这三个因素重合的条件，则将形成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而历史的怪异逻辑是，这三种因素叠合的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

从生物学角度，潜在的天才人物在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时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真正的学问爱好者从来不乏其人，然而，即使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兴趣也很容易被引向歧途，偏离学问之境。以中国的历史实际而论，天然存在的庞大人口数量，是天才人物永远存在的基础，但中国社会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文化实用主义（所谓学以致用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决定了对形上思维的欠缺，而两千余年间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更将绝大多数才智之士的兴趣吸引到了官场。唐太宗看到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鱼贯而入，志满意得地慨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时，“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天下英雄”实际上已经在体制上和思想上沦落为“食君俸禄，为君分忧”、“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的奴才。儒家所谓“修齐治平”的“治人术”成为士大夫阶级“学问追求”的核心内容，注定了学者的心灵与“非人事”学问的隔膜，“仰望星空”、追求为学问而学问成为不可能之事。在我族传统思维上，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

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蜚声世界学坛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的为题，被称为“李约瑟命题”。“李约瑟命题”在本质上与“钱学森之问”乃是异曲同工，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陈独秀分析中国社会的传统思维特点时指

出：“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实际上从一个重要方面早已回答了“李约瑟命题”。“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的官场诱惑力对非功利的纯学问的兴趣的销蚀，从一开始就阻断了杰出人才走向学术研究与文化思想事业的途径。试看今日官场如何“潇洒”地挥霍国民财富，再看如今国人如何聚谈官场现状则为之痛心疾首、切齿为恨，独处观望则心向往之、垂涎三尺，恨不能那“好事”立刻落到自己头上，我们就可以明白国人的兴趣何在。在一个读书人看到官场荣华则黯然神伤、自惭形秽，或情不自禁发出刘邦式的“大丈夫生当如此”慨叹的社会，读书人对学问的兴趣很容易被更强大的竞争者压倒。

对于杰出人才的成长，思想自由简直就如同空气与水分对于生命一样重要，然而，思想自由绝非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时代都能提供。在我族两千余年皇权专制社会的历史上，“思想自由”是与“无父无君”一样被视为怪异可怕的名词，只有两个时代是例外，一是春秋战国之际，一是清末民初。这是两个政治上非常态的时期，但又是真正称得上群星闪耀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相似性在于，数十年时势演变孕育的杰出人才，如灿烂星河的群星一时间布满天空，但旋即随着思想自由的消失而归于消失。

钱老慨叹：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再次印证了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国家不幸诗家幸”，即大一统政权与思想自由的不两存。解决这个难题的理想途径是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保障公民的权利。

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群体在随后时期不得善终，相反遭受灭顶之灾的事实，可以使我们明白思想自由对于杰出人才成长的意义。在思想不自由的环境中，不惟新的学术大师不能出现，就是已经卓然而立的学术大师也不能正常存在。这样的实例俯拾即是。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史上，陈寅恪是公认的学术天才，从青年时代就坚持“读书不为他人忙”的学术宗旨，深知思想自由乃学术研究之根本要素。1953年底，他的学生汪篪南下广州，劝请他北返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

所所长；陈氏提出的条件是不信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随后更以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重申早年所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表达的主张：“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然而，在领袖思想笼括一切真理的新天地中，陈氏只能徒叹奈何，晚景凄凉。

汤一介教授面对人们给予他的“哲学家”称号敬谢不敏，认为其父汤用彤一代许多人可以当得起这个称号，但他这一代人不能称为“哲学家”，因为这代人的任务是解释领袖的思想，不是独立思想的创造者。换言之，在领袖思想面前，任何独出心裁的创见都是旁门左道的“异端”，是不能作为人类正当的思维成果而存在的，其道理正如基督教徒所谓《圣经》之外无真理，必须加以消灭一样。

对学术研究有真兴趣的天才人物，还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保障其思想自由条件下研究活动的进行。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的人物中，钱钟书与季羨林是国人非常熟悉的大学者，然而，钱钟书有下放“干校”劳动空耗其不世出之才的经历，季羨林有过进牛棚、挨批斗的遭遇，此二人都为“不得闲”而荒废了一生最具创造力的时光，只是在晚年才重得闲暇而在学术研究上绽放出应有的光彩。

当我们明白杰出人才成长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后，我们还会纠缠于所谓“大学为何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这样的问题吗？

对“钱学森之问”的解决不要抱太大希望

杰出人才每个时代都有，但天才人物成长的环境并非任何时代都具备。恩格斯赞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强调的是杰出人才顺时而生，是时代的产儿。鲁迅以其深沉的历史感指出：“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

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会因为没有泥土而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未有天才之前》)。换言之,杰出人物的成长,只有得遇社会环境提供充分的条件——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充足的闲暇——时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任何杰出人才的成长和存在都基于相应的社会土壤。

中国政治传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下愚”是统治者渴求的理想状态。这套治国思路曾丝毫不爽地再现于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间,“知识越多越反动”是最高当局的基本认识,所以在发动一次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之后,还于1968年坚持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大学”。可以想见,此时中国社会中一切以思想创造为目的的思维活动已经无可挽回地全面终结了。以此为标志,以“低头思考人间道德律”为特征的人文学科也迅速走到了尽头。

至此,我们可以仿照恩格斯的思路,来回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这是一个不需要杰出人才——在思维能力、怀疑能力、批判能力和创造能力方面的杰出人才——的时代。

钱老慨叹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无一可与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提醒我们注意民国时代教育家的办学理念。蔡元培于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8年他在《开学式演说词》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919年9月20日又明白告知北大师:“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的。为了达到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他主持北京大学期间,始终贯彻的办学原则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

包。”正是这貌似简单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赋予了北京大学作为现代高等学府的灵魂,使之既包容暮气沉沉、拖辫子登讲坛的辜鸿铭的“旧学”,也优渥意气风发、锋芒毕露的陈独秀、胡适的“新学”,使这所大学从一个老爷资格养成所脱胎换骨,演变成一所胸襟开放的现代学术殿堂。

在当今中国的衙门式的高校里,“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谁还相信“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面对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谁还相信学者的活动乃出乎天然的兴趣?此其一;其二,所有高校产出的所谓“学术论文”,有谁敢说“本人研究成果乃自由探索之结晶,非任何教条思想之服膺品”?其三,教育部门的官员每时每刻都在挖空心思地想着出政绩,不断催促教师们填写名目繁多的各种表格,以各种项目下的经济诱惑将教师们的头发折腾得由黑变白的时候,还有多少闲暇用于潜心的研究?既然学者对学问的兴趣被销蚀,学术研究被一些信条束缚而不得自由,独立意志不能自由实现,而学术研究所必须的充足时间,先是被各类以“思想改造”为目标的无休止的政治学习所消耗,现在又被强制性的或充满巨大利益诱惑的没完没了的表格所耗费——概言之,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所需要的最根本元素均难以具备——那么,怎能指望杰出人才的出现?

自钱老逝世以后,“钱学森之问”似乎成了整个民族必须直面的大问题,但在我看来,即使有识之士将答案明白无误地摆出来,也未必产生什么效果。从中国政治传统而言,尽管从孔夫子以下,对“中庸之道”的呼吁两千余年间不曾中辍,但历史上历次变法运动往往失败,说明中国政治不熟悉改良之道。中国的教育要实现改变,但愿不必等到“烂透了”的那一天。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启 事

2008年精装合订本 85元,简装 80元
2009年精装合订本 100元,简装 95元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知识分子何以有“戒心”

• 吴 江

英国广播公司(BBC)于1999年公评千年的伟大思想家,投票结果是马克思以压倒优势被评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其次是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这是大家知道的事,一位来自挪威的投票者科里森说:“马克思启蒙了数以千计争取自由主义的斗争,他是现代政治思想之父。”另一位投下神圣一票的美国人卡普尔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作出了最好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末实际上已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制度,他的思想学说,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当今的世界,仍极具参考价值。”

这是客观公正的,可谓“公道自在人心”。

然而,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马克思为自己的学说被歪曲所说的一句气愤的话,然而又不仅仅就学说而言,在社会主义实践上,同样有这种情况发生。

就以马克思主义者力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件事来说罢。在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目标中,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无可怀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恩格斯晚年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阻挠言论自由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怒。他愤然说:“难道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为了在自己的队伍中取消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吗?”

但是如果拿在野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那点阻挠言论自由的小动作和后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压制言论、思想自由的行为相比较,那实在又是小巫见大巫。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做梦也想不到的,因为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实现的预测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必然是崇尚知识、科学和文化,实现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社会公正的社会,否则,就称不上是什么社会主义。而马克思原

来所说的无产阶级统治,其本意就在于保证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然而,后来社会主义的现实却远离了马克思的预想。

苏联垮台后,一些原来未曾公开的真相逐渐传布于世,在文化方面,主要是围绕着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当局的分歧而暴露出当时革命对于文化、思想、科学及知识分子的压制、禁锢、摧残,乃至对于一些著名学者的被驱逐和处决,思想上一片恐怖。又公布了当时纪德与罗曼·罗兰等国际名人旅游俄罗斯的《日记》和文章,证实了以上事实,引起了世人注目。就俄罗斯革命初期情况来说,主要是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及其以后,固然夹杂着复杂的政治冲突,不少著名文化人和科学家也参与其中,因此变成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但多数情况并非如此,多数情况是因政见不同或认识不同被当成“反苏维埃分子”而遭清洗,虽然列宁采取了较宽容的政策仍无济于事。斯大林的统治确立以后,苏联的科学文化总的来说有提高,但思想垄断变本加厉,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一概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唯物主义路线与唯心主义路线)斗争”为纲,不断发动批判,而且从中发掘“西方间谍”和“苏维埃敌人”等,经常弥漫着恐怖气氛。伟大的俄罗斯文学艺术从此一落千丈。

中国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开始团结了国内广大知识分子,起初颇有些民主气象。但是一进入社会主义,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没有发生像俄国十月革命开始时那种紧张清洗情况,因为大家都心甘情愿地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很快,厄运就来了。那就是将知识分子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实行思想改造,首先就是立场的转变,要求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变为无产阶级立场,所谓无产阶级立场,其实是抽象的,直白地说,就是

要求符合主流意识和意图,或曰“舆论一律”。这就把制造精神产品的知识分子们难住了。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他们紧紧地束缚住,谁都怕犯错误,不敢轻易动笔。下面就让我们根据目前报刊已公布的材料(恕不一一说明出处)来看一看原来较有名气的一些作家在进入新社会后的活动状况吧:

关于茅盾。曾任文化部长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开始他也写小说,写电影剧本,但都没有成功,但渴望写作。1957年1月,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给予一段时间的创作假,他说:“五年来,我不曾写作,这是由于自己文思迟钝,政策水平思想水平低,不敢妄动,但一小部分也由于事杂,不善于挤时间,并且以‘事杂’来自我解嘲……每当开会,我这个自己没艺术实践的人,却又不得不鼓励人家去实践,精神实在既惭愧且又痛苦……年来工作余暇,也常常以此为念。”他提出,要将自己的写作构想先整理写成大纲,“拿出来请领导上审查。如果可用,好时再请给假,以便专心写作。”(《茅盾书信集》第401~402页)这里,请读者特别注意他信中的最后几句话。

关于巴金。巴金和老舍的情况较好些。老舍在新中国不再写小说了,但其剧本《茶馆》、《龙须沟》等则影响颇大,所以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巴金则除了写些关于朝鲜战地的通讯、短篇小说及其他应景文章以外,几乎不曾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理解去写作。他曾酝酿多年的《激流三部曲》的续篇《群》始终限于领导所规定的框框,怕犯错误而无法下笔。在目前出版的《巴金全集》中,其在1949年前所写的著作超过十五卷,而在1949-1966年的十七年中,合起来尚不到五卷。

关于曹禺。戏剧大师曹禺一生出版了九部戏剧作品。解放前六部,以《雷雨》、《日出》、《原野》为代表。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三部经典作品,至今好像无人能逾越这一高峰。解放后出三部《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多为遵命之作,成就和影响不大。《王昭君》一剧写得很有功力,台词很美,但因政治性太强,演出一场之后再未重



《烈火中永生》工作现场。左起:汪洋、于蓝、水华、赵丹、夏衍

演。才气横溢的曹禺,竟成了一位“好好先生”,不敢逾“规”一步。画家黄永玉不客气地写信给他,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一条小溪流。你泥溺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1994年6月,吴祖光曾写了一篇文章《掌握自己的命运——与曹禺病榻谈心》。那时曹禺患病住院,吴去看他,曹禺浑身不自在地谈起自己一生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说了一句深藏在心中的话:“你太听话了!”曹禺的反应异常强烈,也脱口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太听话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得揣摩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了曹禺的遗著《没有说完的话》,这本书选录了曹禺的日记、书信和谈话。其中有这样的话:“一个作家到了老年,回顾一下,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狭窄,窄呀!道路狭窄,这是痛苦的,很痛苦。”“我自己正想写点东西的时候,需要的资料没有多少,就悔恨,就难过。”他的夫人在《后记》中写道:“他真,但他胆子小,常常害怕,不知怕些什么。曹禺是一个太复杂的人。”

吴祖光在《掌握自己的命运》一文的,最后写道:“我认为,解放后,极其聪明和敏感的曹禺,大概很快便察觉到当今只许‘舆论一律’的政治空气,他大约不得不被迫收敛起他所有的才子锋芒,小心翼翼地应付甚至迎合这个严峻、严酷的

现实社会。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啊！”

曹禺内心中是否真甘心做一个听命的“好好先生”呢？当然不是。1998年曹禺写了一首题为《如果》的诗。这首诗写道：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能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
再不愿终身
这样存有戒心

但是曹禺最后还是在摆脱不掉这种戒心的情况下痛苦地逝世了。

那么，吴祖光本身又怎样呢？吴祖光也可算得上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1953年2月2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谈他自己的写作生活。他说：他在1949年前的十二年中写过九个多幕剧，一个独幕剧，创作或改编了六个电影剧本，十个散文集，都得到了发表、演出和出版。1949年后的三年，“我几乎停止了创作，只改编并导演了一个电影片《红旗歌》，编写了一个评剧本《牛郎织女》，再写了一些短文。”他说：“在旧中国的黑暗年代，在创作生活里我没有感到过题材的枯窘，相反常常是在写作某一个作品时便酝酿或完成了下一个作品的主题了……解放后，我的创作源泉好像突然堵塞了。”

还有大家知道的早已谢世的著名演剧家赵丹，他临终前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样写文章，演员怎样演戏”，“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最后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是多么沉痛的话！

就是一些做党政领导工作但也动动笔杆的人，也不脱这种心态。韦君宜的《思痛录》写她的丈夫杨述说：杨述青年时代也是下笔千言，“但是，到后来他在党内工作的时候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便越谨慎，文字也越短，思想越来越放不开了”。怎么会放不开呢？因为他习惯于“摸精神”，摸到“精神”以后就按所摸的来行文，不越雷池一步，文章“索然无味”。

这种现象，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逐渐积累起来，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点。有人问，我们的

社会为什么只是出军事家、政治家，而出不了思想家和新时代的大师呢？我想，这个原因恐怕也要从上述社会状况去找寻。在只能按领导意图去写去想的条件下，除了滋生“遵命文学”和“风派”以外，如何出得了思想家和大师呢？

社会主义社会允许这种状况存在吗？本文一开头提到恩格斯是斥责在自己队伍中扼杀言论思想自由的做法的，马克思又怎样呢？请读一读马克思写的《评普鲁东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刊登的第一篇文章。其中有两段精彩的文字：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眼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惟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社会主义的精神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我们为什么要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及其他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一种调子呢？至于假如有错怎么办？我看可以通过民主讨论，通过平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这是条正常的途径。

2000年2月旧作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务长，著名哲学家）

（责任编辑 萧 徐）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电话：13611159388

汇款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

鸿顺园小区528信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编：102488

为讲座松绑

• 丁东

对于大学来说，开门延请校外各方面的知名人士演讲，本来是一种常态。世界各国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中国领导人以到国外大学演讲为荣，外国政治家也以到中国的大学演讲为乐。这种演讲不仅有外交上的意义，还能丰富大学教学内容，活跃大学的学术气氛。

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以外的高等院校，讲座的意义尤其重要。前几天，我参加北京外国语大学展江教授的一次演讲，遇到一位来自郑州某高校的研究生。他说，听这样的演讲，太开脑筋了，真希望北京的著名学者能到我们那里去演讲。我说，很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当年是在山西念的大学，太知道地方院校的学术环境了。地方院校的学生，很可能上四年大学，再念三年研究生，都没有听过一流学者的演讲。目前中国的学术格局是，地方院校冒出一些杰出人才，往往向中心城市的名牌大学流动。而中心城市名牌大学的一流学者，基本上不会向地方院校流动。久而久之，就苦了地方院校的学生。同样是上大学，不要说见不上大师的面，就是一睹那些一线学者教授真容的机会也没有。学位证书拿到了，却连本学科前沿的门牌号数都不知道在哪儿。

前几天，我还认识了一位刚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硕士。和他聊了一番，感到他眼界很开阔。他告诉我，本科是在内地上的一所地方大学，基本上没学到什么真东西。到香港中文大学自费读了一年研究生，学费加生活费大概花了10万元，费用虽然比在内地上学高得多，但还是很值得。光是那里中外著名学者川流不息的讲座，就是内地大学根本听不到的。

中国现在的交通条件比过去大有改善。高校的经费也比过去宽裕得多。就是地处偏僻的院校，邀请一线的知名学者讲学，从物质条件上讲也不再困难。但从政策环境上讲，却有越来越困难的趋势。比如，教育主管部门不久前下发文件，对于社会人文学科的讲座，不是着眼于鼓励，而是强调讲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对涉及敏感问题要严格把关。强调贯彻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管理，严格把关，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对讲座中传播错误观点的，对相关负责人员，要依据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讲座的校内具体主办

单位要严格按照审批程序申报，对拟邀请报告人的情况和报告内容进行认真了解，并征得拟邀请报告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同意。学校人员被外单位邀请担任讲座报告人的，必须经所在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同意，并上报校党委批准。这样的政策，在政治上是足够正确了，但结果很可能让一些大学的管理层对举办讲座心存畏惧，畏首畏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思想活跃，擅长研究当前公共领域前沿问题的学者，也会被视为敏感而拒之门外。

以这样的心态防范大学讲座，在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人们已经知道，中国大学的现代传统是由蔡元培先生在上世纪初奠定的。他的基本思想可以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来概括。他管理北大，陈独秀可以讲，胡适也可以讲，李大钊可以讲，辜鸿铭也可以讲。这才孕育了北京大学的新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甚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得益于此。这是历史的经验，今天并不过时。我希望新任教育部部长能够接续蔡元培的传统，对现行规定有所反思。如能为讲座松绑，则学生幸甚，校园文化幸甚，中国大学幸甚。



不堪回首的回首

——刘丽英书评

● 王海光

——

在中国新时期反腐败斗争中，中纪委刘丽英可谓是一个如雷贯耳、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许多腐败大案查办，许多腐败高官的落马，都是与刘丽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刘丽英一向以办“要”案“硬”案著称。她到中纪委后，即参与了“两案”审理江青集团的工作，与江青打了3年交道。以后她又负责查办了许多涉及高层的重大案件。如江苏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辽宁沈阳市的“慕绥新、马向东”案、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案等，查处了一批涉案高官。刘丽英查办案件，敢于碰硬，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被群众称为“女包公”，纪检“铁娘子”，甚至把许多别的案件如著名的厦门“远华”走私案等也归在她的名下。这无疑是寄托了人民对反腐败的殷切希望。也正因如此，人们也对她的出身背景多有猜测，以为是大有来头，传说很多，其中一个版本是把她说成刘伯承元帅的女儿。

最近，刘丽英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往事回首》（新华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向公众披露了她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成长过程，以及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前在沈阳市公安局工作的经历。刘丽英写回忆录，一如她严谨细致、实事求是、亲力亲为的办案风格。在写作过程中，她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史志书籍，与当年的老领导、老同事一起回忆往事，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核对情况细节。书稿初成后，她又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笔者有幸也被列为征求意见者之一，亲身领略了刘丽英做事的认真严谨和对事件细节惊人的记忆力。

刘丽英生长在哈尔滨市一个非常普通的城市贫民家庭，小时生活十分拮据艰难。1948年7月，初中刚毕业的刘丽英被选调到公安部干部学校学习，随后参加了沈阳市公安局的接管，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公安干部。

刘丽英在沈阳市公安局长期负责干部人事工作。她为人正直正派，工作兢兢业业，对局内干部情况非常熟悉，有“活字典”的赞誉。如果没有那场“文化大革命”，刘丽英的一生或许也就是一位优秀的公安人事干部的一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嫉恶如仇的刘丽英挺身而出，与那些“运动棍子”的胡作非为作坚决的斗争，遭到了他们残酷的打击迫害，还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丈夫和父亲、母亲。但也正是这场浩劫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淬炼了她的正直正派和嫉恶如仇的性格。所以，刘丽英在“文革”后走到纪检岗位上，能够义无反顾地与腐败分子进行殊死较量的斗争，成就了其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如果言尽于此，这还只是为刘丽英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坚定和执著精神，找出了一个属于个人的行为逻辑。这固然是不错的，但还并不是这部书的真正价值所在。这部书的意义在于，它通过作者个人真实的“文革”经历，揭示了在“文革”中“砸烂公检法”的一段历史。以笔者所见，在国内比较详细写公安系统内部“文革”运动的书籍，这是第一部。

新中国的公安建设工作，是从东北各大城市的接管开始起步的。沈阳是继哈尔滨之后，中共接管的东北最大城市。沈阳市的公安建设，可以作为新中国公安建设的一个缩影。建国17年来，尽管公安工作中有对有错，时进时退，但总体上还是向法制建设的方向逐步推进的。“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本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又“彻底砸烂”了。公安机

关首当其冲,是最先被军管的系统。军管人员一不懂法律,二不讲政策,却有着阶级斗争的政治偏执,办案不讲程序,定罪缺乏标准,一切听从政治需要,“文革”中大量的冤假错案都是在军管时期造成的。

辽宁省沈阳市在“文革”中的法制破坏情况在全国是具有代表性的。全国著名的张志新一案就是发生在这里。“文革”后,辽宁省妇联将张志新案件的材料上报中央,也就是经刘丽英之手转送给中纪委有关领导的。1979年3月,张志新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有关方面赞誉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张志新因反对“文革”被关进监狱,惨遭各种非人待遇,最后处以极刑,刑前又被残忍地割喉噤声。张志新的案情经媒体公开披露出来后,强烈地震撼了中国每一位善良人的心灵,社会主义的中国竟然还有如此骇人听闻的封建法西斯暴行,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谁之罪?理论界由此发出呼唤人道主义的声音。事实上,在辽宁被割喉处死的有30多人,张志新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往事回首》的主要篇幅是讲沈阳市公安局的“文革”运动。如作者书中所言:“在这场浩劫中,辽宁省是全国的‘重灾区’,沈阳市公安局是辽宁省的‘重灾区’,我家是沈阳市公安局的‘重灾区’。”这当然是作者的亲身感受。在“文革”十年中,辽宁省有2.5万多人被打被逼致死。^{注1}但实际上,比辽宁省“灾”情更重的省份还有很多。辽宁省和沈阳市是1968年5月同时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在东三省是最后一个省份,但在全国并不算落后。无论是造反动乱的持续时间,派性武斗的激烈程度,还是运动中致死的人数,辽宁省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还不算是最突出的。但辽宁省受“文革”极“左”路线影响深,阶级斗争抓得紧,还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是整人狠、跟风紧、出“经验”的地区。在这个意义上的“重灾区”,自然也是说得上的。

作者为了写回忆录,搞清楚沈阳市公安局“文革”中的运动情况,曾专门到沈阳市公安局查找当年的档案材料。但军管人员在撤离公安局时,已将军管时期的有关档案取走销毁了。作者是与当年的老同志一起回忆,相互印证,经过多次来回反复,才复原了这段历史。就这一点来说,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填补了沈阳市公安史志的一段空白。

公安机关的“文革”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公安机关一向被称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选用的都是政治上最可靠的人,对干部的政治审查极为严格。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凡是社会上搞的,公安机关都搞,社会上不搞的,公安机关自己还搞,各种内部整顿不断。按说应该是搞成“水晶石、玻璃板”一样的单位了吧。但“文化大革命”一来,公安系统同样还是在劫难逃。公安部8个副部长中的7个,49个正副局长中的43个,166个正副处长中的63个,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注2}据“两案”审理中的极不完全统计,“文革”中,各地(除西藏外)受打击迫害的公安干警达34481人,其中被拘捕判刑的1329人,被戴上“反、坏分子”帽子的3652人,被打死逼死的1257人,被打伤致残的3624人。^{注3}“刀把子”变成了割伤自己的刀刃,这是“文革”大反“十七年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砸烂公、检、法”的严重后果。

《往事回忆》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讲述了这段历史中的一个局部过程——作者亲身经历的沈阳市公安局的“文革”运动,让人们知晓了公安系统内部“文革”的一些触目惊心的运动细节。对于作者家毁人亡、充满血泪的“文革”亲身经历,读者是无法等闲视之的。但要深刻理解作者和作品,还需要对公安系统“文革”的运动背景和一般过程有所了解。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上是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党内是打倒“彭、罗、陆、杨”的所谓反党集团。彭真是中央主管政法的领导人,罗瑞卿是首任公安部长。所以,公安系统的“文革”运动,从政治路线上一开始就是与彭真、罗瑞卿上挂下联在一起的。在1966年5月,在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同时,北京市公安局也被改组。5月12日,公安部和中共中央华北局联合工作组就进驻了北京市公安局。原北京市公安局主要领导被停职审查,实际上是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这是公安系统第一个被夺权的单位。

红卫兵造反运动兴起后,在全国掀起了打、

砸、抢、抄、抓的“破四旧”恶浪。红卫兵们残酷殴打所谓“牛鬼蛇神”分子，抄没他们的家产，把他们扫地出门，成百上千无辜的人被打死。红卫兵这些目无法纪的“革命造反”行动，与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责发生了严重冲突。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公安机关紧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并以公安部名义接连发出通知，要求“公安机关一定要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注4}。群众组织“造反”胡为的极端行动受到鼓励，加剧了社会动乱的发展。各地冲击公安机关、揪斗公安干部和殴打警察的事情不断发生。仅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间，北京中学红卫兵群众组织“联动”就曾六次冲击公安部。北京政法学院的群众组织“政法公社”，竟然提出要接管公安机关，以便进行“彻底改造”。而身为部长的谢富治，居然还答应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公安系统内部也被搞乱。到1967年1月，公安机关内部的“造反派”兴起，纷纷拉起了各种“战斗队”组织，卷入了全国“夺权”运动。

在造反夺权运动中，“中央文革”认为各地公安机关保护当地走资派，镇压了造反派组织，并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说：“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地方的公、检、法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他断言：大城市的公安机关和县公安局的八成以上，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这是因为17年来毛主席的思想在公安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注5}“砸烂公、检、法”的提出，加剧了社会的动乱。

实现全面夺权，首先要夺公安司法大权。对公安机关的夺权是通过军事管制的形式完成的。1967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下令对北京市公安局及所属机构实行军事管制。此后，各地公安机关相继被军管。1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大批军队人员进入各级公安机关，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公安机关内部的“文革”运动和公安业务工作。

对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一个“军法时期”。军人执法，一向以简单粗暴，武断专横著称。“文化大革命”被称是

“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注6}，军队又一次被推到中国政治的前台。军人执法的霸道与“公安六条”^{注7}的乱法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高峰时期。“文革”中一些重大冤案，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军法时期。如牵涉34万人的内蒙“内人党”冤案，被迫害，牵涉138万人的云南“赵建民特务案”等等大案，都是军人执政时期造成的。

公安机关军管会大权独揽，军人专了警察的政，“枪杆子”管制了“刀把子”，国家的专政关系一下子变得非常复杂起来。公安的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军队的职能是维护国家安全，本是内外有别，但“文革”全盘否定了前17年的公安工作路线，内外关系完全颠倒了。公安机关军管会的使命是“彻底清除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公安工作路线”，“彻底改造公安机关”，完全否定了多年来的公安工作方针和公安业务。全国公安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打倒，有的被长期关押和隔离审查。大批公安干警遭到打击迫害，许多人被清理出公安机关。公安部机关原有编制1200多人，减到100人左右，精简下的1000多人都下放到东北农场劳动。^{注8}上行下效，各地公安机关也都下放和清理了大批人员。

军队干部不懂公安业务，不熟悉地方工作，但头脑中阶级斗争的敌情观念极强，对公安工作完全是无知者无畏，否定一切，全盘推翻。而“刀把子”的“窝里斗”，往往把对付罪犯的一套用于自己人身上，斗争的凶狠程度更甚于其他单位，还生生地制造出了许多通敌“假案”。“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通敌案”就是一例。1968年5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刘传新等炮制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冯基平、邢相生等北京市公安局领导是“以叛徒、特务为核心的反革命班底”，“在彭真、罗瑞卿、刘仁指挥下……充当美蒋反革命地下军”。10月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7]19号文件向全国转发了这份报告，对砸烂公安业务工作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北京市公安局有1693名干警遭受迫害，冯基平等72人被捕入狱。^{注9}

“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提出后不久，公安部就与地方公安机关切断了联系。全国公安系统互不

通气、不相隶属、各自为政。这种混乱情况,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才有所改变。在1972年“左”整顿中,周恩来严厉地批评公安工作犯了政治性错误,大批下放干部,搞极“左”思潮,否定一切。^{注10}经过整顿,公安工作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沈阳市公安局的“文革”运动,与全国公安系统的“文革”运动过程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内部动乱出现的比较早,破坏程度也更为严重。

“文革”一开始,沈阳市公安局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开始造反。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局内的造反派人物就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批从北京来的红卫兵跑到沈阳公安机关造反,还制造了打死人的事件。在1967年初的夺权运动中,沈阳市公安局遭到群众造反组织冲砸和查封,局内造反派夺权成立“沈阳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1967年2月20日,沈阳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次年军管扩大到公、检、法及其所属单位。1968年5月,沈阳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市公安局和各分局改称“人民保卫组”。直到1973年,才改回沈阳市公安局的名称。^{注11}

沈阳市公安局的军管时期直到1975年7月结束,长达8年多。《往事回首》中披露了在军管会统治下“砸烂公、检、法”的一些情况。1968年6月,军管会将全市公安法机关4500多名干警集中起来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大搞“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拼凑出了一个76人的“特务网”。先后有813名干警被揪斗,整死13人,伤残53人,受到各种处分和处理的384人。局主要领导干部都被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的罪名,长期“军事监护”审查。在1969年的“斗、批、改”中,军管会先将大批干警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接着又把他们扫地出门。2389名干警被赶出公安队伍,到工厂当工人。430多名副科和19级以上干部连同全家赶到农村插队落户。^{注12}如此大规模地迫害公安干部,这在全国公安系统中是非常典型的。通过沈阳市公安机关的“文革”个案样本,是可以对全国公安系统的“文革”管窥一斑的。

“文革”中,作为专政工具的公安机关也被专政,并且其专政的严酷程度并不亚于专政敌人,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在“刀治”意义上的法制,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是建立

在宪政民主基础上的法治。这也就是“文革”提供给我们的血的教训。

作者作为“文革”中受迫害的公安干警中的一员,把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重新回忆起来,公之于众,这不是为了了却个人的恩怨,而是为了全体在“文革”中被侮辱被伤害的人,提醒我们还有这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注释:

注1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一文的通报,1980年7月11日。

注2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出版),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34页。

注3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1980年9月2日。

注4 中共中央批发公安部党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问题的报告》(1966年9月3日)。

注5 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

注6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1967年1月23日)。

注7 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是“文革”期间指导公安工作的具有临时法规效力的重要文件,据此许多有反“文革”言论的人都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注8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出版),第447页。

注9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1980年9月2日;《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出版),第447页。

注1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59~560页。

注11 《沈阳公安志》1902—1985,第320~327页。

注12 刘丽英:《往事回首》,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05、114、122~123页。

(责任编辑 萧 徐)

更正

本刊第5期第71页左栏第11行“1959年4月,在上海开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应为“八届七中全会期间”。

因为我们工作疏忽,第5期第35页“陈独秀”照片有误,特向作者和热心读者致歉!

序 ——《北大,1957》

● 张毓茂

王金屏先生是我的校友。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共同经历了1957年那场“整风”、“反右”运动。那时候,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学子,有如稚嫩的禾苗,感受着新中国的雨露阳光,对党和祖国是满怀挚爱深情的。当共产党开展整风时,大家积极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真诚地相信,所谓给不给党提批评建议,体现着对党的感情是否深厚。万万没有料到,那么恳切的动员,那么虚怀若谷的姿态,竟然是诱敌深入的谋略,据说那叫“阳谋”,是“钓鱼”,是“引蛇出洞”,是“让毒草长出来”……于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55万人被当做“蛇”引出来了,当做“鱼”钓上了钩——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金屏就是这55万人中的一个。他为自己的天真幼稚和善良轻信,付出了惨重代价。尽管他是条小鱼,但也与社会上那些声名赫赫的大鱼串在一起了……。

此后的生涯,不堪回首!

然而,金屏硬是要“回首”。这不啻是重揭心灵伤疤,其痛苦可想而知。因为金屏不但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更是清醒坚强的智者勇者,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要把共和国这段重大历史失误昭示后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朝失败后,“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虽是古人,但他这些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对今天仍有启发。对于挫折和失败,光是哀叹不行,一定要认真借鉴,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有积极的借鉴作用。我想,这就是金屏在古稀之年不辞辛苦地写出这部感人的长篇小说的动因:“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啊!

金屏这部《北大,1957》,真实深刻,感人至深,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说,是一部“惊心动魄的书”。小说虽然塑造了许多不同性格的人物,展现了广阔的生活画面,但主要是以“我”(赵四辈)、梁卓和余坚三个人物的命运为主要内容,展开全书故事情节。其中赵四辈的人生遭遇贯穿全书,写他的童

年,学生生活,错划的打击,劳改的折磨,丧失亲人的痛苦,情侣惨遭杀害的重创……等等。把一个农家子弟,受党的教育和新社会培育的幸福和喜悦,描绘得十分亲切感人,也把政治风浪中无辜受害的困惑和苦恼的心路揭示得震撼人心。当赵四辈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遭到残酷批斗时,他百口莫辩,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平日亲密谈笑的同学和朋友,忽然变成一群杀气腾腾,面目狰狞的狱吏和杀手……赵四辈被骂成“阴险毒辣”、“诡计多端”、“狡猾奸诈”、“翻身忘本”、“向党进攻”……不容他有半点辩白和解释,什么“不要装疯卖傻”“蒙混过关”“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小说把那荒诞岁月里人对人的心灵摧残展现得惊心动魄。赵四辈这个善良无辜、天真幼稚的农家子弟,沦为祭坛上任人宰割的羔羊。他只能撕肝裂胆地呼喊:“苍天啊,我丝毫也没有反党的意思啊!不信挖出我的心来瞧瞧,就是把我的骨头砸碎,也找不出半点的碴碴来呀!我这样的人要是反党,那不是丧了天大的良心,那不是比毒蛇还毒,比豺狼还狠,连猪狗都不如了吗?”绝望中的赵四辈“忽然,我想起了历史上有不少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精诚报国的忠臣,也曾被诬陷为奸贼臣,罗织些‘莫须有’的罪名,惨死在自己效忠的政权手中,如楚国的屈原、宋朝的岳飞、明朝的于谦和袁崇焕……想着,想着,我头皮一麻一涨,眼睛一黑,便失去了知觉……”。对于今天的年轻人以及后世人,他们没有“左”的思潮泛滥时各种政治运动的经历,无法想象也不可能理解当年人际关系中的种种可悲的丑恶的世态。“左”的思潮和“左”体制,使人性泯灭,兽性大发,人变成嗜血的兽,以最神圣的名义干着最凶残最阴险最血腥的勾当。像刘少奇、彭德怀、马寅初、张志新、胡风、林昭……等党内外民族精英,遭到灭绝人性的迫害。小说中的赵四辈与他(她)们相比,尽管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牺牲品,但其承受的精神摧残,同样十分惨烈,具有深远的警世意义。这一切,让我们省悟到对“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路线的扬弃,提倡“以人为本”“和谐社

会”等治国理念的创立,确实来之不易,是党的理论和民族智慧的升华,是中华民族从深重灾难中又一次“凤凰涅槃”。

小说热情讴歌的英雄人物是梁卓。这个典型显然是以烈士林昭为原型的。她体现了那种坚持真理,敢于抗争,宁死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精神,她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代表着人民大众的希望。她虽然被江青、林彪一伙借“左”的思潮杀害了,但她的精神是不朽的。鲁迅说过:“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的红极一时的皇皇大文,确是“不足为据”,早已灰飞烟灭,而梁卓的“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的诗句,正是鲁迅说的“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这声音震古烁今,浩气常存,给后世以启迪,以鼓舞,以力量。小说对梁卓狱中受难形象的描绘感人至深,简直是一位崇高光辉的圣女:

“哗哗啦啦响动的铁镣声由远而近,半地下的会见室通往监号的后门打开,梁姐的身影立刻出现在台阶上,犹如镶嵌在镜框里的伟人画像一般顶天立地,背后是灿烂的阳光……”

接下来小说描述了梁卓会见母亲和赵四辈的情景,真是感天地,泣鬼神,不忍卒读。这位当代的秋瑾、赵一曼、刘胡兰,面对当代法西斯屠刀,毫不畏惧,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地宣传反对个人迷信的真理,戳穿“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造神的画皮。在举国迷乱,血雨腥风中,勇敢地向当代法西斯暴政开火,直至血洒荒郊,以身殉国。正是由于小说有了梁卓正面光辉形象,使得作品高扬了时代精神,鼓舞了革命正气,超出了一般所谓“伤痕文学”的水平。

小说对反面人物余坚丑恶灵魂的揭露和刻画,也是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在“左”风盛行时,余坚这类以神圣的革命名义残害善良的无辜者的杀手,随处可见。有人把他们称作新型的“狱吏”式人物,是相当确切的。他们凭借政治运动,打击陷害别人,满足私欲,实现野心,踩着受害者爬上去。余坚假借革命的词句,利用组织的权威,甚至用欺骗、谎言等卑鄙手段,设置陷阱,使无辜者沦于灭顶之灾。赵四辈一直把他当做亲密的朋友和尊敬的兄长,多次轻信他的花言巧语,直到梁卓被害,

他才有所醒悟,是梁卓的鲜血擦亮了赵四辈这些天真善良人的眼睛。余坚后来也被“扩大”成右派分子。小说写出这个“左”派人物命运变化的合理性。余坚固然整人的狠毒凶残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但如果不是他在权力场中角逐败北,他仍可执掌整人的权柄,从而青云直上。小说写他沦为“右派”后,也仍然不惜出卖别人以求改变自己命运。这种人物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远未绝迹,只不过衣着打扮有所不同而已。小说刻画这个人物,极有警示作用,它使人们想起《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伏契克的话:“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啊!”当然,“左”风盛行时,许多跟风狂跑的人,并非都是余坚那样的人。他们或是盲从轻信,或是愚昧无知,或是胆怯自保……就其本质而言,也都是善良无辜者。小说中所写的萧世博、张福林等人物就是如此,他们在“整人”时,有的确是抱着“救人”的心肠的。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

最后,我想说的是,金屏以小说形式反映1957年反右历史生活,我以为是非常明智的。小说与回忆录等纪实文学不同,它从生活原型出发,进行提炼熔铸的艺术加工,不拘泥于具体的实际生活素材,而是更集中,更概括,更具普适意义。因而更能深入揭示生活本质和社会规律,也完全摆脱了历史上当事人的个人恩怨和是非曲直的纠缠。据我所知,北大校友中确有以回忆录形式抒写1957年反右的生活,由此引起了一些纷争……这些纷争至少转移了人们对历史教训的思考。这是十分遗憾的。诚然,即使是小说,有人也喜欢对号入座。胡适曾把曹雪芹和贾宝玉,冯执中与马二先生混为一谈,遭到鲁迅的嘲笑,说胡适有“考据癖”。也有人咬定《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就是作者杨沫,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先生自己说得好:“人家(指杨沫——引者注)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我也不会出面解释”(田永倩:《我所了解的张中行》)。张中行先生是文学大师,他对小说艺术和历史回忆录之间区别的清楚认识,值得我们遵从。倘能如此,“余永泽是张中行”一类的误解就不会在金屏这部小说里发生了。

受老校友的殷殷嘱托,写了以上这些外行话,自知难中肯綮,权且充作序吧。

(责任编辑 萧 徐)

美丽岛事件始末

• 赵 诚

从《自由中国》到“中坜事件”

1950年代,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之后,先有吴国桢向蒋介石进言,实行“政党政治”,为蒋不容,1953年出走美国,次年与蒋反目,指责其独裁专制。后有雷震1960年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次连任“总统”,并在其主持的半月刊《自由中国》发表《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等七篇文章,主张反对党参与选举,制衡执政党。9月雷震被捕,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判刑10年,《自由中国》被取缔。在高压下,本土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更加失望,萌发台独意识。1964年彭明敏等发表《台湾自救宣言》,次年以“叛乱罪”判刑8年。

197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增长。1978年人均国民所得1400美元,城市人口占到41.9%。基尼系数从1953年的0.558降到1980年0.303,中产阶级占全民总数51%。经济的改善,文化精神需求提高,各阶层的参政意识也开始发展。1975年8月《台湾政论》创刊,“立法委员”黄信介任发行人,康宁祥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他们表示要继承《自由中国》的传统,“撑起民间言论的发言台”,但同年12月被当局叫停。

1977年11月19日,台湾举行台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五项地方公职选举,民众参与热情很高,国民党外的民间力量取得了30%的席位,其中以“中坜事件”最有名。

在桃园县长的竞选中,国民党籍省议员许信良,未得到本党支持,便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击败了当局推出的国民党籍候选人欧宪瑜。事后许信良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投票当天,桃园县中坜市国民小学投票站国民党籍监选主任涉嫌舞弊,被当场抓住。警察立即把监选主任保护起来。此举激起民愤,民众到警察局要求对选票舞弊进行处

理。警方推诿,进一步激怒民众,约两万民众烧毁了60辆警用摩托车、8辆警车,并焚烧了警察局,警员撤退,军队到场。蒋经国下令军队克制,不准开枪,未有流血。民众看到许信良得票已领先8万张,怒气渐消,逐渐散去。这件事史称“中坜事件”。

1947年“2·28事件”后,本土人民视政治为畏途。“中坜事件”表明本土人民已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新一代台湾人克服了恐惧。蒋经国也看到民间的心理变化,表明“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高,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并允许在1978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各种力量竞争,释放出愿意和民间“沟通”的善意。

《美丽岛》的诞生

“中坜事件”后,反对派更为活跃。1978年底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民间反对派统一在全岛各选区布局,推举康宁祥、张春男、黄天福、姚嘉文、吕秀莲等人为候选人。1978年11月24日“党外人士助选团”正式注册成立,康宁祥为主席,黄信介、余登发为总联络人,施明德为执行秘书长兼总发言人。他们举办各种座谈会、记者招待会,还公布了党外人士《十二项共同政见》:“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思想学术超然化、禁止党派党工控制学校、言论出版自由化、参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严令”,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歧视。

当年12月16日美国与台湾断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同时宣布1979年1月1日建交。对台湾当局形成极大心理冲击。蒋经国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据,发出“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宣布延期选举。12月22日,警备总司令汪敬煦宣布“中华民国”进入非常时期,禁止一切集会游行,

停止选举。但是，此举遭到“党外人士”一致反对。他们发表《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国是声明》，进行抗议。

1979年1月21日，台湾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逮捕“助选团”总联络人之一，前高雄县长余登发和他的儿子。桃园县长许信良第二天带领20多人，到余氏家乡高雄桥头乡游行抗议。这是台湾岛内戒严几十年来，第一次民间组织的公开游行。史称“桥头事件”。游行违反戒严法，4月20日，“监察院”通过“弹劾案”免去许信良桃园县长职务。

1979年5月，黄信介申请创办的政论性杂志《美丽岛》，刊名来自一首台湾歌曲。6月2日，杂志社在台北正式成立。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吕秀莲、黄天福为副社长，施明德为总经理，林义雄、姚嘉文为发行管理人，张俊宏为总编辑。8月《美丽岛》发刊，文章针砭时弊，得到许多青年支持。到11月，发行量已经激增到8万份。杂志社在全台设立11个分社，吸收青年支持者参加集会、演说，举行火把游行。与国民党当局在思想上发生正面碰撞。

《美丽岛》杂志发刊后，遭遇了多次暴力攻击事件。9月8日《美丽岛》在台北中泰宾馆举行创刊酒会，《疾风》杂志社郁慕明为首的“反共义士”在宾馆外抗议、示威，高喊“处死康宁祥”，“吊死黄信介”，“不消灭党外人士不罢休”，并向宾馆内投掷石块、电池。10月17日，当局查处《美丽岛》杂志。10月25日《美丽岛》台中服务处举行成立茶话会，会场被警察以拒马和铁丝网封堵。10月31日《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举办“劳工座谈会”，11月4日举办“陈菊旅美座谈会”，11月7日《美丽岛》屏东服务处举办“农村毛猪问题座谈会”，11月20日《美丽岛》台中服务处举办“美丽岛之夜——吴哲朗惜别晚会”均遇到暴力冲突。11月29日，台北黄信介“立委服务处”，遭6名暴徒持斧砍砸玻璃，捣毁办公设施，10分钟后，《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也被8名手持斧头和武士刀的暴徒闯入捣毁。12月8日，《美丽岛》屏东服务处受6名暴徒袭击。这些身份不明的暴徒，不能不令人怀疑有当局支持。

1979年11月14日，施明德在台中县梧栖镇参加基督教长老会祈祷会，牧师建议在12月10

日举行“世界人权日”纪念集会。施明德与陈菊商定，由“美丽岛杂志社”与“人权纪念委员会”共同申请，12月10日晚6点至11点，在高雄扶轮公园举办“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31周年集会游行”，争民主、争人权。12月3日，陈菊和周平德向高雄市新兴分局自强路派出所提出申请，申请函由黄信介署名，几次交涉，未得允准。根据以往经验，反对派申请开会未准，自行开会，当局事后“照准”。于是，《美丽岛》杂志社决定，人权日纪念会按预定时间举行。但9日下午4时，《美丽岛》高雄市服务处已被警察包围。义工邱胜雄、姚建国驾宣传车在鼓山路被扣，两人被押进鼓山警察分局，遭受殴打。《美丽岛》杂志社人员和支持者前往鼓山分局声援，再次发生警民小规模冲突。至12月10日凌晨2时，邱、姚才获得释放，史称“鼓山事件”。

为了应对12月10日的集会，12月9日晚，台湾当局通过电视宣布高雄市于10日进入冬防“元春军演”，中午，以演习为名，高雄宪兵司令部、冈山保安队、市警察局、南区警备总部分别进入市区，宪警部队配备防毒面具，催泪枪弹，军车忙着运送铁丝网、拒马，严阵以待，并宣布下午三点进行交通管制，禁止一切集会，要求学生提前放学，商业活动即早到银行提款，造成恐怖气氛。

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全体人员和支持者如期抵达高雄，当地支持民众也在下午6时集齐待发。此时扶轮公园已被军警封闭。正副总指挥施明德和姚嘉文6点半带领二三百人的集会队伍从高雄服务处出发，黄信介从台北出发。南区警备司令常持琇中将在火车站等到黄信介，希望黄不要有过激之举，黄与常商量，借一会场，和平集会，得到常的同意。黄信介乘常司令的车由常陪同到达现场后，常持琇的帽子被人打翻，一怒之下，撤回了借会场的承诺。施明德等临时决定，由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弘宣、吕秀莲、陈菊等带领持火把的游行队伍到附近中山一路和中正四路的环岛。此地开阔，是个小广场，当做临时会场。黄、姚、施等依次演讲。会场外军警包围，军警圈之外是如潮的围观群众。黄、姚演讲完后到高雄警察局新兴分局，要求在原定会场集会，撤走镇暴部队，会场可让警察维持秩序，并承诺晚11点散会。但南区警备副司令张墨林请示上级，未获同意。施明德把现场指挥交给张俊宏，再次到新兴分局交涉，

让更多群众进来参加会议,又未被同意。8点半左右,集会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警方施放催泪瓦斯。施明德指挥群众向中正四路移动,在南投路突破军警封锁线时,双方受伤惨重。施明德要求支持者退回服务处,但现场已乱,失去控制。支持者群情激奋,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部分群众冲入警察新兴分局,部分群众回到服务处,集会组织者害怕再次出现中坜事件,把冲入警察局的群众又带回到服务处,张俊宏看到现场稍有平静,要求支持者散去,但人们不走,仍听吕秀莲演讲。在军警重围下,民众以木棍、石块与军警对阵,冲突不断。11时,纪念会组织者宣布散会。但一些人情绪激昂,坚持不走。直到13日凌晨2时,军警用催泪弹和电警棍才把集会者全部驱散。

这次集会警民大冲突三次,双方都有受伤,人数至少在200人以上。据台湾警备司令汪敬煦回忆,“宪警人员遵奉上级指示,以高度的自制、坚忍执行职务,始终忍耐,以致负伤累累”。《美丽岛》支持者说,当晚参与集会的民众最多时达到10万。汪敬煦说只有六七百人。国际媒体驻台记者报道为六七千人。据汪敬煦回忆,当时蒋经国对他汇报的数字表示疑问,并说,“你们就是喜欢把大事说小。”

结局与回响

1979年12月13日起,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对高雄事件参与者进行大搜捕。《美丽岛》杂志主要骨干除许信良当时正在美国,施明德在逃,其余全部被捕。许多高雄事件的参与者也被捕,到1980年1月8日施明德也被捕。至此,被捕者达152人。

1980年2月,台湾当局“军事法庭”对美丽岛案主犯进行审判,指控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密谋推翻政府,4月18日判决:施明德处无期徒刑(在蒋经国的直接干预下,施明德免除死刑),黄信介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吕秀莲、陈菊、林弘宣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后黄信介改判十年,其余六人为八年。此外,还有三十余人被控以公然聚众施暴,在一般法庭审判,其中一部分被处以一至三年有期徒刑。

由于此案被捕人数众多,引起国际传媒和美国政府、国会及国际人权组织高度关注。台湾当局为了表示“军事法庭”审判公正,法庭对岛内外人士开放旁听,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在“军事法庭”受审的被告家属委聘的律师组成一个15人的律师团,其中有尤清、谢长廷、苏贞昌、陈水扁、张俊雄、江鹏坚等。在法庭上,被告们公开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律师们发表长篇辩护词,阐述“宪法”赋予的权利。审判本身成了一场政治大辩论。岛内报刊详尽报道法庭辩论,使法庭成为朝野双方政治较量的舞台。台湾民众在这场大辩论中,受到民主自由思想的洗礼。

台湾当局为了应对国际压力,一方面表示公正要“公开审判”,另一方面,在新闻局长宋楚瑜指挥下,开动所有宣传机器,称《美丽岛》表面上是杂志,实际上是一个阴谋组织,有计划的、有预谋地进行“叛乱”活动。《美丽岛》杂志的领导者都为匪首及阴谋分子,鼓吹暴力,而群众都为非理性暴民。整个事件中,警察则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美国《新闻周刊》和美联社说,台湾官方媒体撒谎,“美丽岛事件”本质上是一次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宋楚瑜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强硬的语气驳斥《新闻周刊》和美联社记者的报道,并宣布取消他们在台湾的采访权。

马英九当时在美留学,任《波士顿通讯》主编。该刊发表文章,称“美丽岛事件”当事人是“叛乱集团”,是“丑剧”、“逆流”,建议当局管制言论,主张台湾不应有美式言论自由。

审判期间的2月28日,被告林义雄家遭受灭门血案,至今未破。

廖忠信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中说:美丽岛事件“规模冲突之大,可说是台湾史上首见”,“在这个事件中,活跃于党外阵营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被捕,当时台湾反对派运动受到严重打击。很多人说,蒋经国被这件事震撼到了,所以加快了开放的脚步。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的结果,以及后来的审判,的确让很多政治冷感的台湾人开始思考一些政治及台湾前途的问题,成为一个启蒙的起点。”

审判加速了本土知识精英的凝聚。受刑人家属在1980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连连取胜。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张俊宏之妻许荣淑、

黄信介之弟黄天福,分别以高票当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

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政治的一个分水岭,从此,朝野双方都意识到社会的变革已成大势。1986年前后,本案主要被告在刑期一半时被假释或保外就医。

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政治革新”,5月7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蒋经国强调,在维护和谐、国家安全、全民利益和法律的前提下,“厉行‘民主宪政’的决心绝不改变”,指示开展与党外势力“沟通”工作。5月10日,国民党首次派出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和黄光平与民间反对派党外社团“公政会”理事长尤清、秘书长谢长廷举行沟通会议,并取得了“三项谅解”。

1986年9月28日,以《美丽岛》参与者为骨干的“台湾民主进步党”成立。但蒋经国并未深究,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正式宣布在台澎地区解除历时38年的“戒严法”。从此,台湾迈进了宪政时代。

编读窗

贵刊今年第1期发表的拙文《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得到众多读者关注。我收到越来越多读者来信,要我提供编者在文末所提示的“本文资料来源原来有21个注释”。现按引文顺序,简列如下: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200页。
- 2、《列宁全集》第7卷,1985年版第167页。
- 3、《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1964年版第52~54页。
- 4、据塔斯社莫斯科1992年4月23日电。
- 5、《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版第333页。
- 6、《斯大林全集》第7卷,1958年版第326页。
- 7、《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1954年版第566页。
- 8、《赫鲁晓夫言论》第二集,1964年版第362页。
- 9、《赫鲁晓夫回忆录》,1988年版第429页。
- 10、《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1964年版第70页。
- 11、《列宁选集》第四卷,1995年版第782~783页。
- 12、布拉诺夫:《被篡改的列宁遗嘱》,1999年版第24~25页。
- 13、《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1964年版第437页。
- 14、《苏联共产党党章汇编》,1982年版第73页。

2008年4月7日,在台北市中心“总统府”不远处立碑,其铭文是: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钜,史称“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此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

2010年2月4日再修订稿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敬 答 读 者

15、《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编》,1988年版第426页。

16、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1981年版第251页。

17、《列宁选集》第四卷,1995年版第782~783页。

18、《列宁选集》第四卷,1995年版第745~746页。

19、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的来龙去脉》,新华文摘2001年第10期。

20、丘耶夫:《莫洛托夫密谈录》,1992年版第326页。

2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7、50页。

另有安徽怀宁县法庭内6单元102室程百川读者,来信问及拙文提到:苏联从1921年至1954年被判处反革命罪犯总数与其中被判死刑、劳改与监禁、流放与驱逐出境三项相加对比,多出7004人,原因何在?能提出这个疑问,足见读者相当认真细心。实际上这是排印差错所致。当时被判处反革命罪犯总数应是377.738万人,其中死刑64.298万人,劳改与监禁236.922万人,流放与驱逐出境76.518万人。这里后三项相加与总数就完全一致。

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

高放

4月21日



老人出书
精神长存

二千元起编辑出版：个人文集、回忆录、自传

-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生平传记：革命史、受难史、创业史等回忆录、自传。
 - 3、学术著作：学术专著、自研著作；旧文新出、旧书翻印等。

一般标准：

大32开本，封面插页铜版纸彩印、内页胶版纸印刷，无线胶装。二百页出版50本两千元，三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设计、排版与加印彩色插页费用另行计算。

特别说明：

书稿内容文责自负，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办理出版书号的我们编辑，设计制作样书后另行安排。



家族出书
历史见证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家族年谱、家史传记

- 出书范围：**
- 1、先辈遗文：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录音、摄像，遗作汇编。
 - 2、家史传记：家族大事记，家族先贤传，家谱族谱、家史档案等。
 - 3、传家宝盒：百年家族史、家族图片册，家史光盘、家族音像等。

一般标准：

B5或16开本，封面与重点照片插页铜版纸彩印，文字内页胶版纸黑白印刷，无线胶装或锁线精装。二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三百页出版50本四千元；设计、排版与加印彩色插页费用另行计算。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出版附赠光盘，需录音摄像或专题创作写稿的另行协商）

服务热线：010—68920114 68920182

登陆网址：
《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老人出书网》(www.l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时代文化出版机构：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五号（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
博越商务楼6507室 邮编：100089

长途免费咨询电话
400 633 2311

欢迎订阅2010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农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每期定价：6.90元

全年定价：82.8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

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是从《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至1995年计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的重点文章150万字，编辑为五卷珍藏本，分别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该珍藏本出版后一度脱销。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精品书系五卷珍藏本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售罄之不足。

由于数量有限，恕不分卷出售，欲购从速。定价125元，另加邮资12元。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100045，联系电话：010-68532048，传真：010-68532569。



新中国60周年丛书：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内容简介：

本书多位作者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非凡的历史瞬间，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这些发表于著名纪实性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致力于匡正教科书的偏误，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全面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治、经济与生活变化的新视角，诸多真知灼见也闪耀其间。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欲购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购。



吴象：悼孙起孟老

保育钧：“两会”应该关注什么

吴江：知识分子何以有戒心

三大历史关口的张闻天

从消灭私有制到以人为本

山东夺权的“三结合”经验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